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二號

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第二十二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行

大小國家投票權平等問題

潘楚基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聯合國安全會議在美國舊金山開會，會中討論最多，花費時間達一月之久的是去年四強在敦巴頓會議所擬安全組織方案，及本年三強在雅爾達會議所擬補充方案之全部接納抑或修改問題。歸根結底，則是大小國家權責平等問題。

敦巴頓方案擬定世界安全組織有一個全體大會，每一會員國派遣出席代表一名，每名享有一投票權，但是大會僅有普通的立法權；關於和平的維持與侵略的制裁，權力完全操之於安全行政院。這個院以代表十一名組織之，其中六名任期兩年；五強——中、美、英、蘇、法——各得有常任理事一席。

這個方案公佈後，本來已經引起許多小國的不滿。第一，他們認爲代表一切國家的全體大會權力太小，而安全行政院的權力太大；第二，安全行政院的五強佔有永久席次，顯然處於支配的地位。

本年三月，三強在雅爾達會議後，發表安全行政院議事規則：普通的事情，以過半數議決爲有效；關於制裁侵略的案件，則十一常任理事國中須有七票贊成，而七票之中，又須有五強在內方算通過。據傳這個七票的辦法，是經羅斯福總統苦心思索出來的。其用意是：議案既須七票方能通過，則安全行政院不會爲五強所把持，同時也不會受單純代表小國的六十理事國所支配。至於五強各擁有否決權的原因，第一，是蘇聯國因爲上次曾被國聯開除，至今對資本主義國家懷疑，怕它們再度聯合起來對付它，所以堅持這一點。第二是美國自己也擁有否決權，則美國的加入世界安全組織，比較不會爲孤立主義分子所反對，比較易得上院的通過。此外，還有人認爲關於制裁侵略，如果五強不能合作，則那個制裁根本就很難實現，所以這個辦法只是把一個必要的事實加以合法的形式罷了。但是這個辦法公佈以後，反對敦巴頓方案的人更振振有辭，更認大小國家的待遇太不平等。

可是雅爾達會議關於世界安全組織的議決案並不只上述一點。羅斯福總統逝世前曾發表三強另外一個協定：那就是世界安全組織的全體大會中，英國連同其自治領地共得六票票權，蘇聯及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共得有三票票權，美國也得有三票票權。其他各國仍只有一票票權。這個消息發表以後，人們更鼓噪起來，認爲是大國欺負小國。羅斯福總統不得已，宣佈美國放棄三票的要求，但是繼續贊成蘇聯有三票。英國也一樣贊成。

蘇聯何以要求三票，據「華盛頓花絮錄」的解釋，是蘇聯認爲自身佔有世界六分之一的領土只能得一票，而英國得有六票，未免太不公平；美國本身雖然只有一票，但是拉丁美洲二十個國家時常跟着美國投票，至少它們易受美國的影響，所以實際上美國也不只一票。據傳蘇聯的原來要求是十六個蘇維埃共和國各得一票，經英美兩國極力反對，所以讓步爲共得三票。

但是蘇聯這個要求，更引起人們激烈的反對。他們覺得安全行政院的權力既然太過全體大會，而安全行政院中，五大強國不僅佔有常任席次，而且每一國都擁有否決權。現在蘇聯還不滿意，還要在全體大會多得兩個票權，那豈不是完全藐視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如果接納新組織豈不比較以前的國聯組織還要落後！

舊金山會議花費了一個月的光陰，辯論上述幾點。至五月二十九日，會議中對於敦巴頓方案及雅爾達決議的許多要點，例如安全行政院的權力與組織成份，蘇聯在大會的三票票權，都壓倒了小國的反對

而維持原案。關於五強否決權一點，澳州外長伊瓦特曾反對五強有否決權，並謂有許多小國擁護澳代表之立場，然以拉丁美洲諸國態度改變，澳代表之行動乃失敗。

為甚麼？因為那些一切違反了大小國家主權平等的基本原則。

大小國家主權平等的理論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記者個人也一向認為是天經地義。但是最近有許多人卻有了新的見解，認為這個「天經地義」在原則上本身並不見得完全合理，而在事實上很難行得通。

去年七月號「自由世界」月刊「圓檯會談」中，美國的時事評論家林德里氏說：「對於我，似乎是很顯明的，只有大國能夠從事大戰，除非能夠從事大戰的民族間得有堅實的軍事與政治合作以維持和平，空談世界組織是無用的……就我看來，中心問題是力量之組織。實際上，你不能去巡邏英國，俄國或美國。它們卻能結成一個力量巡邏別的國家，但是任何把它們的權力讓予一個超乎一切的組織之建議無論如何只是理論的與法理的，因為作戰的力量存於這些特別區域之內。」

去年十月十五日紐約時報登載一位國際馳名的律師克拉克氏一篇長文，說國家無論大小，如果在大會中大家平等的只有一票投票權，則「大會必須成為附屬機構。在國際大會的重要事件中，給予巴拿馬與盧森堡以與美國及蘇聯同等之投票權，給予科斯達利加與阿比西尼亞以與英國，中國，及法國同等之投票權，就是違反一切理性與常識。」

佛克司氏在其新著「超等強權對和平之責任」一書中說：「松鼠與象的大小不是一樣的……在一九四五年，華盛頓由於拒絕承諾以美國力量使用於共同目的，或者堅持國際社會中的松鼠與象具有同等的權力會使更多的戰爭為不能避免。當然，真理是：當象們為其個別安全從事於一個新的競爭時，最大部份的松鼠都會被踐踏以死。弱小者只有在一個強大者以力量為基礎而合作組織安全的世界裏纔能安全地生存着，並且享受平等的權利……一個持久的大國聯盟遠較一個need力者聯盟為佳。企圖把兩者結合起來，也許比較把它們分開為更危險。」

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發表紐亨勃什爾大學教授羅德氏一文，其中說：「在戰爭時期以及重建的初期，權力無疑地集中於具有最大軍事力量和重建世界的最大經濟力量的那些國家之手。在現在，承認五強必須擁有特殊的責任是最現實的。在今後許多年間，五強也許比較任何其他的競爭國家還要強盛些。……因此，如敦巴頓方案之所為，給予五強特殊地位，在一九四五年最合時的。……甚麼是今日一個世界組織中平等代表的標準呢？這是舊金山會議和其他國際會議中能夠討論的最根本問題。我們必須設計與接納一個公平的公式……在過去，缺乏這樣一個公式，我們高談「一切國家主權平等」——構成那麼可笑的假定，認為在處理世界事務時，阿爾巴尼亞與俄國可有平等的發言權，或者以為假定他們在任何實際途徑上能夠平等是公正的或具有常識。主權平等之說，在過去招致了愚蠢的全體一致投票辦法，在國際事件中，必須沒有一國投反對票方能採取行動。這些假定，使給予凡有小國參加的任何組織以巨大責任成為不可能。如果平等是國際會議中的支配口號，則真正的權力只能由少數的大國操持。……」

本年四月一日紐約時報又發表美國前任上訴法庭法官及司法部顧問高德雲氏一文，批評敦巴頓方案所擬全體大會之組織。其中說：「現時所擬的全體大會是極不完備的。它規定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有平等的投票權，但是所列入四十五個國家中，其中有二十三個國家——佔全體國家的一個多數——僅代表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又三分之一；其中有三十個國家——在全部國家中佔三分之二——僅代表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顯然，在投票權平等計劃之背後的思想是：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計劃會為小國所反對；但是這個原則接納的結果，使授權大會參加任何決定為不可能，甚至討論與建議的權力都須受有限制。」

以上是人們對這個「大小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提出的疑問與發出

的攻擊。平心而論，如果我們把國家當做個人看，則社會進化的趨勢，是由少數有錢有地位的人享受特權，而逐漸變爲大家平等享受權利。譬如就選舉權一項說，最初本來只是少數人享有，後來逐漸擴充，但是有些選舉法還規定那少數人可以多得票權；到了近世，選舉權纔傾向於單純以人爲單位，不管他的財產價值如何，或社會地位如何。這樣，一切國家，無論大小，在國際社會中地位平等，猶之乎一切個人，無論貧富，在同一國的法律上地位平等一樣。如果各國的地位一向是平等，現在卻因其有大小而予以歧視，那豈不是違反社會進化的趨勢？但是從另外一方面說，這是皮相的看法，機械的看法。國家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一個政治區域，猶之乎一國以內的州，省或縣一樣。在最初，一國以內的政治區域選舉代議士時，有以各單位，不分大小，有同等代表權爲原則的。譬如美國的參議院之構成，係四十八州每州各選參議員兩人。但是這種制度久經政治學家批評，認爲不合民主原則。因爲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照美國參院的選舉，大州如紐約，有人口幾及一千四百萬，只能有兩個代表，擁有兩票票權；小州如奈滑達，人口只有十萬，也有兩個代表與兩票票權。有時小州合作，僅有全國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構成上院過半數的票權。這無異於以少數人支配多數人，是一個陳舊落伍的辦法。因爲如此，許多政治學家主張根本取消參議院，只留下來依人口比例選舉代表的衆議院。那就是說，取消表面上的平等而維持實質上的平等。如果一國以內的政治區域，不應當不論人口多少而一律享有平等的代表權與投票權，則國際社會中的各個政治區域——國家——也不應當不論人口多少而一律享有平等的代表權與投票權。

以上的理論，可以說是給予我們一向信奉的「大小國家權責平等」的舊原則以一個致命的打擊。假使我們認爲舊辦法在實質上是不公平的，那末，我們應當研究一個新制度以代替它。

遠在一九一六年，美國一位生物學家勞夫令氏在「科學月刊」上面發表一文，主張根據各國對於「世界工作參加」的程度以衡量該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勢力與應得的票權。他所擬的公式相當複雜。構成代表基礎者共有三個因素：第一是一國的「陸地面積與人口」；第二是該國「參加世界工作之人口」；第三是「該國的對外貿易」。

第二個重要建議是一九二六年澳洲代表向國際聯盟提出的。依照那個計劃，每一國的代表人數須衡之於該國的「世界重要性」——即該國對於「世界和平的貢獻能力」。這裏面的統計包括人口，國境長度，國際貿易，國際移民，交通之物質工具，交通之智識工具（出國學生與刊物數目），以及國際條約之數目。

這個建議未被接納，但是國際聯盟討論經費問題時，曾根據各國的財力決定各國應納會費之數。根據那個公式，英國納費定爲一零八單位，而最小的國家則僅納一個單位。去年布列頓貨幣會議也參考各國的對外貿易，黃金存額，國民收入等因素，決定各國應攤派的貨幣穩定基金與國際建設銀行基金之數。

第三個具體建議是本文上述紐約著名律師克拉克氏提出的。一九四零年一月，他刊印一個小册，名爲「自由民族的聯邦」，主張以人口爲基礎而選舉各國代表。他的建議曾經修改，最後發表見於去年十月十五日紐約時報那篇文章。他認爲擬定代表人數的基礎不應當單純是人口這個因素，但是在世界組織成立的最初時，代表計算之基礎越簡單越好；所以我們可以用人口做唯一的基礎，而給予小國以較大的代表比例。照他的計劃，任何國家，不拘大小，均有一票權；在一千四百萬人口以下之國家每二百萬人口多得一票權；超過一千四百萬人者則以後每五百萬人多得一票權。依這個基礎計算，則同盟國的中小國家，共得有一百二十八票權（內荷蘭二十，巴西十二，比利時九，捷克七，希臘四，挪威三）。法國及其殖民地（共人口一萬一千萬）得有二十六票權。英國及其殖民地（共人口五萬五千七百萬），中國（人口四萬五千七百萬），蘇聯（人口一萬九千三百萬），美國（人口一萬三千八百萬）各得有五十票權。（按克氏對於四強各給予五十票權是一個任意決斷的辦法，並非完全依他上述的公式計算而得來。因爲

照他的公式，美國及其殖民地應得一一五票權，中國應得九十五票權，蘇聯應得四十三票權，英國應得三十一票權。）以上五強合計，共得二二六票權，在全部三五四票權之中，自然佔了大多數；即令將來加入德國與日本，各得二十票權，在全部三九四票權之中，五強仍然維持過半票數。如果實行這個辦法，他主張增加全體大會的權力，取消安全行政院中的大國否決權，因為大國已經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去年十二月號的「政治科學評論」中，蘇恩氏發表「國際大會投票之衡量」一文，主張以人口，生產，與貿易三個範疇作為推選代表人數的基礎。在每一範疇內，他使用幾何級數的原則以減少大國的過大權力。譬如，以人口範疇說，一個不及兩百萬人口的國家得有兩個票權。自此以上，人口每增加一倍，則增加兩個票權。所以擁有人口二萬五千六百萬以上而不及五萬一千二百萬的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單純就人口一項論，也只能得二十票權。此外在生產與貿易兩範疇方面，它們還能加得幾票。

美國前明納梭達州州長及一九四八年有希望被推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斯達森氏曾堅持「一個智慧的公式必須包括幾個因素」。他說：「代表推選也許可基於一個把各國識字人數，對國際政府的費用負擔數目以及該國的資源列入計算的公式。」

上述紐亨物什爾州大學教授羅德氏對於這個問題也很有研究。他曾經發表一個小册，册名「聯合各國——平衡的代表之一個方法」。在這個小册內，他主張國際事務應當由一個四百會員的國際大會主持。這四百代表的選派，一百係以人口為基礎，一百以國際貿易為基礎，一百以工業生產為基礎，一百以各國的識字人數與衛生建設成績為基礎。如果使用這個方法，而以戰前的統計做基礎，則美國應得有七十二代表，英國及其四個白種自治領應有四十四代表，蘇聯應得有三十五代表，中國應得有二十五代表。四強代表的總額在四百會員的世界大會中共為一百七十六名。約佔百分之四十四。他又主張宜乎把任何一國的代表額數定為不超過全體會員的百分之十二。這樣，美國代表減成四十八名，比較接近英蘇兩國的代表數字。他又承認蘇聯的地位，在這次戰後遠較在戰前為高，所以代表人數也應增加。

羅德教授說，有些人主張把一國的領土，原料及其他資源也列入計算，但他覺得最公平而最易為人們接納的票權計算之基礎，莫過於人口數字以及各國人口的成就。

上述羅德蒙氏在四月一日的紐約時報所發表一文中，認為「選擇並不在各國代表人數平等（那會使只有三十萬人口的盧森堡與擁有一萬九千七百萬人口的蘇聯得同等的票權）與單純以權力與人口為基礎的代表制之間。在擬定一個基礎時，我們也必須打算一國的開明程度，它對世界和平的勢能影響，它的維持世界和平的興趣，它在目前戰爭中的地位，它的服膺自由，它的歸依代表政制原則與反對極權國家，以及其他有關的因素。」接着，他主張在世界大會中五強各有代表二十人，而其他國家則有代表自一人至十五人。他認為「這樣，可以消除安全行政院中的多數席次由僅僅擁有全世界人口與權力之極不重要部份的國家之代表把持的危險。」

以上記者介紹了好幾個擬議國際組織中決定各國代表人數的辦法。它們所定的範疇不同，所選的因素也有多有少。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基點，那就是認為國際組織中一切國家平等，各得一票權的辦法是不通的。

在上述許多方案中，記者個人覺得單純以人口數目決定各國出席國際大會的代表名額是最適當的辦法。理由有二：

（一）現代民治的趨勢，代表選舉是以人為本位，而不是以財產或人的成就為本位。換句話說，一個人只能投一票，而不能因為他有財產或功業或地位而可以多投幾票。在國際社會中，我們也應當以人為本位，一國的財富資源多少，生產多少，貿易多少，不應當成為決定票權的基礎。否則在原則上，我們似乎有點開倒車的嫌疑。

（二）人口是一個最具體最容易計算的因素。其他許多因素，例如「開明程度」，「勢能影響」，「維持和平的興趣」，「服膺自由」

等都是極端渺茫而很難測度的，至少不容易從它們得到一個科學的推算結果。又如國際貿易與工業生產，雖然比較有統計數字可稽，但是有的國家，國內貿易大過國際貿易，有的國家，農業生產大過工業生產，何以僅以後者爲標準而不以前者爲標準，也頗難尋得一個圓滿的解釋。

當然採取人口爲標準時，我們可以有兩個限制：

第一、用幾何級數推算，以限制人口衆庶國的票數，或者明定任何一國的代表之數不得超過全體的若干百分數。這樣中國與印度的代表權纔會比較與美國及蘇聯的相等。這是一個保持理論，遷就現實兼籌並顧的辦法。

第二、人口雖然是決定代表名額的唯一標準，但是對於人口本身可能加以一個限制，那就是用以計算票權的人口必須起碼識字，那就是說，必須不純粹文盲。近代各國的選舉大都選民必須親往註冊，有些規定完全不識字者不得投票。在國際社會中，我們也可以規定，只有起碼識字的人纔可以選舉代表，管理國際事務。

但是上述以人口爲比例的代表制，不僅在此次舊金山會議中沒有一國的代表敢於提出，就是在今後若干年的國際大會中也很少有被採用的可能。在這裏，我們有兩項重要工作：第一是懷疑以往「各國票權平等」的那個「天經地義」，由懷疑而研究一個最合理的代替辦法，多做教育工作，改變人們的舊觀念。第二是，在新的理想辦法未被採用以先，我們要勸小國誠心接納去年敦巴頓會議及今年雅爾達會議關於國際組織所擬的方案。我們知道這兩者的內容都有可供訾議之處，但是大小國家各有一票的辦法，以及國際組織全爲小國支配的辦法，一樣有被人訾議的可能。

羅斯福總統說得好：「地獄與天堂都不是一晚造成的」。有一個國際組織總比較沒有好。我們的當前任務，是從速成立這組織，再慢慢設法改良它。

官僚主義的歷史根源與民主

陳伯康

一

妨害中國民主的實現，有兩個主要的因素，一個就是官僚的獨善主義，另一個就是國民經濟活動爲少數人的追求利潤的意識所支配，所以要實現經濟的民主，必須先清算這兩個妨害民主的因素。

官僚的獨善主義，在君主時代，即商鞅所謂『貴貴尊官時代』特別發達，原因是官吏的權力來源出自君主，由上而下，所以做官的人，依恃其勢位權力，來武斷一切，幾乎造成爲一種『權力』就是『是非』的狀態。可是事實上，智慧與權力並不一定結合在一起，有權者並不一定有能，有能者並不一定有權，有權者雖然可同時有能，也絕不會有『全能』。因爲有大權者到底是少數人在君主時代與民主時代都是如此，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有大權者既然是少數人，而且不一定有能，不會有全能。那末權力在他們手裏，使用起來，有時就會因爲疏忽而犯着過錯，不合大多數人民的要求。

所以有權力者用人處事如孤行獨善必爲禍亂之源。

韓非子說：『夫勢者，非能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者，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

（勢卽權勢。見難勢篇引應愼子語。）

這就是說明了果僅僅以『有權勢就有辦法這種態度』來治理衆人的事，就會使人感到『世事無異是非，特有假好惡。』無異是非，『權度不一』就可以使『修義者惑』！

秦法『民如欲學，以吏爲師。』可以說是商鞅的『下世貴貴尊官』的理論力行結果所造成的官僚主義政治的極致。

商鞅生在周秦之際，正當學說繁與，言談詩書游說之士觸目皆是的時候，君主政權世襲已成習慣傳統的時代大家都沒有權力，所以那些游說之士，只能向各諸侯公卿貴人去游說，企圖利用他們的權力，來實行自己的主張。商鞅是看透了這一點，他似乎知道有權力者容易見異思遷，恐怕他的主張，不能貫徹，爲別的主張所破壞了，所以在秦國貫徹了他的主張之後，就定了『民如欲學，以吏爲師』的法，看來似乎是鞏固政權的很好的制度。而不知『吏』有賢不肖，不但有可爲師有不可爲師者，況衆官吏實際上吏並不可爲所有人民之師，而人民中反有可爲吏師爲帝王師者。

依臯陶謨上面說的『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的道理來看，更可以明白禹稷臯陶，也不敢以爲已之功業識見，可爲所有人民之師，而反以人民爲師，以民爲鑑。這種道理，到了商鞅時代就疑了。固然，商鞅能夠確定把握住國民經濟問題的癥結，固然有過人處。但他只知『賢者創法，愚者制焉！』並沒有知道：『不肖者制法，賢者就不能受制於不肖者之法。』所以他只能造成了官僚的絕對權勢，造成了官僚主義，雖然他不爲自己打算而且公忠體國至以身殉。但在官僚的獨善主義已支配了整個政權之後，法令逐漸苛繁，結果秦代不世之功業就完全爲官僚主義所敗壞。這實在是一個最明顯歷史的錯誤。假如商鞅與秦孝公在研究政治經濟史之際，得到『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的結論之後，不願作爲『下世貴貴尊官』時代之續，而重行創造一個『新上賢主義時代』秦代的國祚，也許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當時中華民族的發展，也就不可限量。

官僚的獨善主義，在實行法治的秦代，爲害之烈，史不乏書，但過去歷史，都歸罪於法治，而不歸罪於官僚，也不歸罪於商鞅研究政治經濟史所得的結論缺乏建設性的錯誤。所以後來就因噎廢餐，以偏重人治爲尙。因而人治的官僚主義的流毒，更是層出不窮，人治的結果，就使文過飾非，割損政令的手段更容易運用，因爲官僚們已不必先毀法而後爲惡，不必先制法而後爲苛爲暴。

官僚的獨善主義形成之後，所有官僚，就以爲自己所見的『是非』，爲唯一的是非，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們認爲一切的知識學問能力的有無價値，都是他們的權衡可以衡量出來的，此外一切都是錯誤。

可是依自然律來說：『物勝權則衡殆』，在官僚知識能力之上的知能，他們就衡量不出來了。所以歷代雖然側重人治，偶遇學識較佳的人物任官，他們也會一反官僚的獨善主義，來實行『周諮博訪』以求進步，以補助他的識見未周之缺陷。不過這是偶然的。賢君良相，在君主時代，固爲人民所渴望，但人民並沒有權可以選君擇相或選擇官吏，而只能君主或大臣去選擇官吏，所以官僚主義的流風餘韻，不絕如縷，就是不民主的結果。

二

元淸兩代以後，官僚的獨善主義，流毒更爲深廣，元代流毒，中經有明數百年，並未滌淨，至淸代反而變本加厲。此點以異族統治爲根本主因。元淸二朝代，所有主管長官，可只做官而不管事，而管事者，則爲十足的奴才，只供驅使，爲他們奴役人民而已。奴才的特點，與幹部不同的地方，就是幹部不但要知有根本而兼要顧及枝葉。要知有上有下，而奴才則只知有上而不知有下。奴才不敢在主子面前說一個『不』字，而主子不懂的事奴才也不敢以是非來力爭。所以元淸二代一切官吏，在蒙人滿人面前是奴才，而在人面前却是炙手可熱

的官僚。雖然他們不能獨善，但必須善其主子之所謂善。他們視人民爲牛馬家奴，任意壓迫摧殘。當然這是必然的，在政治上如此，在經濟上也是如此。元清兩代的官僚獨善主義性質，與清代其他各朝代不同，就是元清兩代，只可以說是奴才性質的官僚獨善主義，而其他各代，還可以簡稱爲官僚獨善主義。所以元清兩代的流毒，最爲深廣。由所謂佐在那些中之功臣，也不能實行其獨善主張，就可以證明清代的統治者與人民，實際上就是對立的兩個階級，並不是官民一體的『子萬民』的中國的傳統精神。

自從『官僚的獨善主義』，演變爲『奴才的官僚主義』之後，一切的思想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就都被桎梏在奴才的短視與淺見裏面，主子沒有想到的事，他們不敢想，主子沒有吩咐的事，他們不敢做，他們的意識範圍都局限在主子的好惡的圈子裏面。一反中國歷史的傳統的民本主義。所以能夠把握住大多數人民的要求的意識與主張，要通過他們以及其主子的心竅，比駱駝穿過針孔還困難。此種意識的流毒，直至民元鼎革以後，仍然在作祟，鼎革後各省督軍各行其是，官僚獨斷一方， 國父孫中山先生雖有能把握住大多數國民需要的主義及計劃，都不能實行，原因就是一切文武機關，多被此種官僚意識所支配盤據，以自然科學的道理來解說，卽是一個空間，不能同時容納兩種物質，同樣情形，一種職能或官能，也不能同時受兩個不同意識的支配。所以革命的領導行動告一段落之後，他們只認爲富貴逼人而來，而不認爲是一種服千萬人之務的機會，已由革命的行動帶到他們的身上來。事實上正正相反，所以我們一讀 國父遺敎（參見孫文學說第七章）見到 國父精主義不行，國族不振的罪歸之官僚主義的議論，實在不能使人更佩服 國父的識見。

目前，我們要迎頭趕上現代國家，要實行經濟的民主來配合政治的民主，必須遵奉 國父遺敎，澈底來清算此次官僚主義的流毒。

章實齋說：『學於衆人，斯爲聖人，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我們不妨給另外加上兩句：『學於官僚，斯爲奴才，學於奴才，斯爲奴才之奴才。』這是顛撲不破的理論。我們知道民主就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的道理。一般官僚，謹愼地保持其官僚的尊嚴，往往只能在一個小圈子裏面去運用鑽營的手段！『愼思明辨功夫』似乎做得很夠，但『博學審問』就不行了，所以他們治理衆人之事，就只能以私的利益爲出發點。因此就免不了有偏見。同時因爲他們只知有自己的利益，不知有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能『因民之利而利之』。周秦漢唐盛世而外，歷代對國民經濟措施大都忽視，僅知有財政的誅斂的官僚主義作風，已經根深蒂固了。有宋一代，雖出了一個王安石，但王安石不先事剷除官僚主義而卽急急於建設民本政治經濟的措施。用了不少『只能爲順』的人物，遂爲當時諸君子所詬病，結果一切建樹，爲當時的官僚勢力所摧殘，就是因爲他所努力的 Plus，抵不過官僚主義破壞的 Minus。假如王安石當時能夠實行民主政治，就可以使他犧牲畢生精力所研究的政治經濟結論及其所建立的制度，能夠獲得廣大民衆的擁護與維護。當時士大夫的意氣之爭所能發生的反作用就不會有決定意義。可惜當時民主制度還沒有發明，官僚主義的苟安思想支配一切，王安石雖得皇帝之寵信，也因爲積重難反而失敗了。我們知道，淸算官僚主義的傳統力量，只有人民，因爲人民的利益與官僚是相反的，人民的力量比官僚大許多倍，人民一日不能作主，官僚主義就一日不能淸算，個人或少數人的聰明睿智與力量，只能爲人民服務起領導作用，不能直接去淸算官僚主義或剷除官僚主義。把這一點認識淸楚，屈原的『離騷』，韓非的『說難』，都可以認爲是一種時代的悲劇。實際上他們都是把對象弄錯了，他們要求有權力者應該懂得是非，在國家主權已成爲世襲而且可以私相授受的時代，有權勢者根本就生活在特殊的環境裏面，和人民隔離，其所以不知是非，就是因爲不曾體驗民間的疾苦，不知人民的疾苦是什麼味兒。歷代開創者及其幹部所以能夠實行恤民之政，原因是他們多來自下層或民間，比較知道『民本』的意義，善於保本，所以開創時代朝氣比較旺盛，用人行政也知道以效率來定去

留。但有的不夠一代，有的過了幾代，就不行了，原因時常是君主的昏庸或官僚以漁肉人民爲當然權利，不管國民經濟生活的疾苦。『旁詔求利，割損政令。』不管君主昏庸或官僚狠毒，二者有一，國民就遭殃。國民遭殃的開端就是國民經濟秩序因財政的誅求而紊亂，而造成叛亂，而促成官僚階級的爭權奪利，傾軋糾紛。這都是政治經濟不民主的緣故，因爲政治經濟不民主，人民的最低經濟生活沒有保障。本來中國古代政制，愈接近古代，民本的成份就愈多。因爲民心的向背表現，就是人民的取捨行動，『口碑載道』或『民怨沸騰』，就是民意的表現，從前雖無電報新聞廣播，但周設採詩之官，以徵採眞正民意。

三

現在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正在開展民意憲政運動，我們檢討歷史根源，爲的是不願重複過去的錯誤。怎樣才能夠不重複過去的錯誤呢？先決的條件，就是清算官僚主義，建立政治經濟的民主制度，有人說應該先行清算官僚主義，我却以爲應同時動手，因爲經濟如流水，無論任何經濟事業與人民的經濟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止下來，例如不把清算官僚主義和建立經濟民主的工作同時準備好以後，再來着手，只片面實行清算官僚主義，有時就會使國民經濟生活更紊亂，使國民失望。我們應該知道做一件事開始準備得好，就可以說一半已經成功了。沒有準備，一定會有意外的失敗。

我們知道官僚的僞善主義的流毒，不是武斷，就是推諉，他們的目的只在魚肉人民，實行經濟民主之後，一切稅收，財務收支，以及資本，企業，或個人的經濟活動的軌範，都要由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來確定，並監督官吏去執行，官吏就無從魚肉。官吏不能魚肉人民，官僚主義就沒有溫牀，官僚主義沒有溫牀，『政明訟現』，政治與經濟配合一致的民主，才能夠實現。

四

當然實現民主，要人民能夠行使四權：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前兩權是富於制度法規的建設，後兩權是屬於人事的決定。治法、治人、兩方面都是人民可以作主的，只有這四種民權實現之後，經濟的民主，才有可能，否則徒託空言而已。

在各個民主先進國裏面，從前因爲只注重實行政治的民主，以致許多人民，都對政治不感到興趣，而對官僚的『瞞上欺下』好像認爲是他們應有的權利，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僅有政治的民主不能算是一種健全的民主制度，因爲一般人民感到需要的是經濟生活的保障。

人民運用四權來表現經濟的民主精神，應從鄉鎮市區保甲做起，凡一切能說話能生活的人民，成年以後，都應該給他或她此項權利，使他們參加創制、複決、罷免、選舉活動，在鄉鎮、市區，我以爲不應限制任何一個人民獲得此項權利（當然漢奸叛國罪及精神病愚蠢除外），如果用識字來限制他們，是不妥當的，因爲文字的存在固然可以幫他們多了解一些東西，文字的存在並不是爲了取消一部份人民的民權而存在的。從鄉鎮市區選出來的代表，固然可以限定識字的比率，以次遞增，直至國民大會代表，就可以限定必須完全識字。但各級代表，對人民負責說話或表達重要民意，都要以語言爲主，不必說現代廣播速記及錄音技術進步，且很經濟，應使各級代表對選民負責，平日言行，自當檢點，以樹立信用，我相信民主實行之後，『口恐無憑』這一點，大可不必擔心。因爲大家『耳聞目擊』，『怨聲沸騰』或『口碑載道』都足爲憑。

在鄉鎮市區發揚經濟的民主精神，來促進政治的民主，建立政治民主的眞實基礎，使鄉鎮市區造產，捐稅，鄉鎮日常經濟生活條件的改進等，都成爲重要的工作。此種地方的經濟民主實行之後，必定可以使各地方男女國民，知道如何不斷求大家物質生活之改進。同時也因爲參加此種運動而能夠知道共同生活秩序的健全，是物質生活的保

障。

實行此種地方性的經濟的民主，逐漸鍛鍊地方人民，擴大其視野，把握住更多的經濟條件，理解更多的經濟發展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就可以發揚更偉大的民主精神。由近及遠，從卑到高，特殊的，一般的，從生活方面，從工作方面，去培養健全的民主精神，建立每一個男女國民的獨立的人格，養成酷愛秩序的生活習慣。當然民主的秩序，是一種軌範，不是一種統制，軌範具有積極的意義，就是以尊重他人的自由為獲得自己自由的條件，好像在運動場上面賽跑一樣，假定有十個人在起點，都佔有一定的空間，彼此距離有度，誰也不能阻遏誰的前進，競賽在同一跑道上，結果有的跑上前面了，有的落後了。只看個人的毅力可以跑到什麼地方，並沒有誰可以鼓一時之勇，阻住你的前進之路。競賽有罰規，這種罰規，也是軌範之一。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 國父的民權主義的眞平等主張。這樣，優勝者自然被尊敬，自然可以站在某項事業或生活的領導地位，使某項事業或生活獲得進步的領導，時時保持『旣濟未濟，自強不息，的精神』使後來的人可以打破前人的最高記錄。只有這種民主精神，才能夠使人人奮發有為，來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五

總而言之，自從中國民本的政治意識被歷代專制權力消滅之後，官僚獨善主義就代替它來支配了一切。現在要消算官僚主義，同時建立民主制度，就是建立一種保證當政者時時可『舉於衆人』的制度。

明日的世界是否會左傾？

吳澤炎譯

跟着戰爭結束以後國際關係的波譎雲幻，以及許多國家內部所發生的政治糾紛，逐漸使人慢慢明瞭一個事實：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崩潰，只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造成舊世界混亂紛擾的種種因素，仍舊在發生破壞的作用。除非人類能在一個統一的建設的目標之下，把破壞性的因素置於控制之下，則新時代的開端也許證明只是剎那即逝的曇花而已。在各種紛擾因素中最有力量的，一是根源於強橫政治的列國的旣成利益，一是存在於國家以內階級利益的對立。大體說來，在戰爭中及接着戰爭由東歐逐漸擴布的社會主義的潮流，正在爭取優勢的地位，可是直至現時為止，這股潮流之中因為一則其中顯然包括極強烈的極權主義色彩，與西歐的視個人自由為第一的自由主義傳統觝觸，再則它對各國原有民族主義之變本加厲的影響，所以在歐美正在或已經引起了一個反動，形成為左傾的一種心理恐懼。造成這種反響的可能因為各國的旣成利益受到了威脅，然而也不全是如此。這種思想的鬬爭勢必影響到各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並通過國家而影響到國際關係的演變。下面的兩篇文章，是代表兩種不同的看法，原載紐約時報週刊六月十七號及廿四號。拉斯基(Harold J. Laski)與海亞克(Friedrich A-Hayek)的意見是對立的，一個是代表社會主義的立場，一個是站在自由主義的觀點，在前一篇文章中是重於前途的瞻望，在後一篇中頗有懷舊的情緒，至少其結論是頗具悲觀的色彩的。拉斯基草此文尚在英國大選結果揭曉以前，工黨執政以後，拉斯基在工黨內的發言地位似乎反較前為低了，可見社會主義的潮流的前途，實在恐怕未必像

拉斯基文中所表示的那樣一帆風順所向如意。——譯者

一 正面的答覆

我們正處身於世界大變局之中。這個變局是自宗教改革以來，或自十八世紀中那波譎雲幻的四十年以來所得未曾見的。那四十年起自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亞丹斯密「原富」及吉朋「羅馬帝國興亡史」的出版，法國繼堵哥（Turgot）下臺以後由君民一致進行眞正改革的希望之全部幻滅，而以拿破侖在滑鐵盧的戰敗投降始告收場。

變局並非是由戰爭而起的，雖則戰爭大大的增加了變局的廣度和深度；戰爭毋寧乃由變局而起。我們應該把自一九三九年的可怖的六年，看做基本上只是一個大規模變動的第三次登峯造極的表現，過去一九一四年的大戰與蘇聯的革命，就是兩次最富戲劇性的形態。

動盪變亂之局的怒焰，是否將隨德國和日本的失敗而告消歇，或者戰爭的終止，只是以另一形式再度爆發以前的先奏，現在我們誰都不能說定。即使聯合國家能夠任意支配他們的失敗了的敵人，所有各重要的問題，顯然仍有待於解決。

我們仍得去尋覓共同的價值；我們仍待發現可能把權力與正義融合爲一的制度；我們仍須去擴大形式的民主政治：形式的民主政治，限於狹隘的少數寡頭，而在經濟的領域中，原則上將物質的利益限於少數的分子。

在戰事結束之時，各地以創深痛鉅，倦極思靜，很可能成爲脫卸了戰爭負擔的靜止狀態。但是除非我們已經解決了由時代的革命性所引起的問題，我們就說不上已經安安地渡過狂瀾抵達安全的彼岸。

我斷然相信，在今後的五十年中，我們將從事於改造我們文明基礎的艱苦工作。我們對於下面的緊急問題必須作一決定：如何去運用科學授予我們去支配的龐大的生產能力？在運用生產能力的兩種制度中，一種制度是使少數人獲得雄厚的財富，而屏斥社會中絕大多數，使之過着在物質舒適或精神幸福上都是貧乏的生活水準，另一種制度則根據社會消費作有計畫的生產，如蘇聯所產生的；在兩者中究竟選取那一種。

約當宗教改革時代所產生的資產階級文明，它的所有基本假定現在正在遭受挑戰非難。單是私人利益的競爭便可產生秩序良好的國家這一種信仰，現在不再容易使人相信了。我們不再能強行使人信服黃種人和黑種人必須心悅誠服擔起白人負擔的原則了。我們不能再要羣衆信服企業家的眞知和智慧，爲創造文明輪廓最良好合適的型式，企業家的既成利益已使文明受了大大的損害。我們正置身於新世界的門前，如果我們要主宰新世界所展開的遠景，我們需要新的引導。

森邱・本薩（Sancho Panza）說過，「只要告訴我你今天下什麼種，我就可以告訴你明天將收什麼果。」我們過去所種的，業經世界所公認，只是一些法令；這種法令促成了把人分成爲少數主人多數奴隸的世界，少數人綜攬統治大權，而絕大多數的無力的大衆，捨勞動與服從外別無其他的任務 。普通的人民正在自歷史的暗光中湧現出來，並且正在要求新的地位。直至現在爲止，每個社區由利用勞動國家權力所能支配的所有力量，反對他的要求，拒絕給他新的地位。

他與過去一樣，好像一位在後臺待命的戲子，心急地等待輪他精神振奮踏入舞臺的知照。他也許會出場慌而趦趄不前，他也許一時錯入了場，另一個時候也許他忘了原來派定他說的臺詞。但所重要的，他已經強迫把劇本改編過，如果要劇本在戲院內順利出演不生紛擾，就不能再仍派他當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或不開口的跑跑龍套。他開始要求，在生產劇本中他有充分參與的權利，如舊的舞台經理不理他的這種要求，自己就得倒霉。

所以我相信，到了財產的關係必須根據人與大衆利益確定之時，我們就正在走進一個新時代中；我相信，任何有組織的社會，第二條路徑就只有劇烈的衝突，直至財產關係重行確定纔告終止，例如蘇聯根據人民利益確定財產關係而使衝突終止一樣。

現在的各種跡象都表示出，跟着希特勒主義與軍國主義日本的崩

潰，遍布歐洲亞洲與傳統秩序性質不相容的各種力量，將獲解放之機，其不相容的程度，正同資本家的需要和要求之不能與封建制度的習慣並行不悖一樣。

並且我認為，在傳統秩序現有體制以內所作的讓步，顯然難於滿足其所遭遇的要求程度。而且幾乎無論在什麼地方，大部分以對大衆讓步形式提出的意願，都是遲遲其來，至於使之失去了自然好意的外表，如早在五十年前也許很可能打消作更根本改變的需要。自然各國的發展不會是一律的。在一個勝利而擁有雄厚資源的國家如美國，既成利益的力量將使國內的資本家的統治權，較之像在法國意大利那樣損痛鉅的國家，可以維持較長的時期。

因為國家戰敗，結果使曾為人民大衆所尊崇過，對人民大衆慣於運用心理支配大權的人們，悄然而逝。這個顯然的事實，可以南斯拉夫與希臘為例，比利時也許有同樣情形，這些國家內王室之能否復位，其有賴於本身對人民大衆的吸引力者少，而有賴於英美一類國家維持現狀的決心者多；不是為了王室的本身，而在圖阻止趨向於劇烈的社會改造的運動。

依我判斷起來，想保持我們文明於一九三九年所根據的假定，不管任何努力，都是不會成功的。因為，首先在重建曾為德意所蹂躪的國家中，我們的努力，無論在設計重新的建設或決定建設成就之先後次序，都需要利用國家權力的直接干涉。至於那些戰敗國及其附庸國家自然更加如此了。即使在戰勝國家，在一個很長的時間以內也不能回復到英美代表性企業組織所熱烈鼓吹的『企業自由』的原則。

因為無論那個國家的政府，如果廢除因戰爭而有實施必要的經濟統制就不能，避免迅可變為社會騷動的經濟紊亂的危險。跟着經濟紊亂所連帶發生的則為大規模的失業。現在大家都已明白，在發生大規模失業之地而欲保存政治的民主，不假手國家權力的嚴峻干涉是不可能的。這種干涉無疑也許將採取一種野蠻的反動的方式，如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那樣，核其本質言實在就是鎮壓所有的民主制度，而以獨裁為代。不過要在英國或美國實行這一套，就難於避免內戰的發生，而內戰又將引起的一場大企業的危險性的賭爭，無論結果之為勝為負，對大企業也許一樣的致命。

統制大概是一定會維持的；很可能在繼續統制之時，因戰爭而變本加厲的種種社會的和經濟問題，例如居住問題，將使對各種活動有加以統盤計畫的必要，因活動規模之廣，所以計畫的工作就祇能由政府來擔任。

在所有這些中，我們不可抹去蘇聯所將運用的影響，以及蘇聯以其實驗工作而在每一個國家內羣衆心理上所享的威望。就一個人所能猜度的程度而言，英國輿論的方向，照補缺選舉，曾經舉行過的抽樣民意測驗，以及幾乎無論何處政治集會的情緒等看，我們殊難不結論說，人民的心理是進步的，而且甚至是激進的。這就等於說，在英國的大選中，多數派的保守黨至少說形勢很岌岌可危，也許會受一場嚴重的失敗。即使說保守黨仍能保持政權，它所將遭遇的各種問題，仍是不易在保守黨政策的界限以內所能解決的。那就是幾乎可以斷然的說，即使保守黨政府能倖留，也不會有極長久的生命，第二次的總選，將使英國堅決的登上社會主義改造的大路。

世界正在向左走，而且是無法抵制的向左走。我並不否認在革命的長程中，某些地方發生暫時的頓挫或某些地方發生反革命的可能，但無論何地都有一種日在增長的信心，認為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不能根據傳統的秩序而得解決的。事實上在大多數國家的羣衆心中，已經完成一個革命，這種情形在歐洲和加拿大是如此，在中國與印度亦無二致。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新向，祇是淪陷國家內英勇游擊戰士經長期痛苦的悲慘經驗後所提要求的前奏而已。

正一百年以前海涅（Heine）寫過，「過去祇有某一些人有了自由，現在必須把自由傳至大衆本身，傳至社會最低的一層，變為人民的東西。」這就是下一世代的中心問題。

世界的平民對此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如果我們試觀戰爭的全

景，則戰爭實在不過是阻止這種調整過程的一種嘗試而已。阻止的努力失敗了；跟着它失敗後面的動力，為一種普遍的要求自由的熱情，祇有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纔能予以滿足。新秩序的建設，並無可以代替的第二條路徑；要有，就是我們文明的破滅。

二　反面的答覆

「一個怪物正在歐洲出沒——共產主義的怪物」。這一句「共產主義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開場白，在它寫下九十五年以後突然具有了一種新的意義。從東歐至西歐正在慢慢蔓延一種新的恐懼，在未來的歲月中，這種恐懼將在左派的政策中不下於右派的政策中表現它的痕跡，這種恐懼心不能說是任何存心故意的宣傳結果，實際上報紙在討論到那些極可引發國際複雜糾紛關係的問題之時，正保持一種可以嘉許的緘默態度。

曾經親眼目擊實際上推行的小規模共產主義，如何與他們過去對共產主義所抱設想相合的男女們，把這種新的恐懼加以擴布。這些個人經驗的報告，其影響在歐洲大陸方面特為顯著，因為在大陸方面有許多人，曾經連接看到在德國和蘇聯統治之下所發生的情況，他們現在回國來又報告他們自己的故事。但在英國，事實也漸漸的為大家所習知了。

自從那些極端左派的政客們受到狠狠挫折以來，輿論已經發生一種前進的改變。這些政客力為希臘的叛軍捧場，等到一接到英軍抵達當地的消息，卻就此掩旗息鼓了。最近由在南斯拉夫及其他地方士兵方面所透傳出來的新聞，對輿論的改變也有幫助的作用。

這種大衆概念的改變在開始活動之時，在若干左派知識分子領袖之中，實際上已經表現出越來越增加的懷疑與躊躇的跡象。有許多人已經看出無限制擴張國家對生活各方面的統制權所發生的危險，並開始看出，社會主義的傳統目標可能成為對個人自由的一種威脅。

這些人現在正在忙於設計他們希望可以避免這種危險的新社會主義計劃。他們一方面仍為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卻不像過去那樣的武斷，那樣的自信不疑，也比較準備去檢討他們舊有的理論。

不過在開始面對最近過去所有教訓的兩派人之間，尚有數量龐大的羣衆在，後者對蘇聯軍事成就的欽佩之忱，適好加強他們原有的政治上對蘇聯的同情心，使之較前更加不願去面對不愉快的事實。所以非經長久的時期，使他們對戰爭的經驗有準確的看法，他們纔會承認軍事上的英勇，不足為評斷某種社會秩序之優劣的證據。不過祇要這種的情緒繼續下去，就使若干比較不負責任的領袖得以有機可乘。這樣的人並不缺乏。現在有少數的著名人物，他們既未從過去學習些新的東西，眼看失望的心理正在自己圈子中人間蔓延着，於是聲調便越來越尖銳和歇斯底里；他們希望還藉最後的一擊，可以乘平心靜氣的經驗發生其作用以前，利用仍流行於大部分羣衆心中的幻想，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雖然似乎連自己都不知道他們所領導的方向，卻想由每天複述革命之不可避免，使公衆麻醉。他們毫無內疚的鼓勵種種他們明知不能實現的希望，祇要這些希望可以幫助摧毀他們所痛恨的制度。

不管其中有些喊得如何響，作為一種政治力的政治極端主義無疑已告壽終正寢，至少在英國。祇要看在仍為共產主義者的人中很少敢於公布他們的立場，就是再明顯不過的特徵。在英國已經為本身生存而戰之時，共產黨繼續作反戰的宣傳，等到希特勒迫使蘇聯加入戰爭，共產黨突然改變態度，這種行逕已經使共產黨聲譽掃地，而且也許很不錯的。現在在歐洲的其他地方，共軍的迫近似乎很快的使當地的共產主義失去了它的號召力。在許多國家以內，實際上舊的社會主義政黨成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領袖，這是有良好的理由的，因為經驗已經表明，舊式社會主義的領袖實在最有可懼的理由。

不過所有這些不過是說，在知道自己的趨向和不願盲目接受極權社會主義的民族中，是沒有什麼危險的。西歐還是有於不知不覺趨向於極權式社會主義之危險的，危險的主要根原，乃由大部分左翼政黨的絕對顧預和思想上的紛亂。在直至最近還大聲疾呼歌頌『偉大的共

產主義實驗』的人之中，有許多人雖然表現出一種可以注意的重要的新的不安心理，明白表示他們並不認蘇聯的制度爲眞正的社會主義，然而他們既無與極端派分子完全脫離關係的勇氣，並沒有知識的能力，草訂一個排除社會主義中極權特色的新的進步綱領。

幾乎無論何處的激進黨，都變成了純粹便宜行事的政黨，缺乏任何明白的原則，因此之故，雖緩流向同時他們開始恐懼的極權式社會主義。他們迄今甚至還未認識『人民陣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正是眞正相信民主政治的人，起而反對那些完全爲了愚異纔用民主政治一詞的人的時候了。

這種知識上的頹頓不限於社會主義政黨，在大部分所謂歐洲的自由主義者中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們不承認他們理想的一大部分已證明爲幻想，也不承認跟着主要社會主義的聲名狼藉，大部分他們的以前目標也已經失去其合理性了。一方面新經驗的動力正在祇是慢慢的逼使他們修正原有的理論，另一方面由他們過去所得教訓而造成的餘勢，仍在驅使他們走到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去。

這種一般混亂彷徨的特質，明白的原則與理想之缺乏，爲什麼會在現時特別的尖銳化和顯著，是有若干特殊的理由的。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也許是最難爲美國人所瞭解的，是由於在過去六年中對關於政策的重要問題禁止正常討論的結果。就歐洲大陸的大部分而言，這原是容易解釋的，但爲了不同的原因，英國也有同樣的情形。在英國由於爲戰爭目標的知識分子之徹底動員，以及有嚴格的條例禁止臨時的公務人員不得參加關於政策問題的討論，致使凝成思想的正常程序，幾乎完全停滯。

在最近討論中最顯著的人物，幾乎完全是那些因爲某種理由不能在戰爭努力中消磨其精力的人。看光景他們不會長久保持其地位。現在有很好的理由可以希望，一旦那些爲戰爭勝利而工作的人參加貢獻了觀念的形成，英國的政治趨向定會採取與現在光景大不相同的方向。

所以這種形勢的歸趨，主要須賴各種不同因素將發生作用的速度而定。可以改變歐洲行之已久的致命途徑和防止歐洲文明完全崩潰的各種因素，現在已在發生力量了。現在有種種的理由可以希望，無論何處無論何時重行開放關於社會秩序的重大問題的自由討論，則理性的力量，基本相信個人自由的人，就可以得到長時間來他們所沒有看到了的代表力量；在西方文明尚留剩，圈子以內的人，在若干因極權暴政的教訓而重新認識個人自由價值的人方面，將可以得到新的擁護。

但是這種覺醒是否會及時而臨？會不會姍姍來遲，直至統制一切的國家權力已經發展到無法回復的程度？這大部分自然要看各不同國家於戰後第一次總選的結果而定。如果由執行社會主義的政黨得到勝利，也許很可發生不幸的結果，因爲他們在先造出來的補種希望，也許可以驅使他們甚至違反黨內比較明知的領袖的較爲良好的判斷，採取使他們國家無可挽救地踏上極權之路的步驟。

與各黨之間維持平衡關係一點至少有同樣重要性的，爲在政黨內部將發生些什麼變化。目前思想混亂的另一表現之一，即在有些人看來，政黨之間對於若干最基本問題的意見差別，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在政黨內部中間，也存在有幾乎與政黨之間同樣程度的意見出入。所以在普通認爲保守的政黨中間，也儘有要求以發展極權式國家權力視爲本身目標的人，他們人數之衆並不比在反對派中作同樣主張的人數爲少。而在左派的政黨中，有不少人之所以廁身其間者，不過是因爲他們對於某種與保守黨目標有關的利益，抱有不無理由的懷疑心理。

因之保守黨在英國總選中獲得勝利，其不足以保證危險的趨勢可告終止，正好比社會主義黨的勝利未必即將促成致命的陷溺。就保守黨所可能說的，它可以獲得寶貴的時間以澄清輿論，使人民瞭解當前的問題，而使在前一時期中的惡果：對某種事實不能工作坦白的討論，和歌頌某種形式的極權主義的人可以不受阻礙運使他們的影響。

逐漸冲淡。

在歷史的眞正嚴重關頭，誰都不能逆料有怎樣的結果。所無疑的，接着戰事結束以後的幾年，與戰爭本身的結果一樣，對歐洲的將來將有決定的作用。很可能歐洲的文明，雖則在對一個極權國家的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在大西洋的此岸會不得再行抬頭，和註定將在一種新暴政之下消滅，不過迄至現在，我們還無須過於悲觀。

如果歐洲不至墮入暴政和野蠻主義之中，得到出路返歸於它的偉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使之作新的發展，要如此則自一八四八年至一九四八年這一個世紀，在將來也許很可能被稱為社會主義幻想的世紀。在這個幻想的世紀中，由於純粹知識上的錯誤，結果使多少的善意引導成為破壞人們最願保存的各種價值的力量，而且破壞得幾乎很成功。

對於站在本世紀末的我們，最悲慘的遺產之一，就是這種的幻想已經促使幾乎所有進步的運動歸於消滅，時至今日，乃使普通的人民，遍處於兩大之間，一面是信奉一種毒害的綱領的團體，另一面是其中多數人顯然似乎態度反動的團體，政治上全無選擇的餘地。

珍珠港事變的前夕

——一幕美國對華友誼與日本對美詭詐的回憶——

尤亞賢

第二次大戰現已全部結束，驕橫不可一世的日本，現竟對麥師帥俯首聽命，這不僅是八年前日本的軍閥曾未料及，即同盟國人士亦很少人想到日本於本土未被攻入前即無條件投降，看到今日日本的遭遇，我們不禁有無限感想與回憶，美日之終不免於一戰，雖早為有識者所能預料，但美國為一民主國家，要她對日宣戰亦頗不容易，想不到愚笨的日本軍閥，因為在中國得了一點便宜，便不知天高地厚，竟於四年前忽對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要塞珍珠港施行突襲，逼得不願作戰的美國亦毅然對日宣戰，美國的宣戰便是日本命運的決定因素。

記得在珍珠港事變未發生前，美日在華盛頓談話時，有許多不明瞭美國對華基本政策的人士，頗為中國不安，以為美國可能犧牲中國與日本妥協，有識者則知此種顧慮為毫無根據，惟當時交涉眞相，報紙記載亦不詳盡，尤以中國為然。眞相愈不公開，外面之猜測亦愈複雜。近兩年來各國報章雜誌，揭露當時交涉之經過漸多，眞相亦日漸明瞭。筆者願就所得較近之材料，撰寫此文，希望我全國人士能因此對美國作進一步的認識。

自第二次大戰爆發後，美國人民雖反對侵略，亦不主張美國本身加入戰團，至於行政當局與國會中之孤立集團則竟背道而馳，前者知戰爭之不可避免，欲逐漸引導國家入於備戰的途徑，後者認為遼遠的政策應不至牽涉美國，堅決不離開避戰的方面，前者利用憲法賦予的權力牽制，或竟干涉侵略國家的行為，後者則利用憲法賦予的權力，阻撓行政當局對侵略者採取有效的措置。日本與德國均利用美國國會中孤立派的力量，一方面撒播逢迎孤立派的議論，另一方面則擴大其侵略的範圍，惟本文着重在揭佈美日交涉最後一幕的眞相，對於美國與軸心之交涉，擬避免涉及，以免文離正題。

早在一九一四年三月，美日已開始商談，希望能獲得一解決兩國間爭執的方案，但英國在天津的讓步促使美國廢止美日商約，英國封閉滇緬路促使美國借款二千萬與中國，此為日本之所不能忍受，另一方面，同年七月底日軍開入安南亦為美國所憎惡。兩國商談在此種情

況下當然不易繼續，八月英美兩國領袖在大西洋某地宣佈大西洋憲章後，日本首相近衛旋亦致函美總統建議仿照英美兩領袖之成規，美日兩領袖亦約地會晤。不過美總統因爲看不出美日之間在當時有何成立妥協之機會，故對於近衛的建議，暫不作具體的表示。

羅斯福總統雖不能與近衛會晤，美政府並未放棄對日妥協的希望，美國存着此種希望的理由乃是認爲日本方面當不乏溫和明哲之士，應當瞭解日本與歐洲軸心作伙伴，無論勝利或失敗，均不合算。德國若失敗，日本當然跟着失敗，德國若勝利，日本却不跟着勝利，而要推德國之馬首是瞻。因爲這種理論，美國才對她存着一線希望，希望她可以覺悟，因爲希望她覺悟，才避免刺激她。一九四一年八月美政府與日本駐美大使野村繼續商談，更足證明美國政府認爲與日本妥協還是可能的。

此外還有兩種理由促使美國與日本繼續商談：(一)中國與日本繼續作戰消耗日本的人力與物資，英美對日的經濟封鎖使日本無法補充她的物資，如此時日愈久，日本作戰的能力愈下，結果日本不鋌難以擴大侵略範圍，而且不易保持已獲的勝利。(二)德國派到遠東工作的人員正極力設法使美日商談不能成功，因而美國更避免對日交涉的失敗。

近衛對美覓取妥協的努力，其動機也許不甚純潔，但彼在日本，究爲溫和派的領袖，至少在德國侵蘇軍事尚無把握以前，他尚主張不要操之過急。本年十月德國向莫斯科猛攻，日本國內軍閥相信歐洲軸心可操勝算，遂不許近衛採取溫和的措置。德國對莫斯科之發動攻勢係在十月二號，兩星期後近衛內閣倒台，由軍閥領袖東條組閣，根據美國後來派往夏威夷調查珍珠港事件委員會之報告 (Robert's Commission Report)，十月十六日美國陸軍部與海軍部因日本內閣之改組即致電夏威夷方面負責軍事當局，令其提防日蘇間可能的衝突，與日本對英美突擊的可能，但仍令其謹愼處置，不得刺激日本。

東條就職以後，頗使人詫異的，不僅未終止近衛任內所發動的美日會談，而且加派來栖三郎以專使頭銜赴美，協助野村與美當局覓取妥協，這是一件不可預料的，也令人詫異的措置。也有人猜測這是一種煙幕，以便日本完成她的準備。美政府對來栖的使命雖不無懷疑，但因爲要極力維持太平洋上的和平，仍靜待其來以觀其建議。

日本的建議係於十一月二十日提交國務卿赫爾，十二月七日美政府卽將該項文件發表，其中包括下列數點：

(一)日美兩國保證，除安南外，不派遣軍隊至東南亞與南太平洋任何區域。

(二)兩國政府相互合作，其目的在使兩國獲得荷屬東印度方面兩國所需要的物品。

(三)兩國政府相互允許恢復凍結資金前商務的關係。美國政府須供給日本所需要的汽油量。

(四)美國政府允許對於恢復中日間和平的努力，不採取任何有妨礙的計劃與措置。

(五)日本政府允許於中日間恢復和平或太平洋方面樹立公平的和平時撤退其在安南的軍隊，並準備於此協定簽字後將駐紮安南南部的日軍撤至安南的北部。

日本更要求在中日兩國恢復直接交涉時，美國不得採取任何足以妨害恢復中日間和平的行動。

這個提案簡直是請美國犧牲她的主張，日本却不能絲毫讓步，她要求美國停止援助中國以便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同時美國須允諾供給日本汽油專作攻擊中國之用。與此種建議有關的在遠東方面還有一段插曲，卽美日在華盛頓商談時，希特拉親信德國駐天津總領事魏德曼 (Captain Fritz Wiedmann) 亦在重慶與中國政府與日本議和。德國此種努力顯欲離間美國與中國。如果華盛頓政府對於日本作任何讓步，德國必定向中國稱美國已背棄中國，因而勸中國與日本媾和。由此觀之，來栖之在美京與魏德曼之在重慶簡直是東西互爲呼應。

但是日本在美國與德國在中國的努力俱告失敗。中國政府對於與

日構和問題，除日本完全退出中國外，根本不予考慮，日本對華每一次和平攻勢均未得到有益的反響。美國對日本的建議亦根本不能同意。美政府一方面由海軍作戰參謀長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致電太平洋美海軍當局警告日本有襲關島與菲律濱之可能，令其謹愼提防，另一方面則草擬『美日間成立協定建議基礎的大綱』 Outline of Proposed basis for agreement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以爲談判之基礎。該項大綱係十一月二十六日提出，其中重要的包括有下列各點：

(一)美日政府將努力使英國、中國、日本、荷蘭、蘇聯、泰國，與美國締結多方面的反侵略協定。

(二)兩國政府將努力使美國、英國、中國、日本、荷蘭與泰國政府締結一種協定，各政府根據此項協定保證尊重法屬安南領土的完整，如遇有威脅安南領土之事件發生，諸國政府即刻相互磋商……協定並應規定簽訂本協定的各國政府不應從安南覓取或接受貿易，或經濟上的優惠待遇。

(三)日本政府應自中國及安南撤退所有陸軍海軍空軍與其他一切警察。

(四)美日兩國政府，除暫時以重慶爲首都的中國政府外，不應在軍事、政治、或經濟方面支持其他中國任何政府或政權。

(五)兩國政府放棄在華一切政治外法權……兩國政府並努力取得英國及其他政府之同意放棄一切在華治外法權。

(六)美日兩國政府開始交涉以互惠待遇及減少貿易障礙爲基礎締結美日商約。

其餘尚有四條。有三條規定兩國間經濟關係之調整，最後一條爲邀請其他各國參加此項協定，美國政府雖然不放棄對日覓取妥協的努力，但這個大綱與日本的提案却是相距萬里。大綱中最重要的意義不外：(一)使日本同意不再作侵略的勾當，(二)取消她多年來之侵略成果。美當局雖然提出是項方案，亦明知其不能成功。就軍閥支配下侵略的日本立場言之，對美國的建議亦實無接受之可能，美當局致日代表覆文的內容爲國會與民衆所周知。他們亦認爲對日的侵略應加以制止，故未反對政府措詞之強硬，可惜政府與國民雖有遠見與戒心，究竟國會與民衆對於政府的支持，尙未能達到採取重大決策的階段，因之政府對於被侵略者允諾亦不能超過精神與物資的援助，坐看日寇之氣燄日張。

美京的談判仍繼續進行時，尤其是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對日的覆牒發出以後，美當局已覺到戰禍之將臨，根據羅伯提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二十七日美陸軍參謀長，海軍情報處長，與海軍作戰部長均有電分別致夏威夷駐軍當局警告意外之事可能發生，令其預防怠工與破壞行爲，自本日起直到十二月六日——卽偸襲珍珠港的前夕，華盛頓方面每日均有電致夏威夷駐軍當局促其警戒，惟從未指示夏威夷本身可能遭守空襲，尤其是夏威夷方面情報機關直到十二月一日仍稱日本大部航艦仍未離本國海港。日本行動的祕密，可謂之爲一曲傑作。惟夏威夷當局於接到華盛頓有關當局一再警告之後，雖未提夏威夷有被襲之可能，亦不應太過於疏忽。珍珠港一擊，團結了美國內部的意志，固有可喜之處，但此一擊使美國遭受重大損失究是一件憾事。假使夏威夷駐軍當局早有準備，使日本偸襲得不到預知之效果，美國亦依然可以因之團結，而戰局的形勢在當時或大可改觀，新加坡及西南太平洋或竟不至陷於敵手，撫今追昔，吾人猶不能不爲之浩嘆。

日本當時在西南太平洋與夏威夷附近之海上活動雖爲美國所不盡知，她向越南增兵則爲羅斯福總統所極關切，他曾向日政府質問日本在越南增兵的目的。日政府的答覆則支吾其辭，羅斯福總統在此種情形下仍圖作最後五分鐘和平的努力，於十二月六日直接向日本天皇呼籲，謂太平洋上形勢之轉變將危及兩國間長期和平所產生之良好關係，轉變的結果有造成悲劇之可能，……總統於指出日本在越南增兵所引起之嚴重影響並請其撤退外，最後稱：

『吾本人現時向　貴皇帝陳述乃熱烈希望君能一如余之所爲，

在此緊急關頭，試想如何能使黑雲消散。吾深信吾二人不僅爲了吾兩大國的人民，而且爲了鄰邦的人民，具有神聖的責任，恢復傳統的友誼，並制止世界上繼續的殘殺與破壞。』

羅斯福總統這種誠懇的呼籲，可以說明他是如何想避免戰爭，不過無能的日本天皇在殘暴的軍閥支配之下，却絕對不能與總統合作，負起和平天使的責任，制止戰爭的發生。

羅斯福總統於六日對日本天皇發出呼籲後，次日午後一時來栖即請國務卿赫爾約定一時間與彼及野村會商。據羅伯提委員會的報告，日本原計劃在午後一時（東方標準時間）即夏威夷之早晨七點三十分向美國國務卿宣佈斷絕外交關係，同時並襲擊歐湖島(Island of Oahu)與珍珠港，日本兩代表約定一點四十五分到國務院，實際上二時零五分始到，此距他們應宣佈絕交之時間已遲一小時以上，國務卿到二點二十分始接見他們，因此這一幕會談就特別有趣。日專使約定會見時間後甫二十五分鐘日本飛機一百五十架即轟炸珍珠港，兩點鐘時華盛頓方面一位海軍無線電收音員得到當一個珍珠港被擊的報告。國務卿接見日本代表時已獲得初步報告，日本代表進入赫爾的辦公室後消息即完全證明，然而赫爾國務卿究是一位有修養的政治家，他接見日本代表後，並不因獲得上項消息而不能鎮靜，仍然詳閱日代表所攜來的日本覆帖，該項文件內容主要的共有八點：

（一）斥美國假和平之名所提出的原則，與其簽訂多方面不侵略條約之主張爲抹煞遠東的事實真相。

（二）斥美國與日本簽訂協定之旨在束縛日本不能與德義攜手，又謂美國欲安定太平洋後方，另一方面則假自衞之名援助英國對德義作戰。

（三）斥美國在國際間所使用之經濟壓力較之其所反對之武力更爲殘忍。

（四）謂美國如不改變其支持英國與中國之政策，日美妥協實不可能。

（五）斥美國主張日本自中國撤兵與支持重慶政府爲抹煞事實真相。

（六）斥美國建議關於貿易部份，關於忽視日本在中國四年之犧牲爲絕難接受的主張。

（七）斥美國與英、與、荷、及中國打成一片忽視日本的地位。

（八）斥美國顯圖阻撓日本樹立東亞新秩序計劃之實現，因爲日本政府鑒於美國所持之態度，不能不通知美國政府繼續交涉之無益。

最後這一個覆文簡直是村婦罵街的口吻，筆者之不憚煩述其要義，旨在說明侵略者到了理道辭窮時只有出諸罵街的一途，另一方面也可幫助不明當時真相的人，知道太平洋上的戰爭究竟何以不能避免，赫爾國務卿竟然在情緒緊張的狀況下細心讀完日本覆文，他的忍耐此刻到了盡頭，故讀畢覆文後，即刻以盛怒的顏色向日本代表說：

『吾須說明過去九個月中在吾與君所有之會談中，吾曾無一語不真實。此點談話記錄可以證明。吾從政五十年從未見有充滿不名譽之謊言與虛僞如此一文件。直到今日吾從未想像在此地球上竟有任何政府能造出如此大規模之不名譽的謊言與虛僞。』

兩位日本代表受此譴責，默無一言，即推門而出，許多記者都圍着他們問談話是否還要繼續，他們均不作答覆，驅車竟回使館。赫爾於彼等去後即趕到白宮，此時白宮方面記者雲集，而被炸的消息，也如雪片飛來，內閣於當晚八時三十分召開會議，國會領袖與孤立份子均向白宮表示無條件支持政府，總統對國會的特別諮文也於是時擬就。

次日總統赴國會請求宣戰，全場在沉痛之中聆總統演講，總統雖因接聽被炸報告與戰艦被沉之消息一夜辛勞，發言時仍沉着而堅決，最後稱美國『一定要使此種欺詐的行爲永不再危及吾人。』演辭於八分鐘內完畢，參院全體通過宣戰，下院祇蘭金女士(Miss Jennette Rankin)一票反對（一九一七年美國對德宣戰，蘭金女士亦爲投反對票之人），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幕由此揭開。

筆者尚能回憶日代表在美京談話時，頗有人爲中國憂慮，後來美日開戰，美宣佈交涉內容，雖有若干人知當時一部份交涉眞相，但仍有若干重要事實爲吾人所不知。本文之作在使一般國人明瞭中美間之友誼並非一種口頭禪而實有鐵的事實可以證明。美日交涉中美所持立場，無論其動機如何，均應爲中國人所欣賞。

保健事業在蘇聯

吳清友

二十七年前，即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列寧簽署了指令，設立保健人民委員會，使蘇維埃國家的一切醫藥衛生活動有統一的領導中心，從那一天起，蘇聯的保健事業已走過了二十七年光榮的歷史。

蘇聯的保健事業不僅在和平建設時期有着優異的功績，而且就在戰爭的困難日子，也有驚人的成就。

這裏我們先把帝俄時代的保健事業作一簡單的回顧。當時由於經濟文化的落後，每年死於貧病者爲數甚多，而瘟疫之流行，尤爲經常的威脅。沙皇政府對人民的健康是漠不關心的。根據一九一三年帝俄內政部的行政報告，政府每年支出的醫藥衛生費用每一人民平均只分到九十哥比。其中百分之九十四是用於醫藥補助，只有百分之六是用於衛生設施，包括傳染病的預防在內。因此，帝俄人民的死亡率在當時的歐洲佔着首位，這絕不是偶然的。

新式的醫藥機關，在帝俄時代是非常缺乏的，特別在農村中是如此。例如在地方自治會議上，地主們常常發表這樣的意見：

「農民不慣，也不需要科學的醫藥幫助，他們的疾病是簡單的，土郎中就行了，西醫，是老爺們的醫師，土郎中是農民的醫師。」

至於療養的機構，在帝俄時代也是貧乏不堪的。俄國的工廠和製造廠只有百分之十七附設有醫院，而且也祇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等首都名埠才算差強人意。當時經過醫藥界先進人士大聲疾呼的結果，沙皇政府曾組織一個以科學院會員萊因爲首的委員會，重新審查醫藥衛生的立法，但一切要求仍然成爲具文。祇到蘇維埃政府時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宜才博得國家的嚴密注意，而成爲社會最關心的問題。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首先發生於彼得格勒，當時布爾塞維克黨所組織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面就設有醫藥衛生組，這可以說是蘇維埃人民保健事業的第一塊基石。當時布爾塞維克黨所指出的發展保健事業的新途徑，是基於最廣泛的防疫以及衛生設施，醫藥衛生組織的完全民主化並吸收廣泛的人民階層來參加此種工作，使保健事業純爲勞動人民而服務。人民保健領域內的活動，首先是要實行廣泛的保健和衛生工作，其主要目的在預防疾病的發展，即是說，預防疾病比治療疾病還要重要些。

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月，有幾個人民委員會均從事於保健問題的研究，及至一九一八年二月，醫藥委員會成立了，把這些人民委員會的醫藥衛生組的活動聯結起來，是年七月十一日，人民委員會下令設立全世界第一個保健人民委員會。

在內戰時期，蘇聯的保健人民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適應前線的需要，並與當時流行的斑疹傷寒作極大的鬬爭，軍醫的工作在這個時期，在困難的條件之下也奠立了基礎。

一般說來，俄國軍隊的衛生工作人員，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一九〇五年革命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時期，他們都獲得優異的成績。但他們也有缺點，例如傷兵的後撤以及輕傷的治療都沒

有充分地注意到。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列寧頒佈創立紅軍的指令，同時也規定了軍醫的任務，由保健人民委員會的軍事衞生組負責。內戰結束之後，蘇聯保健人民委員會及其各地機構採用各種辦法以祛除沙皇制度，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及內戰加諸人民的不幸。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蘇聯隨着全國工業化及農村經濟集體化以及人民物質福利的提高，保健的工作亦趨繁重。休養所、療養地、醫療站、母子院的網兒都廣泛地展開。而新醫藥及新療法之介紹和研究，也佔了日益重要的地位。農場和工廠的治療站及施診所所起的作用特別巨大。

蘇德戰爭開始時，蘇聯政府注意到後方醫院之設立，全部醫院幹部均爲保衞祖國的戰士而服役，而醫藥研究所則致力於如何使受傷戰士迅復康健並減少生命犧牲的科學研究。在這次戰爭期中，軍醫院病人的死亡率祇有百分之十二，受傷復原而重歸隊伍者佔百分之七十三，而一九一四——一八年第一次大戰時，俄國軍醫院同樣情形的紀錄只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蘇聯醫院分門別類之詳盡，是一個很大的特色。這樣一來，每一病人均可獲得恰當的醫師及有效的治療。此次戰爭時期，蘇聯兵士骨骼受傷而鋸斷者比第一次大戰時減少三倍多。輸血、豫防及治療的血清，在蘇聯軍醫中曾廣泛地被採用着。

在蘇德戰爭以前，蘇聯軍醫在張鼓峯，諸門坎及芬蘭諸戰役中已獲得不少戰鬪的經驗，因此蘇德戰爭雖然突然爆發，但蘇聯的軍醫還能應付裕如。

在蘇維埃政權時期，蘇聯在醫藥方面的進步是驚人的。在帝俄時代，全俄醫師祇有二萬人，而蘇聯的醫師則增加六倍半之多。當時俄國祇有十三所醫科學校，而蘇聯則有七十二所醫科專門學校和二百多個醫學研究所。在保健機關中工作的醫師達十三萬人之多，其中有一萬七千人是兒科醫師。一九一三年俄國中級的醫學人員只有三萬七千人，一九四一年蘇聯則已有四十六萬多。

現在來說蘇聯的婦嬰保健事業。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幾世紀來受盡農奴制度、沙皇制度壓迫的婦女帶來自由、平等和解放。蘇聯的憲法一開始就規定男女無論政治、經濟、及社會、教育各方面是完全平等的。列寧甚至於指出，社會的解放和國家的建設，如果沒有婦女參加，是不成功的。

蘇聯不僅愛護婦女，對於兒童也異常重視。因爲心身健全的兒童，是一個國家的前途和社會幸福最顯明的表徵。

一般說來，俄國知識婦女的解放，並不比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爲晚，但勞動婦女所受的壓迫和束縛，直到十月革命前，却較任何國家爲厲害。「牝雞不是禽，婦女不是人，」這是在帝俄時代非常流行的諺語，也就是因爲這樣，俄國婦女的自覺性也特別高。俄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總是與革命運動相聯繫的。在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時如此，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也是如此。同時蘇聯婦女的命運，總是與整個國家的命運相聯繫。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如此，在愛國戰爭時期也是如此。

一九一七年三月蘇維埃政府賦予了婦女的參政權，同時作爲婦女喉舌的「勞動婦女」也發刊了。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蘇維埃政府第一次頒佈關於婚姻，兒童和離婚的法令。翌年九月由一千二百位工農婦女參加的代表會議舉行於莫斯科，周密地檢討有關婦女及兒童權利諸問題。在法律保護之下，婚姻自由了，婚生子與非婚生子享受同等的待遇，孤兒與棄嬰亦由國家養育，不許私人招領。一九二七年蘇聯頒佈新婚姻法，規定男女雙方只要事實發生過關係，不管登記與否，婚姻卽告成立，應負一切責任，離婚無須經過法庭或對方同意。一九三六年修訂的婚姻法，辦理離異手續，必須雙方在場並將離婚事項登記於身份證上。離婚費用依次數而比例增加，高達三百盧布，已有子女三人而離婚者，父母雙方各繳薪額之半數並禁止墮胎，意在確立穩固的家庭制度及一妻一夫制。最近一次新婚姻法，承認宗教儀式結婚爲

合法，有十位子女的母親，政府賦予「英雄」的稱號。

在這次戰爭前，蘇聯婦女在工人中佔百分之三十九・五，工資與男子平等。受過專門以上學校教育的婦女，達二十萬人以上，佔全體專科，大學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其他各級學校女生佔百分之四十四・一，在夜校中佔百分之三十六・二。一九三九年婦女參加工業，農業及其他自由職業者有一千多萬人，其中有十多萬是擔任工程師的職務。

在蘇聯，婦女的政治地位也是很高的。在這次戰爭前，她們在全國最高蘇維埃中佔一八九席，在各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中佔一、四三六席，在城、村、區、省地方蘇維埃中佔四二二、二七九席。蘇聯婦女佔聯共（布）黨員的百分之二十九，在政府及黨中佔五分之一的執政地位。一九四二年在蘇聯若干農場裏，女人對男人的比例是九比一。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熟練農業工人都是女性，在工業中人數更多。

在蘇聯，婦嬰的保健，是國家基本事業之一項。在首都有「莫斯科中央婦嬰保健研究所」，在全國各地則有「婦女諮詢所」及「兒童諮詢所」之設立。由於國家對生育的鼓勵，蘇聯的人口每年平均約增加百萬人，而「給乳站」和「健康營」，對兒童的健康方面貢獻極大。此外如「十月團」（七歲至八歲），「先鋒隊」（八歲至十七歲），「青年隊」（十八歲至二十二歲）對青年的保健工作也佔着極重要的地位。

革命前俄國的死亡率是驚人的，僅次於印度，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婦女有百分之九十八得不到育兒方面的醫藥援助，城市有醫師助產的也不過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在蘇維埃政府時代，情形完全不同了。一九一四年俄國全國只有產床四、七〇九張，一九三六年蘇聯全國則有產床四萬八千二百二十張，嬰兒的死亡率比革命前減少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三七年蘇聯全國各種托兒所合計達一千零五十二萬個，幼稚園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九所。這對勞動婦女的解放，兒童的養育，以及母教的代行，都有很大的幫助。至於蘇聯車站的「母子室」(Room for Mother and Child)則更是世所罕觀的，它是專為帶着孩子旅行的母親而設的。

蘇聯對於婦嬰保健事業之重視，可從國家的預算中看得出來。一九四一年，整個蘇聯的公共衛生經費是一一、〇〇〇百萬盧布，其中有三、五〇〇百萬盧布是用在兒童保健工作方面。儘管在戰爭剛告結束的困難條件之下，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的經費絕未被蘇聯政府所忽略。一九四五年蘇聯教育、文化、社會、保健的經費為六百六十一億盧布，即佔國家總預算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在蘇聯領到津貼的母親，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比戰前已增加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五年對大家庭的及獨身的母親之津貼，比一九四四年增加五億盧布以上，這證明婦嬰保健事業在蘇聯之受重視。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的五年中，蘇聯國家經費中，用以救濟兒童頗多的母親的達五、〇〇〇百萬盧布。同時期中二百個婦嬰保健院，二千八百三十六個托兒所，被設立起來，那裏附有一十七萬個床位和三百七十三個奶房。如果加上工業人民委員會所設立的托兒所（附有五萬零三百七十四個床位）以及集體農場所設的托兒所（至一九四〇年止有四萬萬個床位，主要是在播種及收獲時期）合計在內，比革命前增加一千五百多倍。蘇聯保健事業之發達，在這些簡略的數字中可以看得出來。

在戰爭時期，除了前線上純粹軍事設施之外，蘇聯政府同時還採用其他辦法，以保障後方居民的健康，預防各種瘟疫，恢復被敵寇破壞的區域以及廣泛救濟難民等等。

遠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蘇聯保健人民委員部即已頒佈檢查撤退人口健康情形的專門條例。一九四三年，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了「恢復由德寇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各區經濟緊急辦法；」這裏對於廣泛地舉辦衛生事宜也有明確的規定。單就衛生防疫站一項來說，數達數千所之多。戰時蘇聯科學研究人員對於飲食的合理化，食品的維他命化，以及探求新的食品，設法加速澄清飲料水，清除水中毒素，利用地方原料來製造新的消毒劑等等，都加以極大的注意。

九四四年蘇聯政府下令設立醫術科學院，附設各種衛生科學研究所。

蘇聯爲着適應戰後恢復時期在全國城鄉各處進行新建設的需要，現已着手製定新的衛生技術法令，其中特別注意到蘇聯各種新的醫學和戰後新的條件。

沙的阿拉伯油管線問題

Andre Visson 作
樂森璧 譯

譯者按：沙的阿拉伯各油田爲世界最大石油蘊藏區之一。徒以種種政治經濟關係，久未開發，而開發之舉亦歷久始決定。同時由美政府建築油管從油田接通至地中海之油管線，亦有成議。但此項企業之歷史背景，暨與美國國內外政治經濟關係，乃極錯綜複雜。原文載 Reader's Digest, June, 1944, p. 48，著者爲美國名者記，駐中東歷有年所，深悉個中消息，乃將全部局勢分析，頗爲深劉明朗，爰爲迻譯如左。

第一次大戰，寇松（Curzon）勛爵曾云，「盟國浮於油海以達勝利」。該次戰事所用之油，美國供應百分之八十。此次大戰，美國所供應者實過之。現代戰爭，油實爲不可少之要素。儲油以備將來國防之問題，已成爭論之集中點，固無足怪。

此項問題，雖爲對沙的阿拉伯油管線計劃爭論之眞正背景，此線由波斯灣直達地中海，全長一、二五〇英里，估值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內長伊克斯（Ickes）提議此線應立即建築，而且應由美國政府建築。

此油管究竟是否必須建築，業已引起國際間潛伏爆炸性之爭論，而牽涉美國整個未來之對外政策。其在美國國內，則根本成爲政府與私人企業之對立。如是阿拉伯油管之建設，將成爲美國戰後最重要事件之一，而提供於美國大衆。但就一般公衆評論，殊覺對於本問題似少明瞭之了解。

沙的阿拉伯油田，爲世界從未發現豐富油田之一。此油田所在之地區，係包括於英國勢力圈內。但其全部油田，却操於美國油公司之手。蓋阿拉伯王沙的氏雅不願全爲英人所控制，故意將油田讓與美國。此項讓與，以從今後五十年爲限。

美國油公司之亟欲發展此油田，甚於可獲厚利之正常營業理由。而阿王極力推進美國油公司之動作，其主要目標，在可藉此獲取大宗之報效（每桶美金二角三分）。緣回人每年至麥加（Mecca）巡禮，阿王藉此原可收入之美金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乃因戰事而巡禮中斷，此項收入，亦因之無着，財政甚感拮据之故。

爲將來國家安全計，陸海軍以及總統諸方面均甚盼該油田之發展。在陸海軍方面，對於開出之油有可以低於時價百分之二十五之特價收購十億桶之權。但此並非切要之點，因海軍可無須用一桶之阿拉伯油也。

更廣大之策略，在以廉價之阿拉伯油，供給歐洲市場，俾自西半球經由地中海運入歐洲之油，無利可獲。西半球之油儲曾供給兩次大戰。其流出量之鉅實可驚人。而遏止西半球油儲之外流，除使其輸出無利可圖之外，實無其他更有效之辦法。

英國之遠大政策，在保存帝國範圍內之油源，而用其他油源，此實即美國之油源。此項政策曾經在下院坦白公佈。英人假手伊拉克油公司，由該國建設一油管線，通達地中海。即經由此線以廉價之油運

入歐洲。但故意隨時調整市價，使不致低於由美海運入歐之有利油價，於是在和平時代，由美海運入歐之油，每日平均曾以五三〇、〇〇〇桶爲率。

美國所經營沙的阿拉伯及附近之巴林（Bahrein）各油田之油，其運入歐洲者，須繞道通過蘇彝士運河。其通過稅頗高，每桶由一角五分至二角不等。

如是則建築一經過阿拉伯半島之競爭油管線，適與英人保存其固有油源，而利用西半球油源之政策，恰是針鋒相對。

爭點即在於此。即英人對此新築油管線之反響如何？其態度雖未明白宣示，表面上英政府之意見亦不一致，邱吉爾主張歡迎美國參加中東油田發展，認爲藉此可得穩定該區之美國助力。

現在互相競爭之美國各公司之反響將如何？其中若干公司爲新澤西標準油公司及梭康尼真空油公司，對於輸出西半球油品至歐洲之營業具有重大利益。而巴林及沙的阿拉伯之油田，則爲加州標準油公司及德士古油公司共同主有之阿美油公司所掌握，由此一關係錯綜情形，即足以顯示複雜之局勢。

更爲切要之點，即不特美國油公司甚至美國一般人民，大都有政府將加入油業之警覺，戰爭曾經證實，幾乎無一種工業在國防上爲不關重要者。假令政府即可加入油業，則繼之加入者，當爲何業？故內長伊克斯與阿美油業假定之合同，一經宣佈，羣情詫愕，亦固其所。

按英人之操縱中東油田，係利用一嚴格之加特爾從事，此加特爾於嚴格限額及劃定市場範圍之外，復規定加特爾中之任何分子，非經加特爾之許可，不得進行任何油田發展或鑽井工作。雖然，此項許可極少見諸事實。

先是有海灣公司者，獲得巴林島之油田讓與利益。但與英伊油公司同受加特爾拘束之故，不克對該油田自行發展，亦不能誘致英伊公司代爲發展。因是海灣油公司將該處油田之讓與利益以美金五〇、〇〇〇元之代價，轉讓與加州標準油公司。

巴林油田之轉讓，洵爲一時最便宜之交易。加州標準油公司於獲得此項讓與利益後，不再受加特爾之羈絆，脫離其合同關係，而轉向東方另尋市場。後因德士古公司在東方有市場出路之故，予德士古油公司。於是在發展巴林豐富油田之企業方面，成爲加州標準與德士古聯合公司（以下簡稱加德公司）與英伊公司競爭之局面。在印度成爲與殼牌油公司（亦英人企業）競爭之局面。

內長伊克斯自從發覺沙的阿拉伯油田之豐富情形後，即大受其鼓勵。彼第一步，即擬由其石油保存公司出面，從加德公司購取巴林油田之讓與。但雖以壓力相加，加德公司固不肯出賣。彼於是建議政府，設一煉油廠，以接管提煉事宜。但亦歸失敗。凡此種種，均爲暗中進行，此爲油業中人最嚴重之錯誤舉動。

兩年以前，加德公司曾決議建築油管線，其工程人員曾親切實計劃此事。近來加德公司之爲建築油管線取得材料之優先使用權計，於是決議對於陸海軍提出十億桶收買權之建議。此項建議，提出於國務院，總統及參謀本部各方面後，於是發生應予遏止，抑應予在外交上之援助以促其成之問題。因該油管線除過沙的阿拉伯之外，並須通過其他之領土也。

伊克斯聞加德公司興建沙的阿拉伯油管線之議後，立即宣佈該線應由政府興建，此則完全出乎加德公司意料之外。

然加德公司有少數領袖，以爲此線由政府出資一億五千萬之鉅，亦大佳事。惟假定之合同內規定，卽令二十五年期滿，經費完全償付之後，該管線仍爲政府所有，及伊克斯或其繼承人有決定該管線如何使用之權各節，則均不爲渠等所喜。但渠等深望各節之詳細規定，或能加以調整。

其贊成油管線爲政府所有者，以爲若遇戰事，或土人暴動，或政府企圖收用諸情形之下，該線既爲政府財產，其受美國軍隊保護當然較之保護私人財產更力。又有人以爲該線若爲政府所有，則遇與外

論談判，實立於較優之地位。更有人以爲油管經之通過特許若經由政府與應經過區域之當局折衝，較之私人公司直接從事，更易得手。

二、其反對政府主有者，以爲上述諸理由，均屬似是而非之論。蓋各油公司對於在國外經營會自優爲之，或並無政府資金之加入。過去政府咸能給予各該公司必須之外交支持。政府在戰時無須乎藉營業方法取得油料，因政府可徵用所有任何美國私人公司之油料也。

政府管制油業，如油管線假定合同草案所預示者，而使私人企業不寒而慄。因該公司合同規定政府應決定以認爲最易於實施之方案相宜從事，並保持其監督權。此卽統制，毫無疑義」。

沙的阿拉伯油管線，對於保存美國國內油源，實不失爲一最有效力之計劃，確屬應行興建。不過平情而論，由政府出資而不由私人出資，顯無穩健之理由耳。

法律之理論與實踐

桂裕

——司法問題之四——

學理先於實行乎？抑實行先於學理乎？此問題亦猶雞先於蛋抑蛋先於雞一問題，常使人迷惘而不知所答。各人見解不一，作者亦何敢自作聰明，妄爲臆斷。對此問題，並不詳論，顧仍有可以肯定言之者，卽學理與實行應互爲因果，相輔相成。蓋一則重於行，屬藝術之境界，一則重於知，屬科學之範疇。學理不能自動，須人予以施行；實行初無軌範，須有學理爲之輔導。故欲工作之見效，二者實不可分離也。惜在我國知行二事分道揚鑣，不相聯繫。能實行者每缺乏學理上之修養，明學理者常不願躬自實行。余作此言並非無的放矢，蓋有佐證焉。數十年來，我國遣赴外國留學者爲數不尠，雖彼等學得種種學理，然並不自己動手，卒致最先製造本國貨電燈泡，在市上銷售者乃爲一窮苦之工人，言之可慨。我國所以事事落後者原因蓋在於此。

在司法界亦有類似之情形。有從未涉足於法院之理論家，亦有按步就班之法院工作者。實際工作者於學理學說無暇涉獵及之，以是法律及法院均無生動之氣。夫法律者，科學也，亦藝術也。習法律者惟有法律知識，不能闡發其能事，尤要者爲能躬自實行。語云『熟能生巧』，此之謂也。準是，司法官必不可以其目前之地位爲滿足，仍須砥礪修養，進而成一藝術家，在法律上創造美妙之傑作，如英、美、法學家然。

現代交通便利，世界已不如往日之遼闊，閉關自守政策，已不足以語於今日。人我之接觸既較密，吾人自須吸收外界之新思想，而與大勢相呼應。旨趣既如此，則當前切要之圖，應將中外法律，作真正的比較研究。僅僅瀏覽各國法律猶嫌不足。第一須明瞭各種制度及學理之實施狀況，然後與我國現行法制一對照，而探索彼此優點及弱點之所在。無論如何，務須以我國本身作爲出發點。爲改善目前狀況計，擬先請理論家加入法院，體驗法律之實況，其次則派遣有實際司法經驗之人員前往外國考察各國司法制度之現實情況。但出國考察者，於本國司法必須先有切實之經驗，否則所謂比較研究亦僅獵及毛，所得不多也。

茲既論及比較法學，作者或可一談個人之經驗。作者於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間，在『中國比較法律學校』(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原稱東吳大學法律科，現稱東吳大學法學院）修習法律。該校仿照一般美國法律學校而設立。科目大多爲英美法，由美國教

員，以英語講授。但中國法之主要部門亦兼及之，顧份量不如英美法之多耳。該校所以稱為『比較法律學校』者，無非以中國法及英美法混合講授之故。但實際上，學生對於各種法律，僅作如是觀而已，初未作進一步之比較研究也。民國二十五年作者奉派為上海第一特區法院推事。雖事先曾執行律師職務，並充任司法行政部編纂，然就職之初竟茫無頭緒。往日在學校所學習之英美法，因派別不同，不合實用。於是知書本上之學識尚不足以資應付。因之，如一學徒然，不得不從頭學起。幸在學校時對於法律之理論受有相當嚴格之訓練，故不久即克服種種困難而能應付自如。第一特區法院設在前上海公共租界，常受理涉外事件。遇中國法律無規定時，往往引用英美法之法理以資判決。例如保險案件等等，常牽涉英美國籍人民或其利益。作者至此始獲有比較各種法律之機會，嘗引以自慰也。

從而可知，學識為一事，而實行又為一事。如有健全之頭腦，及理論之能力，縱無充分之法律知識，亦未嘗不可充任司法官。推而言之，昔日之老司法官多有未受相當之法律訓練者，其法律知識由經驗而得，而其成績極為良好（但此輩老司法官僅足稱為法律工作而已）。由他方面觀之，若無另一輩人在學理上孜孜研究，為之推進，法律即毫無生氣，勢必呆滯而無進步，蓋缺乏刺激因素故也。綜上所述，我人當務之急宜先使學理與實行合一，然後進而提倡比較法學之運動，以促進新中國法系之實現。

隋代的地方制度

——三級制的破壞與兩級制的重建——

盧師炯

隋代的地方制度除了仍襲魏晉南北朝的趨勢，封建制度成為虛封而失其「地方」的意義以外，其本身亦有若干特點，即如次：

第一、兩級制地方制度的重建：魏晉南北朝承東漢末葉之制，地方制度為州郡縣三級制，但以政治混亂，尤其是由於僑州郡縣制之採用，以致地方單位及官吏之數量，超越正軌。到了隋時，楊尚希「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并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二；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隋書卷四十六楊尚希傳）。自是以後，雖州郡互名（參看下文），但是終隋之世，均係採用兩級制。

第二、司隸台的設置：西漢時代，行兩級制，另設刺史十三人，分察各州，其後演變而為三級制。隋時恢復兩級制，而另有司隸台之設。其制：「司隸台，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從五品），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

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驅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後又罷司隸台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爲常員。臨時選京官淸明者，權攝以行。」（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這種制度，頗類漢代分部巡察之制，但隋之「分部」詳情，史無可考。

第三、軍民分治的恢復：秦時行軍民分治之制，自漢而漸混亂。魏晉以降，「都督諸軍」之權甚重。「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則總管爲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幷以爲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按此則都督之權微矣。隋文帝以幷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通典卷三十二）蓋「至隋以州爲郡，無復軍府。」（同上）不寧唯是，煬帝大業三年罷州置郡之時，對於郡之軍民分治，亦有規定。「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領兵，與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又置京輔都尉從三品，立府於潼關，主兵領遏，幷置副都尉從四品。又諸防主副官掌同諸鎮。……」（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凡此皆爲軍民分治制度之嘗試。

第四、用人權力的轉移：「漢初王侯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以上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下及鄉官，又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多寖移於朝廷。」（通典卷十四）。但此種用人權力之轉移，實至隋而確立。「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刺史幷以志行修謹淸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尙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爲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見同上）。

二

如上所述，可知就一般而言，隋制實有其特點，而不失爲東漢末年以降長期混亂後之大調整。至於各級制度之略情，茲分述如次：

（甲）州郡

子、區劃　隋承周後。周「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於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隋書卷二十九地理志）

如上所引，可知州郡自開皇三年以後，實爲一物而互名。其名稱之變化即如下：

名稱	年代	備注
州	文帝開皇三年	「隋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通典卷三十三）。
郡	煬帝大業三年	「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通典卷三十三）。

至於區劃約如次：

州名	統郡
雍州	京兆(二二)(三〇八四九九)馮翊(八)(九二二九一)扶風(九)(九二二二三)安定(七)(七六二八一)北地(六)(七〇六九〇)上郡(五)(五三四八九)雕陰(一一)(三六〇一八)延安(一一)(五三九三九)弘化(七)(五二四七三)平涼(五)(二七九九五)朔方(三)(一一六七三)鹽川(一)(三七六三)靈武(六)(一二三三〇)榆林(三)(二三三〇)五原(三)(二三三〇)天水(六)(五二一三〇)隴西(五)(一九二四七)金城(二)(六八一八)枹罕(四)(一三一五七)澆河(二)(二三四〇)西平(二)(三一一八)武威(四)(一一七〇五)張掖(三)(六一二六)敦煌(三)(七七七九)鄯善(二)(二)且末(二)西海(二)河源(二)
梁州	漢川(八)(一一九一〇)西城(六)(一四三四一)房陵(四)(七一〇六)清化(一四)(一六五三九)通川(七)(一二六七四)宕渠(六)(一四〇三五)漢陽(三)(一〇九八五)臨洮(一一)(二八九七一)宕昌(三)(六九九六)武都(七)(一〇七八〇)同昌(八)(一二二四八)河池(四)(一一二〇二)順政(四)(四二六一)義城(七)(一五九五〇)平武(四)(五四二〇)汶山(一一)(二四一五九)普安(七)(三一三五一)金山(七)(三六九六三)新城(五)(三〇七二七)巴西(一〇)(四一六〇四)[illegible](三)([illegible])涪陵(三)(九九二一)巴郡(三)(一四四二三)巴東(一四)([illegible]一三七〇)蜀郡(一三)(一〇五五八六)臨邛(九)([illegible])眉山(八)(二三七九九)隆山(五)(一一〇四二)資陽(九)([illegible]五七二五)瀘川(五)(一八〇二)遂寧(四)(四八五九)越巂(六)(七四四八)牂柯(三)黔安(二)(一四六〇)
豫州	河南(一八)(二〇二二三〇)滎陽(一一)(一六〇九六四)梁郡(一三)(一五五四七七)譙郡(六)(七四八一七)濟陰(九)(一四〇九四八)襄城(八)(一〇五九一七)潁川(一四)(一九五六四〇)汝南(一一)(一五二七八五)淮陽(一〇)(一二七一〇四)汝陰(五)(六五九三六)上洛(五)(一〇五二六)弘農(四)(二七四六六)淅陽(七)(三七二五〇)南陽(八)(七七五二〇)淯陽(三)(一七九〇〇)淮安(七)(四六八四〇)
兗州	東郡(九)(一二一九〇五)東平(六)(六〇九〇)濟北(九)(一〇五六六〇)武陽(一四)(二一三〇三五)渤海(一〇)(一二二九〇九)平原(九)(一三五八二二)
冀州	信都(一二)(一六八七一八)清河(一四)(三〇六五四四)魏郡(一一)(一二〇二二七)汲郡(八)(一一一七二一)河內(一〇)(一三三六〇六)長平(六)(五四九一三)上黨(一〇)(一二五〇五七)河東(一〇)(一五七〇七八)絳郡(八)(七一八七六)文城(四)(二二三〇〇)臨汾(七)(七一八七四)龍泉(五)(二五八三〇)西河(六)(六七三九一)離石(五)(二四〇八一)雁門(五)(四二五〇二)馬邑(四)(四六七四)河閒(一三)(一七三八八三)定襄(一)(三七四)樓煩(三)(三四四二七)太原(一五)(一七五〇〇三)襄國(七)(一〇五八七三)涿郡(九)(八四〇五九)上谷(六)(三八七〇〇)漁陽(一)(三九二五)北平(一)(二二六九)安樂(二)(七五九九)遼西(一)(七五一)
青州	北海(一〇)(一四七八四五)齊郡(一〇)(一五二三二三)東萊(九)(九〇三五一)高密(七)(七一九二〇)
徐州	彭城(一一)(一三〇二三二)魯郡(一〇)(一二四〇一九)琅邪(七)(六三四二三)東海(五)(二七八五八)下邳(七)(五二〇七〇)
揚州	江都(一六)(一一五五二四)鍾離(四)(三五〇一五)淮南(四)(三四二七八)弋陽(六)(四一四三三)蘄春(五)(三四六九〇)廬江(七)(四一六三二)同安(五)(二一七六六)歷陽(二)(八二五四)丹陽(三)(二四一二五)宣城(六)(一九九七九)毗陵(四)(一七五九九)吳郡(五)(一八三七七)會稽(四)(二〇二七一)餘杭(六)(一五三八〇)新安(三)(六一六四)東陽(四)(一九八〇五)永嘉(四)(一〇五四二)建安(四)(一二四二〇)遂安(三)(七三四三)鄱陽(三)(一〇一〇三)臨川(四)([illegible])廬陵(四)(二三七一四)南康(四)(一一一六八)宜春(三)([illegible]六)豫章(四)(一二〇三一)南海(一五)([illegible])[illegible]
荊州	南郡(一〇)(五八八三六)夷陵(三)(五一七九)竟陵(八)(五三三八五)沔陽(五)(四一七一四)沅陵(五)(四一四〇)武陵(二)(三四一六)清江(五)(二六五八)襄陽(一一)(九九五七七)春陵(六)(四二八四七)漢東(八)(四七一九二)安陸(八)(六八〇四二)永安(四)(二八三九八)義陽(五)(四五九三〇)九江(二)(七六一七)江夏(四)(一三七七一)澧陽(六)(八九〇六)巴陵(五)(六九三四)長沙(四)(一四二七五)衡山(四)(五〇六八)桂陽(三)(四六六六)零陵(五)(一六八四五)熙平(九)(一〇二六五)
總計	郡一九〇　縣一二五五　戶八九〇七五四六

說明

(1)以上據隋書地理志。每一郡名下之數字，第一個數字指該郡所轄之縣數，第二個數字指該郡之戶數。例如「京兆(二二)(三〇八四九九)」，即京兆郡轄二十二縣，共三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九戶，餘類推。唯鄯善、且末、西海、河源、牂柯等五郡之戶數，史闕，茲從略。

(2)隋書地理志依禹貢九州分述其時之郡縣，茲爲讀者參考計，亦因之。雖此九州實與當時之政治區劃無關。

(3)隋書地理志所紀之郡縣，係指煬帝時之數字。如與隋初相較，已減省甚多。據隋書地理志序之說明謂「大業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隋文帝平陳時「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隋書卷二高祖紀）。是隋初共有州二百四十一，郡六百八，縣

一千五百二十四。可知減省不少。

隋初之州郡，并分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分上中下，共九等。開皇「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中下、下，凡四等。」（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唯據通典卷三十二，則謂開皇「十四年，改九等州縣上、中、下凡三等。」）及煬帝大業三年，改州爲郡，依其官制，仍爲上、中、下三等。

三

丑、官制

（1）演變　隋因州郡之變更，其官制亦常隨之而更易，其演變之情形約如次：

時代	區域	官名	備註
隋初	州	刺史	「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通典卷三十二）。
	郡	太守	「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通典卷三十三）。
開皇三年	州	刺史	「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通典卷三十二）。
大業三年	郡	太守	「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置太守。」（通典卷三十三）。

但有二點，必須注意：其一、開皇三年以前，州郡爲上下二級之區劃，是以其時之刺史太守，係二者并置。開皇三年罷郡，「便以州親人，則刺史太守之職。自後雖官名屢改，而職事不廢。」（通典卷三十三）。亦即自後刺史太守已成爲同職異名。其二、「煬帝大業初，爲司隸台，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制（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通典卷三十二，又參看本文第一段第二點），此之所謂「刺史」，其詳雖不可考，但其性質實與西漢初年之刺史相近，而非地方官，則甚明顯，是以不宜與此處所述者相混。

（2）品秩　隋初仍前代之制，州郡并設，其品秩隨州郡之等級而有區別，約如次：

官別	等級	品	備註
刺史	上州刺史	正三品	
	中州刺史	從三品	
	下州刺史	正四品	
太守	上郡太守	從四品	
	中郡太守	從五品	
	下郡太守	正六品	

備註：

（1）「刺史太守……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爲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百石。」（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

（2）「雍州置牧，從二品。」（見同右）。

（3）「京兆郡置尹，從三品。」（見同右）。

（4）「州總管者，列爲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見同右，并可參看本文第一段第三點。）

上舉制度，到煬帝大業三年而有所更張。即，「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京兆河南，則俱爲尹，并正三品。」（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

（3）僚屬　隋初刺史太守之僚屬亦因等而異，即如次。

區劃	等級	僚屬人數
州	上上州	三二三
	上中州	三一一
	上下州	二九五
	中上州	二六六
	中中州	二四六
	中下州	二二六
	下上州	一九四
	下中州	一七九
	下下州	一六七
	上上郡	一四六
	上中郡	一四一

備註：

（1）以上人數均據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原書除上上州及上上郡敍述較詳外，其餘僅謂減若干人。

（2）「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贊務、州都、郡正、主簿、錄事、西曹、書佐、金、戶、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并佐史合五百二十四人。」（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

（3）上上州置刺史、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功曹、戶、兵等曹參軍事，法、士曹等行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丞等員，并佐史合三百二十三人。」（見同上）。

（4）「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贊務以爲長史司馬。……佐官以曹爲名者，并改爲司。」（見同上）。

（5）「京兆郡置尹、丞、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等員，并佐史合一百四十人。」（見同上）。

（6）「[illegible]郡，置太守、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市令等員，并佐史合一百四

郡		十六人。」（見同上）
上下郡	一三七	(7)開皇「十二年……諸州司以從事爲名者，改爲參軍。」（見同上）。
中上郡	一一八	
中中郡	一一二	
中下郡	一〇七	
下上郡	八八	
下中郡	八三	
下下郡	七七	

上制至煬帝改州爲郡時，亦有變更。卽：「罷長史司馬，置贊務一人以貳之。（京兆河南從四品，上郡正五品，中郡從五品，下郡正六品。）次置東西曹掾（京兆河南從五品，上郡正六品，中郡從六品，下郡正七品）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參軍爲行書佐。……其後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又改郡贊務爲丞，位在太守下。」（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

刺史太守之職，有兩點應加注意。其一，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郡縣正巳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佐官以曹爲官者，幷改爲司。」（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是卽本文第一段所云之用人行政之轉移。其情形卽如劉炫所說：「……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隋書卷七十五劉炫傳）。其二，隋煬帝罷州置郡之後，採軍民分治制（參看本文第一段第三點），而使刺史之權，受實質之影響。

四

乙、縣鄉

（子）縣制

(1)分等　隋之縣制，亦分級，且多變化，卽如次：

時期	等數	等級	備註
隋初	九	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卽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1)據隋書卷二十八及通典卷三十三，均謂：「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之處以爲等級。」（隋書少「之處」二字）。
開皇十四年	三	上中下	據通典卷三十二「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及三等。」唯據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稱：「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中下、下四等。」另據歷代職官表卷五十四稱：「謹案：……隋志稱上上縣至下下縣，及九等，而通典云改爲三等，蓋志之廢縣，因其未定之制故也。唯對於隋志所稱之改爲四等，亦未加說明。待考。」

(2)縣官及品秩　縣設縣令，其品秩因縣而異。卽如次：

縣等	品	備註
上	從六品	(1)上據隋書卷二十八。
中	從七品	(2)「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見同上）
下	正八品	(3)隋煬帝時「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并增，爲正五品。」（見同上） (4)據通典卷三十三：「隋縣有令有長。」但縣長無可考。

開皇三年以後，「縣令三年一遷」（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縣令亦可擢爲刺史。「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爲營州刺史。」（通典卷三十三）。

(3)僚屬　僚屬亦因縣等而異。卽如次：

縣等僚屬	人數	備註
上上	九九	(1)上據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原書除對上上縣敍述較詳外，餘僅謂減若干人。
上中	九五	(2)「大興、長安縣置令、丞、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等員，并佐史合一百四十七人。」
上下	九〇	（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
中上	八〇	(3)「縣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及市令等合九十九人。」（見同上）。

中	中	七五
中	下	七〇
下	上	五八
下	中	五二
下	下	四七

隋煬帝時，微有更改。「……丞主簿如故，……縣尉爲縣正。尋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河南洛陽、長安、大興則加置功曹，而爲三司，司各二人。」（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

(卄)鄉制　隋之鄉制約如次：

名稱	組織	官名
鄉	五百家	正
黨（族）	一百家	長（正）
里（閭）	二十家	正（正）
保	五家	長

但是這裏有數點需要說明。其一，據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所載：「……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通典卷三，所載隋文帝受禪頒新令。其內容亦與此相似（唯缺「保有長」三字）。但據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所載：隋文帝開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一人。」這裏發生兩個問題。一爲頒新令之時，是否有鄉，抑或係於九年始置。據隋書卷四十二李德林傳「開皇元年……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卽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判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然高熲同威之議，……由是高祖盡依威議。……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幷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是則九年以前已有鄉正。且上引隋書卷二所載之「百家爲里，長一人，」亦與該書食貨志所載之里，不相符合。按食貨志與帝紀同屬一書，而有如此出入，實屬疑竇。其二，依上引李德林傳之記載，十年廢鄉正，依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所記：亦謂：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但依隋書卷六十七裴蘊傳所說：「於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作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是則煬帝大業五年仍有鄉正里長。未知開皇十年所廢之鄉正，是否僅廢其「專理辭訟」之職，抑或開皇十五年之後，另有所建置。且十年廢鄉官抑十五年始廢亦屬問題。

隋煬帝時，對於地方制度之改革，除前已述及者外，幷將「京都諸坊改爲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坊指軍坊，及爲軍事編制）煬帝三年以後之情形，正如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所說：「帝自三年定令之後驟有制置，制置未久，隨復改易，其餘不可備知者，蓋史之闕文云。」

綜上所述，可知隋代的地方制度，雖多變更，但其主要特質，實不外本文首段所述：爲兩級制的再建，司隸台的設立，軍民分治的實施，與用人權力的轉移。嚴格說來，後二者固然所以求地方割據的打破，而司隸台制度雖爲自三級制轉爲二級制之餘剩，而其實亦求所以控制地方。換言之，隋代承繼晉南北朝長期混亂之後，地方制度的設施，實傾向於中央集權。此種制度，雖未能爲隋代創長治之局，但在中國地方制度沿革史上言之，則亦具有其重要性。

金乙未元歷斗分考

嚴敦傑

耶律履乙未元歷，術數殘闕，今惟知元史歷志載該歷積年日法及越授時歷中節後天刻數，按以後天刻數益授時中節刻數，乘日法還原，即得乙未歷之氣小餘，宋秦九韶演紀術爲已知日法斗分氣骨而求積年，而今已知積年日法氣小餘而求斗分，亦理之一也。淸代李銳定乙未斗分爲五〇三〇，近魯實先則定乙未斗分爲五〇四〇，李氏僅以片言爲斷，魯氏亦行文簡約，其於算草，並付闕如，𡨚不揣譾陋，爲之反復推求，列具算式，題之左方。

元史歷志云，乙未曆大定二十年庚子耶律履造，不曾行用，積年四千四十五萬三千一百二十六，日法二萬六百九十，至至元辛巳後天一十九刻，按授時歷至元辛巳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即辛巳冬至大餘五十五，小餘六，大餘命甲子算外，得己未日六刻，加十九刻爲二十五刻，即乙未歷是年氣小餘爲二十五刻。

以二十五刻乘日法二〇六九〇，退二等，得乙未泛氣小餘五千一百七十二半，按乙未至辛巳積年及日法末位均偶，可約，故泛小餘亦爲偶數，若命之爲五一七二，則不及二十五刻，故進位得五千一百七十四爲泛小餘，設a爲斗分，則

40453126 a≡5174 (mod 20690)

4176 a≡5174 (mod 20690)

2088 a≡2587 (mod 10345)

又設 m 爲因率。

3088 m≡1 (mod 10345)

大衍求一術凡六求，得因率五二二七，以半泛小餘乘因率，滿半日法去之，不滿一三三四，其算式如下。

m=5227

a≡2587 m (mod 10345)

a≡1334 (mod 10345)

若一三三四增或減半日法，俱不與斗分要求相合，故即取一三三四爲乙未歷之假斗分。

按泛小餘在二十六刻至二十五刻之間，均可云後天十九刻也，是再定半泛小餘之上限爲二千六百八十九，下限爲二千五百八十七，上求假斗分弱甚，故宜增下限而上求。

倍因率滿半日法去之，不滿一〇九，知半泛小餘凡增二，則假斗分增一〇九，算式如後。

設p爲氣小餘，n爲增率。

$$2680>\frac{p}{2}>2587$$

$$2\times 5227\equiv 109 \pmod{10385}$$

$$\frac{p}{2}=2587+2n$$

$$a=1334+108n$$

增率爲三十四，得氣小餘爲五三一〇，斗分爲五〇四〇，若增率加一，則斗分五一四九，約餘二四八八，失之過強，增率減一，則斗分四九三一，約餘不及二四〇〇，失之過弱，俱不合，故增率三十四爲惟一解，此證魯推斗分爲五〇四〇不謬。

六十倍日法爲一二四一四〇〇，乙未斗分五〇四〇，則歲餘爲一〇八四九〇。

$4940126 \times 108490 \equiv 977740 \pmod{1241400}$

卽氣骨九七七七四〇，減上求氣小餘五三一〇，得數爲九七二四三〇。以日法收之，得大餘四十七，與授時大餘五十五不合，此卽魯實先謚明朱載堉所云命算壬申之來源。

上求斗分五〇四〇旣爲惟一解答，則其求得氣大餘爲四十七，理不容有所更改，朱載堉命算壬申，似可昭信，然若無明證。

又若乙未氣小餘爲二十四刻餘，凡餘分滿半以上進一，亦得二十五刻，故據上法所求下限，宜減率而求，減率求則假斗分應爲一一六七九，亦如上術半泛小餘每減二，斗分減一〇九，如是至減率爲六十一時，得減分六六四九，以一一六七九減六六四九，得五〇三〇，此卽李銳求斗分五〇三〇之由來，然氣小餘減二百四十四分，得四九三〇，以日法收之爲二十三刻餘，轉已知條件二十五刻相差幾近二刻，但以此斗分還求氣大餘得五十五，却與授時相合。

魯推斗分，持較當時氣朔，俱相契合，李推斗分，中節雖合，而朔日後天三辰，茲以李推朔實（魯推初異後亦同）。魯推斗分，以演紀術復之。

問乙未元歷積年四十五萬三千二十五，欲知推演之原，調日法求朔餘，朔率，斗分，歲率，歲閏，入元歲，入閏，朔定骨，閏泛骨，閏縮，紀率，氣元率，元閏，元數及氣等率，因率，蔀率，朔等數，因數，蔀數，朔積年二十三事各幾何（此題及下草仿秦九韶纂法）。

答曰日法二萬六百九十，朔餘一萬九百七十八，朔率六十一萬九百八十八，斗分五千四十，歲率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八百九十，歲閏二十二萬五千三十四，入元歲一十萬七千五百二十，入閏五十三萬八百八十，朔定骨二十五萬三千九百四，閏泛骨三十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六，閏縮四十七萬六千六百四，紀率一百二十四萬一千四百氣元率一十二萬四千一百四十，元閏一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四，元數三百二十五，氣等率十因率七十八，蔀率二千六十九，朔等數四，因數一十萬五千一百六十七，蔀數一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七，朔積年四千三十四萬五千五百，積年四千四十五萬三千二十五。

草曰本歷以何承天術調得二萬六百九十爲日法，係四百一十六強，一十八弱，先以強數四百一十六，乘強子二十六，得一萬八百一十六，於上次以弱數一十八，乘弱子九，得一百六十二，併上共得一萬九百七十八爲朔餘，次以日法通朔策二十九日，增入朔餘，得六十一萬九百八十八爲朔率，又以上求五千四十爲斗定分，與日法以大衍術入之，求得十爲等率，七十八爲因率，二千六十九爲蔀率，以甲子六十爲紀法，乘等率得六百爲約率，置本歷所測乙未氣定骨六十五萬四百，以約率除之，得一千八十四，以因率七十八乘之，得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二，滿蔀率二千六十九去之，不滿一千七百九十二以紀法六十乘之，得十萬七千五百二十爲入元歲，次置歲三百六十五以日法通之，併斗定分得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八百九十爲歲率，以十二月乘朔率，減歲率，餘二十二萬五千三十四爲歲閏，以歲閏乘入元歲滿朔率去之，不滿五十三萬八百八十爲入閏，次置本歷所測天正月朔求得朔定骨二十五萬三千九百四，以氣定骨減朔定骨餘三十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爲閏泛骨，以閏泛骨加朔率，減入閏，餘四十七萬六千六百四，在朔率下便爲閏縮，次以紀策六十乘日法得一百二十四萬一千四百爲紀率，退一位得一十二萬四千一百四十爲氣元率，以氣元率乘歲閏，滿朔率去之，不滿一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四爲元閏，次置一億以入元歲減之爲實。以元率爲法，除之得八百四爲乘元限數，乃以元閏而與朔率用大衍術求之，得等數四，因數一十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四約閏縮得一十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一，以因數乘之，滿蔀數一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七去之，不滿三百二十五，在乘元限數下爲可用，乃以三百二十五乘氣元率一十二萬四千一百四十得四千三十四萬五千五百爲朔積年，併入元歲一十萬七千五百二十共得四千四十五萬三千二十爲大定十五年乙未歲積年，本歷係於庚子歲撰定，又加五年共爲四千四十五萬三千二十五算爲本歷積年，其衍草如後。

5040 $x\equiv1$(mod 20690)

學率 10　504 $x\equiv1$(mod 4069)

$x=78$（因率）

$60\times10=600$（約率）

$\frac{650400}{600}=1084$

$1084\times78\equiv1792$(mod 2069)

$1792\times60=107520$（入元歲）

即　A（積年）$\equiv107520$(mod 60×2069)

$A\equiv107520$(mod 12410)

又　$A\times245034\equiv396496$(mod 610988)

以A代入　[107020(mod 124140)]225034

$\equiv396496$(mod 610988)

$107520\times225034\equiv530880$(mod 610988)

$124140\times225034\equiv127424$(mod 610988)

$(610988+396496)-530880=476604$（閏縮）

$\frac{10^7-107520}{124140}=804+$（乘元限數）

$127424\beta\equiv476604$(mod 610988)

等數 4　$31856\beta\equiv119151$(mod 152747)

$31856y\equiv1$(mod 152747)

$y=105167$（因數）

$105167\times119115=12530753217$

$\beta\equiv325$(mod 152747)

∴　$\beta=325$（元數）

$A=107520+325\times124140$

$=40453020$

$A=40453020+5=40453020$　　Q. E. D.

乙未斗分五〇四〇，萬萬平之，得二四三五九五九四，校當時迫知微大明歷及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庚午歷，祇強萬萬分之一百三十，於術應無可疑，然命算壬申，尙鮮旁證，爲審愼計，今暫定乙未斗爲五〇四〇，考證辯權，以俟能言者。

附：乙未歷文獻（以發表先後爲序）

（一）嚴敦傑：耶律履乙未歷考（重慶益世報文史副刊第三十五期）。

（二）魯實先：金乙未元歷朔實考（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第一卷二期）。

（三）嚴敦傑：致魯實先論乙未歷朔實考書。

（四）魯實先：金乙未元歷朔實考辨疑（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一號）。

（五）魯實先：金乙未元歷命算日及歲實朔實考（東方雜誌第四十一卷十二號）。

（六）嚴敦傑：金乙未元歷斗分考（本文）。

漫談「雷達」

譚勤餘

諺云：現代戰爭乃科學之戰爭，觀此次世界大戰，尤足證此言不誣。如新武器之原子彈一出，卽震懾全世界，使凶橫殘暴之日寇不能不俯首乞降，其威力可知。所謂原子彈，在利用放射性元素所生之放射能（energy）以達破壞目的，可謂科學之應用已達於極峯。惜其製

造法尙祕而未宣，無由知其機構。惟「雷達」(Radar) 則已成公開之新武器，爲無線電之一種新用法。其使用目的雖不在破壞，然其功能實不亞於原子彈，亦爲科學之一種結晶品，固不待言，請述其概要如次。

一 暗中視物

雷達爲一種精緻小巧之電子活動機，能在暗中視物，與光天化日下無異。蓋雷達發出一種無線電射線(radio beam)，遇阻礙物時，無論遠近，均發生回響(echo)，與聲波所生之回聲相似；此回響投於雷達屏(screen)上，使其變成可視像即得。利用雷達，能見小槍彈之飛進，輪船之航行，被射擊物之爆炸，中彈飛機之跌落等。其在海洋上，二十英里外，即能見海面上之浮游物或暗礁以及其他船隻。

在空氣中，無論晝夜或濃雲大霧，亦可使地面展開如一幅單地圖，無所逃形，可窺見海岸線，船舶，港灣，碼頭，山脈，河流，湖池，橋樑，城市。若在近距離，而以最狹之雷達射線(radar beam)以行觀查，則城市附近之河頭，村落，甚至建築物，亦瞭如指掌。

二 軍事應用

雷達之奇異能力，猶如演戲，反覆在戰場上表演。曾使美國軍艦在二十餘英里外，以排炮擊沉德國戰鬪艦金巴特號 (Jean Bart)。德國利用雷達之助，擊沈英國戰鬪巡洋艦胡德號 (Hood)，而英國雷達又反擊沉德國之俾斯麥號 (Bismarck)。珍珠港上發出悲慘偷襲警報，警告日機來臨者，亦雷達之功也。

雷達之一主要任務，在偵勝潛艇及怪音彈 (buzz-bomb)。英人謂該國之勝利，應歸功於雷達及三百駕駛人云。此物實爲飛行員之活動助手，又運輸艦隊在諾曼第(Normandy)遇大霧之D日 (D-day) 亦由雷達領導其航行無阻，而美國海軍擊沉日本艦隊，亦得雷達之大助。有此雷達，使希特勒之歐洲屋脊，無論晝夜，裸露無遺；日本亦失防禦力，成爲無掩蔽之狀。

雷達除上述各用途之外，其他用途不可勝數，故其變形已發展至驚人之程度，巧妙無窮。如預防警報雷達，在一百英里外，即可查知敵機來臨，既可知其飛行速度，且可知其飛行方向；管制火力雷達，能自動瞄準及放射機關鎗或高射砲，其準確度較機關鎗手更優；特種雷達，猶如夜間飛行員之眼，領導飛機盲目着陸，是稱曰着陸控制器 (Ground-Controlled Approach 略號 G. C. A.)；此外尙可用以觀測高層氣候及暴風雨等。工程師們以爲總有一日投射器可發展至用雷達以領導其自向目的物云。

三 發明小史

任何大發明，必有許多發明家，此不待言。在一九二三十年間，美國海軍中有物理學者及無線電專家數人，如泰羅(A. H. Taylor(，楊格 (L. C. Young)，培吉 (R. M. Page)，及吉布哈德(L. A. Gebhard) 等，已啓雷達之門；信號隊上校科爾頓 (R. Colton)(現已成美國空軍中將) 曾計劃設置最初之軍用雷達；斯丹福大學之范良(Varian) 發明重要之 klystron 管；而科學家中之無名英雄，如 M. I. T. 廣播電台，柏爾 (Bell) 電話公司，通用電器公司，及其他多數工業研究室中，均不乏此項專家。就中，美國海軍研究室主任波文 (H. G. Bowen) 大將，亦有功於雷達之發明。

美國雷達之進步，與英國物理學者瓦特松．瓦特 (Sir R. A. Watson-Watt) 之研究平行發展，英國初稱之曰無線電勘察器」(radio-location)，嗣採用美國名稱「雷達」。德國人早在一九三五年已知實驗此物；日本物理學者矢木(Hidetsugu Yagi)在戰前久已研究短波，美國稱其一早期雷達天線曰 "Yagas"，法人於一九三六年曾在諾曼第設置一粗製雷達以探測冰山。

發現雷達原理者，實爲十九世紀德國物學者赫芝 (H. Hertz)，彼在一八八七年，由一鉾版放出赫芝波(即無線電波)，且由銅線圈

製成之共振器以捕獲其回響。

四 奇異理想

雷達之歷史，開始於一九二二年夏季，美國海軍中之泰羅及楊格二人，發送短波信號橫過河面時，發現水面航行之船隻擾亂其信號，遂相信無線電波或可用以觀測敵艦之行蹤。一九四〇年，美國陸海軍無線電技師們曾建設一鉅形雷達，能探知水中或空氣中相當大之物體，但不能鑑定其為何物。

最近四五年（一九四〇——一九四五），雷達之眞實奇蹟始遍全球，蓋美英科學家聯合研究，遂產生革命性之新武器，卽廣大之工業前途，亦將受其影響而有大發展。

五 吶喊與回響

雷達之根本祕密為無線電短波，其行為極與光相似。在電磁放射光譜中，其譜線之排列，由於非常短之宇宙線（一英寸之三萬億分之一，1/(00000)"）及 r 射線（原子彈中已被實用）起，以至非常長之電力波（六、〇〇〇英里）為止，幾無所不有，而光波雖較無線電波更短，但實極相鄰近。雷達中所用之超短無線電波，猶如光線雖能集成焦點（focus），與光恰相似；遇固體或液體表面，能反射而回；進行速度與光相埒，亦以每秒一八六、〇〇〇英里而直進。然在視察遠距離目的物時，無線電波比光更有裨益：能透過霧、雲、煙等厚層，其視達距離較肉眼見到者更大。又光波不易管制，而無線電波則不然，管制既易，且甚正確，對於觀測物之距離，可自動測量之。

就最簡單之概要而言，雷達發射無線電能（radio energy），達於目的物，被反射而回。收取此回響，記錄其往復路程，平分為二，因無線電波之速度為已知數，使此回響投於螢光版上，轉變為無線電傳眞（television），可將目的物之距離及位置表現而出。

事實上可供實用之雷達，非如此簡單；蓋若用舊式發報機，聯續發出雷達波，則仍屬無效。譬如人向絕壁不斷吶喊，必將得一種混亂夾雜之回聲無疑；倘欲得一清晰回聲，必須呼出一短而銳之吶喊始收效。雷達亦然，須發出繼續之電能波動，每一波動所經之時間，小於一秒之百萬分之一。大約每秒鐘有一千波動，則每一波動均有充分時間足以構成往復路程，卽對於一百英里外之目的物，每一往復所需之時間約為千分之一秒，於是可記錄其路程之遠近，不致與次一波動相干涉。

其成大問題者，乃在需要充足之馬力，始能從遠方得一可測知之回響。蓋雷達射線雖中送出之全部能，普天遍查，須秋毫無爽，始能盡其任務，故非有強大之馬力不可。

六 英美合作

欲使雷達變成精緻小巧之器具，足以裝設於飛機內，而又必須保持其需要之鉅大馬力（超過最強大之無線電台），故除改革無線電外，別無良法。

一九四〇年秋高氣爽之際，英國工程師攜一小手提袋渡美，在曼哈坦（Manhattan）上岸，邂逅柏爾電話公司工程師，遂祕密進行雷達之研究；而派往美國之布立通（Briton）氏，更攜有計劃及電子管（electronic tube）模型，稱曰磁電子（magnetron），實為一重要工具。

所謂磁電子，乃在磁化圓筒中，以高速旋急轉之電子，能發生非常短之電波及非常大之馬力。其原理雖已舊，然英國人僅使其向大馬力方面發展，而美國人始完成之以適合於雷達之用。

以磁電子之助，柏爾公司研究室等進行研究至無線光譜之不顯明部份，卽所謂微波（microwave）是也。在雷達未出世之先，相當長之無線電波（一公尺半），早已見用於戰場，然有嚴重缺點如次：（1）僅得粗大雜亂之回響；（2）有盲點，尤其接近地面時為甚；（3 需要巨大之天線。微電波一出，此等問題卽告解決。其波長可用厘米測量，

能形成射線錐，觀察遠物，甚爲精確，是以察見潛艇之潛望鏡。

七　四部構造

雷達之活動部份，可分爲四：

(1)錐形天線，發射無線電波及接收其回響。

(2)高馬力發報機，用磁電子製成。

(3)接收器，附有 klystron 管，光室，或其他振動管，用以使熱微電波之回聲變成較低之無線電頻率，故能使其放大。

(4)示振器（即吶喊觀測器），亦即雷達屏，與陰極射線管及無線電傳真器中所用者相同。最普通者爲位置指示器，乃一圓形針盤，備有電子射線錐，猶如時鐘之分針，掃過圓盤，與天線互相成爲同時性。盤上塗有發光藥料，凡雷達所見之物體，均可激發成像而出現於其上。

雷達之能力，據研究知其與目的物之反射力有關；此種反射力工程師稱曰介質常數 (dielectric constant)。金屬爲優良之反射體；地面對於反射，無足輕重；水之反射亦優良，但因其表面平滑，雷達射線錐除中心點外，其餘均向一定角度反跳而去，遂無回響回至接收器，故凡遇水面時，在觀測器中反表現成一黑點。

由地面反射而來之回響均與角度有關，在一定角度內，雷達射線可將地面之不規則形狀反映而出，凡隆起之物體，均可投射而成響，於山巔及山脊與周圍地面相區別。

雷達尚有一大問題必須解決，即觀查遠來之飛機或船，究竟爲敵爲友，須有判斷之法。經工程師們研究，發明一「敵友鑑定器」(Identification, Friend or Foe, 略號 I. F. F.)，極其靈敏。設置此器之飛機，被友機雷達射線射中時，此器自動發生閃光之鑑定信號，以作回報。

八　限制及前途

雷達之用途，亦非漫無限制。因其保直線進行，故不能觀查地平線對面之情況。因其不能透過水或固體阻礙物，故難侵入密閉室中，窺查其祕密。

又雷達射線可被不規則之地面反射散亂，故不能用以作汽車或火車軌道上之消弭音器(anti-collision)等。

其在戰時，雖成爲重要之武器，然在平時，亦與普通無線電相同。此次世界大戰已告結束，將來希望其能成爲商用飛機或商船上之一種必需設備。

輪船上如裝有雷達，可保險不致與冰山或礁石相撞，發生慘劇；在濃厚霧天，亦能使船以全速力通過擁擠之港灣或船塢。在空氣中，雷達與地圖相補助，可使飛行員飛行自如，恰如在日常居室中地氈上行走之狀，不至與山或其他飛機相撞。

據雷達專家想像，尚有其他用途甚多，曾有人欲在航空站利用雷達以研究鳥在高空飛行時之速度；但物理學者則以爲雷達不過微波發現後之一種應用而已云。

其實微波仍爲一大神秘現象，與水相似，可在管中流過，可被人體反射；能調節之以輸送聲音或圖畫。故利用微波，可在若干英里外祕密談話，亦可如廣播傳真或活動電影，以傳達接力賽跑或其他競技等。

理論科學家所最感興趣者，爲雷達測量時間之奇異精確度。蓋利用此物，可計算時間至一秒之一百萬分之一，而科學家們確信人類宇宙——由原子至星體——之重要新發現，將隨之產生；就中已有人夢想用雷達與月球通信，可由月球反射其回響云。

（附註）本文參考本年八月二十二日美國 Time Magazine 所載The Radar Story 編成。

不列顛底中國文化研究

汪家正譯

本文原題為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Britain，作者為葉慈 (Perceval Yetts)，按葉慈係英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權威，現任倫敦大學中國藝術與考古學教授。本文把英國人收藏中國美術品和古物的情況加以簡括的說明，頗有一讀的價值。這一篇譯文的底稿見一九四五年英國文摘第一卷第二十一期。在這兒，我們可以看到中英文化交流的極重要的一面。

約在一百年以前，在第一次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出品目錄的序言中，曾經有過這樣的幾句話：「在今天，許多文明國家都熱誠地注意着中國，注意着中國的古史和中國的現代地位，這一種情形，確為過去所沒有的。」這一段話，在目前，依然是正確的。第一次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是一個美國人創辦的，他的名字叫做鄧納山 (Nathan Dunn)，他曾經在中國經商十二年，前後一共搜集了一三四一件中國藝術品的代表作，他說他的展覽會不啻是一個中國社會的雛形。該次展覽會假海德公園廣場的花廳舉行，參觀者前後約近五萬人。展覽完畢以後，那一批珍貴的藝術品仍舊運回美國菲勒得爾菲亞州鄧氏的私宅。

第二次中國藝術展覽會，也是在英格蘭揭幕的。那一次展覽會以後，便大大地引起了英國人搜求中國藝術品的興趣。一八九三年，國際漁業博覽會在英國舉行，威爾斯親王——也就是後來的英皇愛德華第七，函邀中國參加，中國政府令飭海關總稅務司負責籌備一切。結果，在南凱興吞 (South Kensington) 所舉行的國際漁業博覽會裏，便多了一個中國廳。那一次中國藝術品的展覽，頗取得各方的好評。中國廳的物品，不斷的增多，在一八八四年的國際衛生博覽會中，在一八八五年的國際發明博覽會中，它都大大地出了一點風頭，而且，引起了各方面熱烈的興味和注意。

在那一次國際衛生博覽會中，從中國廳物品目錄上，我們可以看出：它的目標，也和鄧納山一樣，是想表示出中國日常生活的物質文明。它設製了中國各式房屋的模型，穿着各色各樣衣裳的各種階級人物的偶像，各類交通工具，棺柩蓋，火爐，武器，以及一幅表示一位高僧死後火葬的畫像。

在那一次博覽會裏，又特地從中國聘請了三十位商人和工匠到英國來：十位店老板開設了四爿大商店；十位名廚夫專門烹飪中國菜；六位名戲子表演中國戲劇和歌舞；還有一位木匠，一位漆匠，兩位理髮匠，他們都當衆表演他們的手藝。四大商店的門面，都是真正地從中國運去的：一個是北平古董舖的門面，一個是九江瓷器店的舖面，一個是漢口紙烟店的門面，而最後一個，則是廣東首飾店的舖面。

這幾次博覽會的結果，造成了一個新趨向：自從十六世紀遠東和西方海運暢通以後，精巧的中國手工藝的物品，大量地運達歐洲。不列顛的富裕家庭，大都對中國物品的優劣缺乏鑑別能力，他們只不過愛好中國工藝的新奇與秀麗而已，因此，那時候，對於中國的情況，也就形成了種種幻想和烏託邦式的說明。那時候的時髦風氣是：對中國，對中國的物產，一律表示盲目的羨慕和贊美。到了十八世紀的末葉，風氣突然一變，其時歐洲的知識分子，大都喜歡羅馬和希臘的古物。自十九世紀以後，東西交往日繁，商業貿易加多，英國和中國接觸的機會，逐漸增加，於是，英國人乃開始去研究中國的藝術和古物。

佛蘭克先生 (Mr. A. W. Franks)——也就是後來的佛蘭克爵士 (Sir Wollston Franks) 的寶藏，是大家所聞名的，他在一八七六年舉行第一次公開展覽，不久，他就把他的寶藏捐贈給不列顛博物院 (British Museum)，於是，該院的中國陶瓷部份便有了初步的基礎。關於一八七六年展覽會的物品，佛蘭克曾經寫過一本很精詳的說明書，那一本說明書的寫作方式，極富於科學精神。不過，在這一種研究上，貢獻特多的乃是布西爾博士 (Dr. S. W. Bushell)。從一八六八年起，到一八九九年止，布西爾博士在北平英國公使館擔任醫官，因此，他常常有機會和中國學者接近。在一八八二年，他替維多利亞阿爾柏特博物院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購買大量的中國工藝品，其中瓷器尤多。他又替該博物院編寫了兩本中國藝術手冊，分別於一九〇四和一九〇六年出版。這兩本中國藝術手册，無論就範圍的博大看，或是就學術貢獻看，都可以算是破天荒的工作，甚至於直到目前爲止，有些地方還沒有人能夠超過。

另一位醫生對於中國繪畫的搜求和研究，也頗有貢獻，那就是安德孫 (William Anderson)，他曾經做過東京的某一個醫科學院的解剖學和外科醫學的教授，在一八八二年，他把他搜羅的繪畫完全賣給不列顛博物院。在這裏頭，一共有一一四幅是中國畫，牠們獨自成爲一個體系。四年以後，他所編的中國繪畫與日本畫目錄在不列顛博物院出版，這可以算是第一本用英文寫的研究中國畫的著作，然而，這仍然是一些初步的研究。

由這些事例可以證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對於中國的物質文化，又再度地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於私人的捐贈和私人的搜藏，此種興趣乃更加猛進。舉例來說：一位名叫束爾廷 (George Salting) 的澳洲的大牧羊場場長和地主，他搜集二十年的結果，一共得到二千多件清代瓷器，他把牠們完全陳列在維多利亞阿爾柏特博物院，藉供衆覽，到了一九一〇年，他逝世的前夕，他又訂立遺囑：把該項珍藏全部捐贈該院。英國最大的收藏家，大概要首推尤卯夫勃羅斯 (George Bumorfopoulos)，在二十世紀一開頭的三十五年，他前後一共搜集了四千多件中國藝術和工藝的代表作。他的珍藏，替英國搜藏家建立起一個新的標準。到了一九三五年，英國政府特地撥款把他所搜的傑作全部收買過來，並分別陳列於不列顛博物院和維多利亞爾柏特博物院。

在英國，很少有人提到過中國的銅器，因爲在早年，這一類古銅器，很少出現於英國。銅器可以算是古代中國文明的紀念碑，也可算是中國藝術的開始的基本規範，能夠認識它的重要性而予以注意的，在英國，尤卯夫勃羅斯可以算是第一人。假如從他的著作來判斷的話，那末，布西爾博士似乎也不熟悉中國古代的精美的銅器。雖然尤卯夫勃羅斯努力搜求了一些銅器，可是，在英國，却始終沒有這一方面的代表作，一直到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開幕以後，英國人才開始看到中國銅器的精華。那一次展覽會自一九三五年年底開始，到一九三六年年頭閉幕，歷時四月，前後參觀者約近五十萬人。大多數人都認爲古銅器是一些極值得重視的和名貴的東西，因爲在此次展覽會中，中國政府一共陳列了一〇八件精美的銅器，牠們構成了一個完整而有趣的體系。無疑的，這一次展覽，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了解，極關重要，它在英國人士的觀感上留下了一個極深刻的印像，同時，也鼓勵許多英國搜集家在這方面多下一點訪求的功夫。在目前，有很多的英國收藏家藏有精美的中國銅器，例如巴羅爵士 (Sir Alan Barlow)，博魯斯先生(Mr. Robert Bruce)，柯爾先生(Mr. A. E. K. Cull)，般格萊爵士 (Sir Herbert Ingram)，馬爾康爵士 (Sir Neill Malcolm)，賽德微克夫婦(Mr. and Mrs. Walter Sedgwick)諸人，都收藏着一些名貴的中國銅器。柯爾先生的寶藏，爲數雖不多，可是却極關重要，關於他的寶藏，從已經出版的一本目錄上，我們可以略窺其內容。

一開頭，英國人對於中國的瓷器就很注意，故關於這一方面的收藏也獨多。假如用統計數字來敍述英國人所收藏的瓷器，那不免太枯

燥無味了，不過，至少，我們可以說，不列顛的一切博物院差不多都有幾件中國瓷器的精品，不過，却都不夠完備和豐富，要談到收藏完備和豐富，大概只有不列顛博物院和維多利亞阿爾柏特博物院足以夠得上標準。設置於日光港 (Port Sunlight) 的賴弗爾夫人美術陳列館 (The Lady Lever Art Gallery) 藏有大量的清窰瓷器和極少一些其他朝代的瓷器，由這裏可以反映十九世紀英國收藏家的興趣，那時候的他們，大概頗爲喜歡去搜羅近世的華麗瓷器。到了最近二三十年，英國古玩收藏家的趣味，逐漸的轉變，他們漸漸地歡喜去搜求中國古代的陶瓷器，而結局呢，就產生了幾位極著名的瓷器收藏家：像巴羅爵士，克拉克夫婦 (Mr. and Mrs. Alfred Clark)，戴徵德爵士 (Sir Percival David)，般格萊爵士，——這些人，都收藏着很多的中國古瓷。關於克拉克的瓷器，考陶德藝術研究院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曾經印製過一本照像集，至於關於戴徵德的珍藏，則已經印有一册說明書。在般格萊所收藏的瓷器中，宋朝汝窰的出品尤多。

在這樣一篇短文裏，有些事物不得不予以省略，然而，無論如何，中國的玉器，却不能不提一提，因爲玉器頗足以顯明地表示出中國的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已經逝世的大鑒賞家魯菲爾 (Oscar Rophael) 就特别喜歡玉器，他畢生所搜集的那許多中國的古玉和其他的古玩，已經全部捐獻給不列顛博物院和費芝威廉博物院 (Fitzwilliam Museum) 了。哈定爵士 (Sir Charles Harding) 一共搜羅了二五三九件精巧的中國藝術品，在這當中，就有大批的玉類的雕刻，依玉石的品質分，差不多可以分爲一〇〇多類。這大批的玉器，頗足以反映出中國人的信仰，風俗，習慣，和手藝。

在魏爾康歷史醫藥博物院 (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 中，那兒所收藏的中國物品，尤富於人類學的價值，除掉中國藥材，藥汁，針灸的器具以外，還有許多希奇古怪的東西，像治病驅鬼的符籙，就有好多種。對於劍橋大學的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院 (Cambridge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學者們一定很滿意，因爲那兒不但有中國古代的各種兵器，工具，錢幣，和陶器，而且，牠們又都是按照時代的先後被陳列着。最後，我還要來談一談甲骨文或龜甲文，——那就是十九世紀末葉在河南安陽出土的古物，這些龜甲文可以證明中國真實史蹟的最早的界限，而且可以告訴我們：中國文明在三千多年前的情況。英國所收藏的甲骨文，一共有二八二〇片，牠們大概隸屬於以下三方面：皇家蘇格蘭博物院 (Royal Scottish Museum)，不列顛博物院，以及郝浦金斯先生 (Mr. L. C. Hopkins)。在極少數的西洋的研究中國古代書法的學人中，郝浦金斯可以算是造詣最深的一位。

總括的說，在不列顛，無論是公家收藏也好，或是私人收藏也好，往往都偏重於多多搜求美術品，對於所謂「非藝術的」一般物品，却不大注意去搜求。我們要曉得：這一類所謂「非藝術的」一般物品，對於中國文明歷史的了解，也有同樣的價值。還有一點：除掉劍橋大學博物院以外，英國的公私收藏家，似乎很少有人根據中國人日常生活上的應用物品去研究中國文明的演進。英國的收藏，大都是分散零亂，重複浪費，我們必須創設一個規模宏大而完備的中央中國博物院！

秦漢時代關西人民的尚武精神

史念海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武勇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將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班固這段話很可以看作當時人物的分野。因為地理環境影響的差異，所以各地人民的風俗習尚也就自然不同。關西人民的勇武有力和鄒魯儒士的愛好文學，正是一個顯明的對照。這種區別不惟秦漢時候是如此，就是到了漢末三國之間也還沒有什麼大的變遷。後漢書虞詡傳謂：「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由虞詡此言，也可看出其流風餘韻，歷久不泯的盛況。

我們若由舊史的記載中實際考覈，當可知班氏此言並非過分的誇張。在戰國時，諸雄並爭，辯士縱橫，嬴秦也嘗羅致客卿，招納賢才，所以張儀甘茂范雎李斯一般人皆以白衣干策而取卿相。但是嬴秦所羅致的人物，不過是這班遊說之士，用來折衝於樽俎之間，與其立國的精神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實在說來，嬴秦之所以威凌六國，六國之所以畏秦者，並不是這班輸軒的使節，而是其無敵的雄師。這些無敵的雄師，都是選自嬴秦本國的人民，和其所羅致的一般客卿倒沒有多大的關係。

到了楚漢之際，劉邦項羽皆以東楚起兵，不用說他們的將士自然也以楚人居多。不過高帝的根據地是在關中，所以得力於秦人的幫助者實不少。史記蕭相國世家說：「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嘗與關中卒，輒補缺。」這正是說明高帝的部隊實際已變了本質，和他初起兵的時候大不相同了。垓下之戰，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即以為漢已得楚。由這裏也可以看出這時漢軍的成分，已經沒有多少楚人了。後來高帝大封功臣，以曹參攻城野戰的功為多，列置第一，而鄂千秋就以蕭何由關中運糧遣兵為功最大，應該在曹參之上，高帝接受他的建議，因以蕭何居第一，而抑曹參居第二。這固然由於蕭何的調度得宜，但是關中的糧秣和兵卒在楚漢戰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則是無可懷疑的事情。

因為高帝起於豐沛，所以一班佐命的功臣，自然以豐沛的人為多，而執兵柄的韓信、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也都是豐沛附近的人物。但是時間稍久，這種趨勢也就慢慢消滅。西漢中葉而後，豐沛因為帝鄉的關係，容易攀龍附鳳，所出的人物仍是很多，而素質的鬆異，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時豐沛的人物除了一些與帝室有姻婭關係以外，大半竟然是寬衣博帶的經生儒者，而攻城野戰叱咤風雲的勇士不能不稱數關西諸郡了。

關西人民雖然在材力上壓倒關東各地，但在文事方面却不能不低首於關東儒者之前。自嬴秦至於漢初，政府都未積極注意於文事，固不必說了。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進用，崇文學，講儒術，博士弟子為一般人的進身之階，而關西的人民在這方面却不大聽說，史漢二書俱有儒林傳，專記一代經術文學之士，但是關西人民在其中並沒有佔重要的位置。這很可以看出秦漢之世關西一般人的習尚。關西人在西漢時雖也曾登庸卿相，如武帝時的公孫賀李蔡等，然而其所恃以進身的

卻是汗馬的功勞，而不是尊前的對策。

東漢時這種差別慢慢減少。最著名的涼州三明（安定皇甫規，字威明，敦煌張奐字然明，武威段熲字紀明），皆爲一時名將，邊庭重鎭，但於材力之外，也都兼崇儒術。雖然仍是赳赳武夫，而勇武之中也還彬彬有禮。後漢書皇甫規傳言：「（規）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又張奐傳言：「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尙書記難三千餘萬言。」段熲傳亦言：「熲少便習弓馬，尙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我們若不讀其全傳，究其身世，僅就這幾段記載看來，誰能說他們不像鄒魯的儒士，又誰能想像他們是曾經威震邊庭，羌胡畏服的名將？

經過武帝和董仲舒公孫弘一班人對於儒術的提倡，東漢一代明章二帝也都注意這方面，所以儒學大昌，關西受其影響，風氣也有點轉變。上面所說的涼州三明皆以一時名將，而授徒著作，堪爲這時期的代表。然風流未泯，尙武的精神固仍保存而不失。譬如扶風馬融，亦爲一代鴻儒，名重關西，盧植鄭玄皆出其門下，但其請纓征羌的勇氣，雖千百年後，仍能令人景慕不置。後漢書融本傳載其請纓的端末說：「（融）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幷，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雖然當時政府沒有允許他的請求，而這種武勇的精神不能不令人佩服，這絕不是普通人所想像的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所可比擬的。

上面所舉的不過是幾個特殊的例子，由這幾個特殊的例子很可看出一般的情形。實在的說來，秦漢時代關西關東的人民在素質上多少有點差異，尤其是邊郡的人民更爲顯著。兩漢對徙民實邊的政策看得特別重要，實邊的事實更是史不絕書。實邊的人民雖然也和邊地人民一樣，染到尙武的風氣，但初至邊地，往往會受到邊民的欺凌，這其中自然免不了主客不和的關係，而實邊的人民體質荏弱，恐怕要佔最大的原因。後漢書賈復傳載：「建初中（賈宗）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這正是關西人民和關東人民差別的地方。

至於關西人民所以崇尙勇力的原故，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中已經指出一點。在漢書地理志中，班氏更作詳細的說明。他說：「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戴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班氏此言乃就地理環境的影響，說明關西人民之所以崇尙勇力是由於地鄰邊庭，接近羌胡的原故。固然，羌胡的騷擾使關西人民不能不講求防禦的方略，因而養成崇尙勇力的習俗。但是，當時政府的提倡和社會的鼓勵，却也相當重要，而不容輕易忽略的。

說到政府對於尙武精神的提倡，最早當然要數及秦孝公。本來秦的立國，原是僻居西陲一隅，其初因爲國小地僻，而爲中原諸侯所輕視。繆公雖曾稱霸，然其威力僅及於西戎，東則爲晉所阻，不能一出函谷關。及孝公即位，頗思振作，乃任商鞅爲相，風俗因之大變。秦人的勇武好戰，孝公和商鞅的力量最多。史記秦本紀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

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商君傳亦言：「定變法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秦國本來遠處西陲，與戎狄相鄰，其習俗素喜勇武，更加上孝公商鞅的一再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風俗的變化，是想當然的事情。商鞅在鼓勵秦人尚武之外，還有更重要的設施，他設法招徠三晉之民使代秦人耕作，好讓秦人專心出去作戰。商君書徠民篇中言：「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秦國得到這樣調整根本沒有後顧之憂，秦人也得一心一意去從事戰爭，誠如商鞅所說「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商君書徠民篇），秦兵愈戰愈精，而六國應敵不暇，無由再從容去耕作了。自此以後，一般人對於秦軍的勇武，都另眼相看，尤其是那些縱橫辯士，更是稱道不置。戰國策秦策三載范睢說秦昭王之言曰：「大王之國，……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韓策一又載張儀說韓王之言曰：「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史記張儀傳作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辯士的言詞雖然免不了誇大的成分和恭維的氣息，但他們所稱道秦卒的壯勇，却有幾分的真實性，因為秦兵屢次東征的結果，證明這些話並非完全靠不住的。

嬴秦的兵制我們已經不大知道。漢代的士卒則多用關西的人民，這對於關西人民尚武的精神，實予以莫大的鼓勵。漢初兵制，大約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幾類，皆選郡國人民有材力者充之。樓船士多在江淮之南，為漢代的水軍。水軍在漢代效用極少，僅在對南粵朝鮮等處用兵時徵發過，其他幾乎不再聽聞。輕車騎士大抵都是關西人民，而材官則多半是選自中原人民。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武帝紀：「元鼎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由這幾篇帝紀中可以看出騎士與材官在徵發地域上的分別。西漢時，騎士頗為一般人所重視，社會地位也相當之高，雖封疆大吏對於他們也不得輕易奈何。漢書趙廣漢傳：「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竟坐要斬。」廣漢在當時身為京兆尹，京兆尹的位置非常重要，而廣漢在西漢一代中也算有數的能吏，為人又是極精明強幹，在地方官吏中曾經大露頭角，但竟因為斥除騎士的罪名，而受到腰斬的重刑。這雖是廣漢本人的不幸，由此也可看出騎士在當時所受到的待遇是如何的優渥。至於材官，則沒有這樣大的福分，得不到這樣的青睞。其原因所在想必是與關西士卒的勇武有關，或者因為材官是步兵，彼此之間遂有軒輊。武帝以後，兵卒的種類增多，有選募的勇敢，犇命，伉健，豪吏，應募，私從，又有徵自罪徒的讁民，惡少，亡命，徒，弛刑，罪人，應募罪人等名稱，但是騎士的地位，並沒有因之而減低。

騎士固是關西人民的進身之階，而拱衛宮廷的羽林期門，更是關西壯士發跡之始。羽林期門的選拔，率由六郡良家子。這裏所謂六郡是指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而言。至於良家子的限制，據如淳的注解，謂醫士商賈百工之人不得參預其間，其中的份子可說是相當純粹。若不是這六郡人民特別的勇武，何以會有這樣特殊的選拔？在當時由這羽林期門兩部份出來的人才是相當的衆多，漢書趙充國傳：「充國，……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甘延壽傳：「延壽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以材力愛幸。」公孫賀傳：「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後漢書董卓傳亦言：「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這不過幾個顯明的例子。兩漢數百年間以羽林騎門出身而據高位的，正不知有多少，利祿之數，難怪要引起一般人的羨慕，因而都往這條路上想辦法。武帝提倡儒術，廣置博士，打動齊魯閭儒生的利慾之心，研究章句的人，竟成了普遍的風氣，但是這種博士的頭銜，卻打不動關西人民的心理，因爲他們另有進身之階，出頭之地，用不着摸索簡册，尋章摘句。後來到東漢時，儒風雖然西被，而關西的人民仍然不願意驟違舊俗，所以尙武的風氣並沒有因之稍殺。

關西爲產馬之區，也可以間接的助長關西人民的尙武精神。這話看起來很爲奇突，實在當時的情形，正是如此。古代戰爭以車戰爲主，到了戰國，車戰已經不能應付敵人，於是騎兵佔到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秦漢時常和匈奴西羌戰爭，騎兵更是重要，沒有騎兵簡直不能和羌胡對壘。因爲這種關係，騎兵在社會上的地位是要比步兵高過許多，上面所提到趙廣漢以斥除騎士而獲罪，就是一個證明。關西騎士無論在質與量上，皆爲全國其他各地所不及，當然也可以歸功於關西產馬的優良。遠在嬴秦之時，關西產馬的優良，早已膾炙人口。戰國策秦策一載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巴蜀漢中本是嬴秦的糧食倉庫，今以胡貉代馬與此糧食倉庫並舉，可知其所佔地位的重要了。又韓策一載張儀說韓王曰：「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稱數也。」其所產的馬，素質之佳，於此可見一斑。嬴秦之所以能掃平六國者，固然是仗着他的優越兵力，同時馬種的精良，也不能沒有關係。到了西漢，對於馬的養育，曾經作到最大的努力，李廣利的西征大宛，就是因爲尋求天馬而起。並且又在西邊北邊諸郡大舉養馬，一時視爲國家的要政。漢書百官公卿表師古注引漢官儀說：「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六萬頭。」可知漢代對於馬的重視。武帝以後，關西各地盛植苜蓿，也是因爲苜蓿爲飼馬的最好草料。關西諸郡本來是宜於牧畜的，政府養馬之外，人民私馬的養育也有相當的數目。漢書地理志謂：「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後漢書鄧禹傳亦言：「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這種自然宜於畜牧的環境之下，畜牧事業的發達，是可想像得到的事情。史記貨殖傳說：「烏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這正是北地郡一位養馬的大家。而東漢馬援也是以在邊郡田牧而致富豪。後漢書援本傳言：「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關西養馬如此之衆多，其人民對於騎射的工夫，當然可以日趨精良，關西騎士的質與量爲全國各地所不及，也當然得力於馬的力量。我們再由歷來征伐匈奴對於馬的損失，因而影響到關西騎士的優越的地位，可知馬的關係是如何的鉅大。史記衛將驃騎列傳：「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其損失之大直可驚人，甚至對於

整個的國策也發生影響，對於關西騎士的命運，自然也有重大的關係。大概關西的騎士受了這樣的打擊，其精神稍有降落，到了東漢初年，漁陽上谷的突騎，竟也有名於時，而關西騎士反沒人提起，故後漢書吳漢傳就說：「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話雖如此，關西人民尙武的精神究竟濃厚，雖因一時的挫折而有降落的情形，但休養生息，仍然可得到原來的狀況，所以涼州兵的英名，歷久不衰，一直到三國初年，涼州兵還是被稱爲天下的勁旅。

誠如班固所言，關西諸郡因爲迫近戎狄，所以其俗習修戰備。自嬴秦以至漢末，匈奴與西羌始終爲西北二大邊患，侵擾邊塞，抄掠人畜，一直沒有止息的時候。在這樣情況之下，關西人民實在得不到休暇的機會。漢書賈誼傳所謂：「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得輕復，五尺以上不得輕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恰是一幅絕妙的戍邊圖。關西人民爲了自衛，也是不能不講求尙武的精神。李廣傳謂廣世世受射，這種相習成風的訓練，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自秦漢迄今，歷時數千年，雖然環境屢易，而西北人民仍然有以勇武聞於世者，這不能不說是受舊俗的影響。班氏所謂歌謠慷慨，風流猶存，其實把這兩句話用在今日也未嘗不可。

姜石帚非白石辨

孫玄常

吳夢窗詞藁有「贈姜石帚」及「賦姜石帚漁隱」等詞六闋，繇來皆以石帚卽白石別號而襲用之。如朱竹垞云：「塡詞最雅無過石帚」。宋翔鳳云：「詞家之有石帚，猶詩家之有杜少陵。」林旻廬云：「詞家推姜石帚能結響啞，不善學，則流於滯澀。」是咸以石帚爲白石也。獨夔碧齋詞話頗疑之，曰：「今夢窗四稿中屢和石帚，而姜集中不及夢窗，疑不可考。」然亦不知石帚非白石也。吾友阮君成璞精詞曲，工古今體詩，近以書見貺，論姜石帚非白石之說甚精。其言曰：『白石詩後附錄吳夢窗贈姜石帚詞多章，實不應列入。蓋姜石帚與姜白石原係二人，考夢窗嘗與張玉田，賈似道爲友，宋之亡也，玉田年纔三十有三，玉田爲張鎡(功甫)之曾孫，功甫爲白石之友，卽楊誠齋所謂：「新拜南湖爲上將」者也。安有曾孫之友與曾祖之友相友善，相贈答之理？夢窗雖高壽，亦不應若是之高也，但觀諸家贈答白石之作，不謂白石，卽曰堯章，惟夢窗始終曰石帚，卽可以滋疑竇矣。』

按阮君此說，誠發前人之所未發，考白石夢窗生卒歲月亦不詳。白石生卒年月，余已於年譜略爲考定矣。夢窗詞藁中有歲月可稽者僅十三闋：

瑞鶴仙	理宗淳祐六年
瑞鶴仙	淳祐三年
滿江紅	淳祐四年
水龍吟	理宗景定三年
賀新郎	寧宗嘉定六年或嘉定十七年
暗香	淳祐三年
鶯啼序	淳祐十一年
永遇樂	淳祐五年
絳都春	淳祐十年
探芳信	理宗端平三年
聲聲慢	度宗咸淳三年
聲聲慢	淳祐四年至六年間

思佳容　嘉定十七年

（以上並錄自朱古微先生「夢窗詞集小箋」）

晚宋詞人，夢窗而外，以周草窗、王碧山、張玉田爲大家。草窗生於紹定五年，卒於元至大元年，享壽七十有七（見梁氏「名人生卒年表」）。其年輩較長，故得與玉田之父張斗南游。玉田年輩較晚，中歲即丁國變，故下逮見元人袁伯長，張伯雨諸賢也。今覽夢窗集中，有賦「草窗絕妙詞」（踏莎行）一闋。草窗集贈夢窗者有二：曰：玲瓏四犯（題云：「戲調夢窗」），曰：玉漏遲（題云：「題夢詞集」）。按：詞中有「錦鯨仙去，紫簫聲杳」之句，疑是夢窗亡後作）玉田集中及夢窗者亦有二。曰：聲聲慢（題云「題吳夢窗遺筆」或作「題吳夢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後」）。曰：西子妝慢（序云：「吳夢窗自製此曲，余喜其聲調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與羅景良野遊江上，綠陰芳草，景況離離，因塡此解。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考江賓谷（昱）「山中白雲詞」箋云：「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則距夢窗之亡，當已久矣。

其他與夢窗相酬唱，見於小箋者，則有賈似道、史宅之、吳潛、沈義父、吳泳、翁元龍、翁逢龍、陳郁、劉震孫等，皆寧宗、理宗、度宗間人。孝宗時人，蓋亡有也。繇是觀之：夢窗之詞，上無過嘉定六年，下無過咸淳三年（其間先後凡五十三年）。又以草窗及玉田詞集及同時諸人證之，則夢窗或與草窗同時，而早於玉田。故夢窗大約生於慶元嘉泰間，而卒於宋亡以前（夢窗詞中無道及國變者），享年在七十左右，雖涉臆測，或不甚遠也。

考白石歌曲，刻於雲間錢希武之東巖讀書堂，時爲嘉泰二年，其題錢氏溪月云：「才因老盡，秀句君休覓」，知已近晚歲。然吳履齋暗香疏影序云：「乙卯庚辰之間，初識堯章于維揚，己丑，嘉興再會。」己丑，紹定二年也，知是歲白石尚存。則夢窗上及見白石，非不可能，第白石晚歲，夢窗尚在髫齡，安得詩酒流連，酬酢往還乎？

又按古微先生「夢窗詞小箋」跋惜紅衣詞云：「按蘋洲漁笛譜拜星月慢敍，稱作景定癸亥，草窗別題寄夢窗。劉毓崧據爲夢窗此年尚在。而白石詞刻在嘉泰壬戌，下距景定癸亥，已逾六十年。其寓吳興，又在嘉泰壬戌前十二三年，則景定癸亥，年已八九十；其從遊時代，惜無可徵實矣。」

按古微先生尚以石帚爲白石，宜有此誤，然考覈甚精。蓋白石寓苕溪時，尚在淳熙之末，下距咸淳三年，凡七八十年，若石帚即是白石，則夢窗縱壽至九十以上，其與白石同遊苕霅時（夢窗惜紅衣序云：「予從姜石帚遊苕霅間，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聊以詠懷」。）亦僅在十歲左右，是亦不合情理者也，則石帚之非白石，又可得一證矣。

附　白石道人小傳辨誤

白石宋史無傳，阮文達公所刻「詁經精舍文集」中，撰白石傳者，有徐養原、徐養灝、張鑑、嚴杰、徐熊飛、何超灝等凡六人，皆文達門下士也，仁和許氏榆園本「白石道人集」及陳氏「白石道人詞箋」並錄嚴杰一篇，遂行於世。余以史籍年譜等參證之，乃知嚴氏所撰「白石道人小傳」，實多紕繆，不可不辨也。

「白石道人小傳」曰：『紹興中，秦檜當國，隱箬坑之丁山』。

按：秦檜以紹興元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二年罷。八年，復拜相。十年，封莘國公。十二年，進封慶國公。機遷少保，加冀國公。紹興二十五年卒，追封建康郡王。其在相位，前後凡十九年，具見宋史本傳。考白石父噩紹興庚午進士，是紹興二十年也（年譜作「紹興三十年進士」），白石生卒年月雖不可深考，然其探春慢詞自序云：『予自孩幼，從先人宦於古沔，女須因嫁焉。』可知紹興之季，噩方知漢陽縣（當在登進士後），時白石年尚幼；又安得有「秦檜當國，隱箬坑之丁山」之事乎？是小傳之誤一也。

「小傳」又曰：『初學詩於蕭爾，攜至苕上，遂以兄子妻之。』

按樂府紀聞曰：「鄱陽姜堯章流寓吳興，蕭東夫愛其詞，遂以兄

之子妻之。」張功甫贈白石詩原注云：「千巖居士蕭東夫，即姜婦翁也。」東夫，蕭德藻字也。而小傳乃以蕭𣂏爲德藻，誤矣。考蕭𣂏元陝西津元人，字維斗，爲關中大儒，大德中，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諡貞敏。𣂏學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等。學者稱勤齋先生，元史儒學傳及宋元學案俱有傳。是知蕭𣂏乃有元大儒，非白石之婦翁也明矣。此「小傳」之誤二也（蕭德藻傳見「白石道人詩集箋注」）。

昔阮文達公領袖風雅，得士稱盛，然若杰文之疏陋，文達竟未深考，即刊入集中，非賢者之過歟！

余避地巴蜀，始學詩。既而酷好山谷，又愛白石，客歲居江津城中，課徒之餘，乃爲白石道人詩集箋注，逸事年譜，亦詳加蒐訂，歷時十月，初稿粗定，凡十萬餘言。顧慴考覈未精，不敢率爾問世。茲先取附錄兩篇，請東方雜誌刊出，以求通人名儒教焉。同窗阮君成璞啓迪甚多，孫生金樹又爲抄校，並此誌謝。

王舍城與靈鷲山

李樹青

——天竺遊踪瑣記之五——

七月二十九日自阿格拉（Agra）東返，翌晨六時抵達伽耶。因欲往王舍城及靈鷲山一遊，遂於此換車往巴特納（Patna）去。傍午到達車站，更換車東下，不久又到巴特納城。這個城鎮即佛經所謂香花宮城，亦稱波吒釐子城（法顯呼爲巴連弗邑），阿輸迦王亦即無憂王的故都也。據謂此城宮殿皆役使鬼神所作，『彫文刻鏤，非世所造。』法顯住此闍摩訶衍僧伽藍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現聞此城有一佛教博物館，中藏佛教的珍奇遺物特多，並存有一無憂王石柱。而佛經上所謂雞園（梵語屈吒阿濫摩）亦在此地。惜因時間倉促，不暇下車遊歷，殊爲悵悵。

下午三時到達巴蒂亞坡車站 。從此再換搭輕軌火車前往王舍城（現名 Rajgir）車站。路程雖並不太遠，但因小火車行駛遲緩，車站又多，直到晚六時纔到達了目的地。這個地區雖係新舊王舍城所在地，但城市早已荒廢，現只係一小鄉村或聚落，既無旅店，又無飯館，來瞻拜佛教聖蹟者，只能寄住於僧伽藍中。經車站的人指引，我遂下榻於緬甸僧院。

緬寺的主持僧人着黃色袈裟，態度頗爲客氣。初來時，他以爲我是緬人，通話以後纔知我來自中國。他嫻習巴利，稍識英文，在我們間的談話，頗感困難。因此，他介紹我到附近的日本僧院去訪問一位印僧。這位印僧旣嫻英文，又熟知附近的佛教聖跡，和他去安排朝拜靈鷲山。

這個地方，除去佛教遺蹟外，還以溫泉著名。在法顯的記載裏雖未提及溫泉，但玄奘却有很長的一段敍述。他說：『聞之土俗曰：山（毘布羅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暖未盡溫也。其泉源發生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淸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獅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爲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疹多瘥。』（大唐西域記卷九）心裏面有了這種準備，所以我在前往訪問印僧時，便攜帶了手巾，預備着同時

去嘗試一番溫泉的沐浴。

日本僧伽藍距緬寺不及三里。到後，適值印僧亦有兩位自巴特納來的客人，計劃着於翌晨前往靈鷲山，遂約定於翌晨七時在彼處早茶，然後一同出發朝山。

離日寺後，便往溫泉。原來此地較好的溫泉均爲寺廟佔據。印度教回教及耆那教等寺院均佔有溫泉，以爲號召之用。其牆下公開給一般民衆者，不是泥污不堪，便是乾涸無水。按照此間慣例，佛教的廟宇因均係外國僧人所建，佔據不到溫泉，佛教徒一向是在印度寺院的溫泉沐浴的。我也只好遵俗前往。這個溫泉頗佳，水量既大，又復澄清，溫度與人身體相差不遠。廟內果然修造一個浴池，編石而成，深約四尺。溫泉的水源亦自池旁一個獅子及一個白象的口內流出，上彫神像，均如玄奘所記。池底常有泡沫上升，顯然亦有源頭。解衣以後，跳下水去。這一頓沐浴，雖然因氣候炎熱的關係，未免流汗遍體；可是在兩天的火車旅行之後，忽然得到這一陣暢快的溫泉沐浴，眞是心曠神怡，肌肯爽快。

返回緬甸僧伽藍後，緬僧謂巳經預備好了晚飯。這一餐晚飯是我到印以後首次嘗到的印餐。一個大銅盤，中間滿盛着米飯。此外有一碗咖哩湯，幾樣素菜，殆全係印度味道。幸而廚司給我一隻調羹，算是代替了指頭。因爲飢餓，吃起來到也覺得相當的可口。以後這幾餐全然如此。到了窮鄉僻壤的所在，也就顧不得許多衛生與清潔條件了。

翌晨早起以後，便到日本僧舍去。在吃早茶中間，纔知本寺這位日本和尙，因爲戰爭的緣故，已被監禁數年。這位印僧也曾因親日反英的嫌疑，遭過監禁。寺內供如來佛像，佛龕上的一切用品，木魚清磬，香爐皮鼓，均係自日本運來。這位日僧雖然是佛教徒，但對他國內軍閥的侵略隣國，不但認爲正當，而且感覺榮譽。佛教到了武士道的日本，殆早已成爲『逾淮之橘』了。

茶後出發。先到門外瞭望一番所謂新王舍城遺址。本來只有這個

新城纔叫王舍城（Rajagriha）。這個城市的基址，據謂係寒林棄屍之所，頻毘娑羅王（Bimbisara）頒令徵罰失火首惡所遷處的地方。不料法令頒佈以後，宮中先自失火。爲自責計，頻毘娑羅王本人遂移住此處。鄰國吠舍釐王聞知此事，想要以武力前來襲刼國王，邊候報警，乃建城邑。因王巳先舍於此，故曰王舍城。法顯來時，曾於此城內購買香華繒燭，似城內尙相當繁盛。玄奘時則城中只有居民婆羅門不及千家。現在則城牆巳全部傾圮，只在緬寺對過一帶尙餘石基，南向一門，隱約可辨。牆下的只有荒煙衰草亂鴉斜日，用以點綴當年的居民及城郭而已。

城南不遠係迦蘭陀竹園遺址。玄奘時猶有精舍，爲如來在世時說法之處。現只存一片荒地與一個水池。馬路東有一窣堵波基址，不知是否係未生怨王（梵名 Ajatasatru）得佛舍利後所建。據玄奘謂佛舍利塔旁尙有另一窣堵波，內藏尊者阿難的半身舍利。此外尙有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的地方，皆曾建塔。這些建築，據距離推測，當在日本伽藍附近。現在所能看到的，只不過是在荒榛斷梗之間偶見一點碎瓦頹垣與鬼燐螢火。

再沿大路南行，路旁便是昨日沐浴的印度教寺院。更向前進，即達山口。兩山脊上都尙存有城牆的基址，顯然這座山口便是當年的城門所在地。從這裏算是走進了兩千年前的上茅宮城（梵名 Kusagra-apura，舊因王舍城故，亦呼爲舊王舍城）。這座古城，玄奘謂係在『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國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週，以爲外郭，西通狹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大唐西域記卷九）我們走進北門以後，覺得豁然開朗。四面圍繞着高山，中間一片平地。到處皆是叢林，想是羯尼迦樹。山內無一家居民，偶見碎磚破瓦，也許即係當年的街市吧？南進七八里，到了一個具有方形磚基的所在，印僧謂係古監獄遺址，卽頻毘娑羅王爲其子未生怨王所監禁以及後來

被弒處也。從此折向東去，不遠，走出一個地表墳起類似牆基的地方，係內城的東門。

出東門後，逐漸登山。在半山中馬路旁有一塔基，紅磚四圍，名為下乘。據謂頻毘娑羅王來見如來時，到此即徒步前進。大路將盡，在山坡間又一小窣堵波遺址，名曰退凡，即王到此地後簡退一切凡夫俗士。我們從此再登上東面的峯頂，這地方就是最著名的靈鷲山（梵名 Gridhrakuta，亦譯耆闍崛山）。玄奘說：此峯『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峯頂由幾塊巨石，聚湊而成。崖頂在一疊立巨石上，有精舍遺址，玄奘時倘見有等如來身的佛像，現則只賸有一片平臺與幾段磚基。石隙間生一大樹，枝葉繁茂，下建石臺，據謂即釋迦當年講首楞嚴與法華經處。懷及我們的最初留學生法顯來時，倩兩舊比丘送上此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自恨生不及佛，流着眼淚在此誦首楞嚴經，停留一宿始還。有眞感情，具眞信仰，法顯法師的成為我國最早與最著名的留學生，當然並不是偶然的。

稍東仍有一精舍基址。西面一巨石矗立，中分一道，僅可容人。這樣使向西懸崖上的精舍與東面的分開。巨石崖下仍有一石，表面平坦，也是釋迦當年說法的地方。提婆達多（亦譯調達為如來從弟）擲石傷佛足指處，法顯玄奘均謂在崖上精舍附近，英考古學會則謂係在山下，恐係後者之誤。因後者所根據資料，除巴利文經典外，即只有法顯玄奘與義淨諸人的著作。倘對中文不能甚解，即易發生錯誤。

崖下有一石洞，可容十數人，內塑佛像，不知是否即尊者阿難為魔王恐嚇處。玄奘謂在精舍南山崖側佛石室前有大磐石，上有鳥跡，崖中通穴，謂前者為魔王所化鷲鳥所踏，後者則佛伸臂通過石臂以慰阿難的遺跡，似即係此處。唯此洞係在北面崖陰，不在南山。

我們在靈鷲山峯頂徘徊流連，不覺已有一小時。在這約近一個鐘頭以內，腦子裏思潮起伏，使我想到了許多平素未曾考慮的問題。

這幾塊由崖石所湊成的山峯，固然秀麗雄壯，可是在世界的其他部份，類似這樣的峯巒不知還有多少。而靈鷲山的所以特別著稱，甚至吸引到異邦的遊客，主要的並非靠着風景，而是因為釋迦佛曾經『多居此山』，並曾『廣說妙法』。這山的峯巒若非秀麗，釋迦也許不曾在此說法；自然的風景加上了名人的事蹟，這纔使某一個特殊地域變成了萬人瞻拜的聖地。我國的前輩留學生如法顯玄奘義淨諸大法師沒有一個不曾朝拜此山。我們千載後的人亦要追踪來此，除瞻仰佛的遺跡外，還想在荒山廢寺之中尋訪我們先賢的足跡。人類的智慧結晶與文化遺產，便是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在現在這個不幸的人類社會中，偏偏有些有權有勢的人極力地抑制知識與摧殘文化，想把人類的富於創造的才智都逼到一個牛角尖裏去。這固然是一種心勞日拙的愚蠢行為，經久會隨着歷史的洪流漸然俱滅，然而在某一特殊時期內，由這種行為所發生的作用，到也不可輕視。

釋迦佛的偉大，就在乎他的以理論服人，以道義感人，絕不用卑鄙手段或武力來強迫他人信從自己的思想。正因為如此，他的經典與學說纔傳遍了整個的東亞。使他所嘗居處與說法的峯巒，都成了兩千餘年萬人朝拜的對象。我想，在登靈鷲山的人，尤其在現在，這恐怕是最容易引起的感想吧？

這時印度正值雨季，天氣頗為不妙。今日是一個陰天，不唯濤着侵人，隨時還在降落霏微的細雨。幾位印度朋友沒有帶傘，一直在催着回去。於是我們在眺望了一陣風景以後，只好連袂下山。

在歸途中，我們又遊歷了幾個地方。一個是在上茅宮城正中的 Manyar Math。四圍存有相當高的牆基，中間為一壇，高約丈餘，壇上一圓形建築物，崇高龐大，外面塑有裸體男女形像，內部虛空，深約數丈，探險發掘的人曾發現了不少的陶器。對這個建築物的解釋，有人謂係耆那轉的廟宇，經英考古學會近來發掘的結果，認為這地方的建築係經悠長的年代積累起來的，耆那教的廟宇只是到最後纔添加上去。其最先的基地，再加許多奇形的陶器，認為是流行東印闕

於崇拜毗的宗教建築。畢竟如何，還得等待更多的發掘出來的資料的證明。

又參觀了西面山崖下兩個石洞，名爲桑班達爾(Sonbhandar)。東西並列，靠西石洞在石壁上還鑿有門窗。東面一洞則上蓋及前崖大部傾圮。有人謂，這卽佛與阿難所入定之處，此種說法不唯在中國書籍的記載上不能證明，而黯際所遺留的影像，顯然是耆那教的神祇。故目前均認爲係耆那教的遺蹟。

西面這座山嶺名爲毘布羅山 (Vaibhara Giri)。山頂有許多佛教遺跡，因爲天雨，我們沒有能夠尋訪：(一)在山脊右側耆那教廟宇的旁面有一個很大的石室，長約一二·〇英尺，寬則從西端的十二英尺到東面的三十四英尺。石室前尚有一廣場。據考證，這卽係佛涅槃後六個月尊者摩訶迦葉波在此與九百餘僧衆結集三藏的處所。最初阿難因緣未盡，被大迦葉擯諸門外。一夜之間，得證羅漢果，始得進入。這些事蹟，昔時均建有窣堵波加以紀念，現只賸這個廣大的石室。由此所結集的藏經稱爲上座部。至大衆部結集的處所，則在迤西約二十餘里。(二)在靠近北端山坡上有卑鉢羅石室(梵名 Pippala)，據謂『世尊在昔，恆居其中。』此石室係累石疊成，不悉是否原來的遺物。其它繞山崖附近遺址甚多，正如玄奘所謂：『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幽居隱淪之士，蓋已多矣。』現因佛教在此邦早已衰滅，因而這些先賢遺蹟大半都湮滅於荒烟蔓草之中。婆羅門爲着保持本身種姓的利益，不惜用種種手段，摧殘釋迦所倡導的衆生平等與具有世界性的宗教。結果佛教衰亡，印度亦不復能夠統一。印度的上層品級人士實在太辜負他們的偉大賢哲——釋迦牟尼——了！

越行散記

伯商

中華建國三十四年九月，余奉使越南，將有受降之舉。於時盟國勝利，日本投降，越南本劃歸中國戰區，歸中國最高統帥部指揮作戰；故經盟國共同協定，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歸中國接收；而北緯十六度以南，則歸英國接收。余忝奉使節，建牙河內。游蹤所及，東至海防，南至順化，西北至老撾，越南名勝，多所瀏覽。本篇所記，但紀山水；至若政治軍事，則不但牽涉時政，亦且關係外交，異日當另作實錄發表，目前尚非其時也。

一 昆明一瞥

九月十九日，晨五時卽起，曉星在天，殘月猶明，拜別高堂，卽乘汽車赴珊瑚壩飛機場。曙光熹微中，擺渡過江。八時起飛，俯視重慶，雙江襟帶，萬戶櫛比。八年以來，與此城共患難，今當遠別，頗令人依依生惜別之感。漸飛漸高，羣山起伏，盡出足下；獨歌樂山一峯較高，挺峙天際。繼飛過東山山脈，兩山並行，從西南趨向東北，中爲高原，蜀人稱之爲槽者是也。沿長江上飛，有時江流縈曲，作大迴環，舟行其中，渺如一葉。過合江後，漸入高原地帶，峯巒磅礴，蓋已入貴州西部高原。繼見萬山深處，二溪縈迂，峽谷峭裂，疑爲烏江上游，後閱地圖，果知其不誤。須臾霧氣漸生，飛機飛行雲層之上，稍有動盪，惟天光明媚，已現滇南景色。不久滇池在望，十時三十分，飛抵昆明機場。

此次同機抵滇，有留德同學周自新君，現任第五十三兵工廠廠長，爲備車招待。由拓東路進入市郊。抗戰以來，余遍游川、康、

黔、桂、湘各省，獨未至滇。今游昆明，得償宿願。承周君招待，下榻東寺街威柳壩橋一號，流水一灣，高樹參天，朝暮鴉鵲飛鳴，頗饒野趣。

向晚遊翠湖，係昆明名勝之一。菰蒲楊柳，掩映秋光之下，一池碧水，綠滿汀洲，荷葉田田，蓮華正放。花香水氣，沁人脾胃。令人頓憶起故鄉北海風光，恍如夢境，悵然久之。余有詩云：『翠湖秋盡水盈盈，綠滿汀洲憶故京。二十年來如一夢，至今魂繞舊春明。』散步其間，至皓月東昇，夜氣漸涼，乃駛車歸去。

二　西山

九月二十日，為夏曆中秋佳節，天高氣爽，秋色極佳。下午，作西山及龍門之游。乘吉普車由環城公路經西站馳滇緬公路，向西山行。繞昆明湖北端，可十餘公里，平湖在望。既登華亭山，先至靖國雲棲寺，深藏半山塢中。前為山門，次為天王殿，額曰靖國雲棲寺。聯云：

塵世不相關　幾閱桑田幾滄海
胸中無所得　半是青松半白雲

再進為蓮塘，拾級而上，為大雄寶殿，中供三世佛，傍塑五百羅漢，香煙繚繞，法相莊嚴。再後為藏經樓，兩廡有碑，係明天順六年立，由碑文所記，可知寺係宋元古剎，為元梁王避暑之所，舊名大圓覺寺，後燬於火。清康熙二十六年重建，改為靖國雲棲禪寺。仰望藏經樓後，重山環抱，茂林修竹，青葱滿目。綜觀雲棲寺地勢，本極幽勝，惟深藏壑中，不能遠眺昆明湖，為美中不足耳。

三　龍門

出雲棲寺而右，遙駛龍門，漸行路漸險促，左傍懸崖，下臨滇池，極目千頃，茫茫無際。可四公里，抵羅漢崖，係龍門半山進口處。（若從滇池之濱上攀，則須歷一千三四百級，始登龍門。）琳宮梵宇，依巖而建，遠而望之，若嵌諸山壁間。再上為三清宮，迴廊曲檻，下臨湖面，遙望昆明，煙樹萬家，金馬諸峯，聳翠擁碧，俯仰其間，已覺心曠神怡。惟所對滇池，係近城一角，尚未臨空闊處，未為最勝也。再上為玉皇殿，樓閣三層，高聳雲閣，惜年久失修，頹多圮傾。自此路入叢巖間，低徊曲折，始抵石室，絕壁千丈，毫無去路。所謂石室，係鑿巖而過，內虛外敞，作迴廊之形。再進為慈雲洞，石剜則作雲華洞，係人工鑿成。再行石室迴廊，始登龍門，額曰達天閣，匾曰『天臨海鏡』；前有石臺，作半圓形，左峙碧嶢，右連海口，下臨滇池，茫茫五百里，盡在目中。其下即千尋岩，絕壁懸空，下臨無地，飛鳥翱翔，盡出其下，俯仰其間，迥出風塵之外；而仰望太極峯，則猶高高無極。於是披襟當風，心神俱曠，作詩一首：

海天一色遠山平　千頃波光照眼明
日月迴環添帝座　星辰倒影入蓬瀛
鳥從雲母屏中過　人向琉璃鏡裏行
極目滇池看不盡　孤舟今夜月華清

向晚歸抵昆明金馬碧雞坊，觀『金碧交輝』之景。二坊東西相對，時皓月初生，日落未盡，日月光華，互相輝映，金馬碧雞之影，遂相交錯，故有此景。余向聞人言，未之深信，今日目覩，始覺其真。亦昆明一景也。

四　初至河內

九月二十一日，晨起即赴飛機場，各部人員取齊後，於十時起飛。回首下望，金馬碧雞諸峯，漸遠漸杳；昆明湖及撫仙湖，相繼掠過，飛入萬山之間。一小時後飛行員指地圖相示，則已入越南北境。俯視叢山萬壑，森林密茂。十一時三十分，飛抵河內上空，富良江（即紅河）泛濫，兩岸低地，多成澤國。俯視河內街道整齊，房屋櫛比，風光至美。飛機繞城盤旋一週，始向機場降落。小坐場上，南風大作，頗帶海洋氣息。余生長海濱，戰後久處內陸，時念海上風光，

今得海風送涼，至感舒適。在場候車久之，始來卡車二輛，送余等過著名之紅河大橋(Doumer Bridge)，進入河內。

河內戰前人口十五萬(歐洲人僅六千五百人)，爲法屬越南首府，總督駐焉。河內舊爲安南王國首都，號稱東京；自阮氏建都順化，號廣南王，河內始不復成爲首府，然其政治經濟地位之重要，則依然未改。城分三部：一曰軍營(Citadel)(今爲法軍集中營)；二曰商業區(華僑多居此區)；三曰法人住區。大抵軍營在北，商業區介軍營東門與紅河之間，而法人住區則在其南，並逐漸發展，繞至西南一帶。城中多佳蔭大道，兩旁古木交柯，濃蔭相接，人行其間，宛似在公園之中。此河內之所以有花園城(Garden City)之稱也。

車入河內市區，一路懸燈結綵，偏紮牌樓，懸中、美、英、蘇及越南旗(但無一法國旗)，歡迎盟軍。標語有中英文及越文，如『打倒殖民政策』『越南是越南人的』『不自由毋寧死』『越南獨立萬歲』等，皆可表現民氣之蓬勃。蓋越人久受法帝國主義之壓迫，今盟軍入境，獲得解放，認爲此係千載一時之良機，自不肯輕易放過也。

五　浪泊湖及竹帛湖

河內近郊多名湖，在城中曰劍湖，在北郊曰浪泊湖，曰竹帛湖。劍湖較小，僅足點綴紅塵；而浪泊浩渺，竹帛幽深，皆有一碧千頃之勢。九月二十七日，命駕出北郊，赴浪泊湖。先至眞武觀，係供眞武大帝。廟前有匾，紹治二年十二月御題眞武觀有云：

黎熙宗鑄銅像端坐，最爲精工，高八尺二寸餘，周圍八尺七寸，重六千六百斤。

其地後枕濃山，前帶珥河，浪泊左縈，竹帛右繞，風光至勝。殿中楹聯，琳瑯滿目，中有一聯云：

煙波萬頃中，黎之臺耶？鄭之宮耶？俯仰陳迹！

湖山千里外，濃其枕也，珥其帶也，高深鉅觀！

其他楹聯佳者尙多，不及遍錄。應制詩多翰林學士所作，皆爲館閣體，蓋安南科舉，全效中華，流風餘韻，尙未盡泯也。入廟瞻仰眞武銅像，極爲威儀，鑄工頗精。出廟駛行湖隄之上，左爲浪泊湖，平湖浩渺，一望無際；右爲竹帛湖，斜陽返照，倒影分明。遠山近水，風光至佳。繞竹帛湖一週，乃駛行紅河大隄之上，逕歸河內，已黃昏矣。

六　受降典禮

九月二十八日，拂曉即起，憑窗而望，即有中國軍隊千餘人，結隊而過，青天白日國徽，迎旭光而招展。本日環繞河內各進出街道，以及城內各重要交通孔道，皆已由我軍佈置崗位，氣象頗爲森嚴。九時三十分，驅車赴總督府，府前廣場上，懸大國旗，四角有線斜向地面，綴以萬國國旗。總督府正面樓上，黨國旗交掛；兩旁則每一列柱上，遍懸中、美、英、蘇國旗。大禮堂正中，黨國旗交叉間，懸中山先生遺像。兩旁廳間，遍懸中、美、英、蘇國旗。上首爲中國代表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席，左右坐正副參謀長，外向；下首爲日軍司令土橋勇逸及海空軍代表席，內向；左爲盟國代表席，右爲高級將領席。後列席千餘，即爲來賓席。是日到者千餘人，美英高級將領，皆有人參加。法方代表亞歷山大，因身份不明，僅許其以個人資格參加觀禮，復以要求懸掛法旗，爲盧司令官所拒絕(因西貢方面即以懸法旗引起衝突)，故並未參加。越盟黨臨時政府，則派有高級官員觀禮。上午十時正，日軍司令土橋勇逸，川國直服師團長，酒井干城參謀長及今井等至，面帶憂戚之色，北向立。盧司令根據日軍在南京所簽降書，宣讀條款，譯成日文，交土橋簽字，簽畢即行退席。盧司令官乃宣讀佈告，並譯成法文及越南文。至是禮成，攝影而散。是日華僑觀禮者特衆，有年已古稀由孫輩扶持而來者。蓋此輩久經欺壓，今日得覩漢官威儀，宜乎其興奮異常也。余有詩紀之云：

上國威儀此日臨　遺民鼓舞起歡音

沉淪百載安南郡　又見王師出桂林」

萬馬騰驤出碧岑　烏夷俯首盡成擒
衣冠萬國壇坫會　青史千秋報國心」
越裳象郡皆陳迹　甌駱文郎只廢墟
「自阮王開釁後　越南宗社盡淪胥」
浪泊湖平竹舫清　炎方從此洗刀兵
夕陽嶺外紅如許　倒影樓臺分外明」

七　客居雜感

十月上旬，余遷居西郊 48 Rue Duviller，因距浪泊湖近，常於夕陽將下之頃，至湖濱散步。南國之秋，略現蕭索；而所住係別墅區，夜深人靜，更覺淒清，往往回憶十五年前留學柏林時代，爲之低徊不止。一夕秋雨秋風，連宵不止，因作詩四首，以遣長夜，其辭云：

巴蜀棲遲幾度秋　一麾今作越南游
半生羈旅江湖夢　萬里雲山海客儔
直北羽書勞悵望　征西車馬共淹留
故鄉縹緲煙波外　落木蕭蕭祇益愁

浪泊湖中夕照妝　京郊北望水雲浮
文郎帝子歸何處　甌駱遺民寧可求
靡靡偏多亡國調　滔滔盡是蕩天儔
紅河激盪風雲急　愧之埘生定遠謀

碧雞金馬建牙旌　豈向巴渝叩上京
寥廓烏轡天日遠　崢嶸肅嶺月長明
龐消救嫌嗟何及　誰踞干瀆爭不成
割據紛爭今已矣　且從猿鳥聞歸程

使節西行蒞越裳　南天樹色鬱蒼蒼
衡雲歸鳥去何疾　破浪長風來正狂
法顯曾爲山海客　張騫亦作星槎航
浮生飄泊尋常事　寄雨東山意未遑

八　訪問越南舊家

余至越南半月，所見所聞，皆爲歐化文明，嘗慨歎於固有文化之淪亡，爲之惆然久之。十月六日，因友人介紹，訪黃春瀚君於其鄉居。黃君曾任保大王朝教育部長，力主提倡漢文，在學校中增加漢文鐘點。其祖父爲舉人，父爲秀才，一越南舊家也。家中楹聯匾額，皆爲漢文，藏書頗富，有舊刻本大越史記及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皆係木板宋體字，印製頗精。余託以訪購一二部，以供閱讀。又詢以越語羅馬字拼音流行結果，是否有不良影響，則答曰越語本出漢文，爲方言之一種。漢文有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而羅馬字拼音則但記其音，又以各地方言不一，讀音不同，亦不能完全一致，故對於固有文化之保存，自有不良影響；但今日業已通行，亦難遏加靡止矣。余觀越南文化，全爲中國文化之一支，而自法屬越南，肆行文化侵略，根本掃除其文字，消滅其文化，馴至越人數典忘祖，不復知其種姓，嗚呼慘矣！

夕陽將下，霞光燦爛，余輩小坐黃君別墅涼台之上，下臨池塘，高柳參天，濃蔭匝地，時有白鷺翱翔，啄食池魚，秋水菱塘，頗饒詩意，而晚寺鐘聲更發人深省。余抵河內二旬，所見皆爲歐化文明。今日至此，始得見越南舊有文化，爲之感慨不置。

十月八日，余因任務關係，困滯遜職，並候指示，故越行散記上篇，暫記至此爲止；此後行踪當另詳。十月二十六日，作者附識。

樂府詩研究談

邵祖平

一 序論

韻文之發生，先於散文。自然之發生，其辭傳疑，其聲難於揣想。文學史家往往就鈞天九奏葛天八闋之辭，甄摭玄遠，雜糅眞僞而備倫論之，吾不取也。孔子删詩書，斷自唐虞。虞舜之時，初有樂官。樂官爲夔。舜命之典樂教胄子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詩言志，而言志者不必詩也。故不入樂之詩，幾與散文同科，以其祇有心聲而已，必曰永言，則吟詠必不延長其音，曰依永，則不得不有韻，曰和聲，則諧其宮商，順其喉吻，然後詩之能事畢而變之執任完矣。樂府二字，本官名也。詩之一字，乃寺言也（王安石字說，以寺爲臺閣，殆以士大夫之有韻文始得因爲詩也）。詩之入樂，初實始於官方。詩不但入樂，且須合舞。蓋就虞書觀夔之言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百獸率舞雖不可知，然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矣。庸詎知禽獸之飛舞，非學人之舞蹈而然乎？晉謝尚能鸜鵒舞，宋鮑照有舞鶴賦，唐田承嗣馬能舞，是知聲樂感召，人如擊拊於上，鳥獸自必舉舞於下，則詩也樂也舞也，發生必在同時矣。後世可被絃管之韻文，統名樂府。漢之樂府爲詩，唐之樂府，爲五七言絕句詩，宋之樂府爲詞，元之樂府爲曲，明之樂府爲南崑，清之樂府爲皮黃。雖聲有雅鄭，辭有文俗，其義則一也。不入樂之韻文，可名徒歌。蓋不經樂官演奏，無詔伶人者。如晉用魏樂，採魏詩入樂府。足見原作在魏代尚爲徒歌。宋增損唐絕句爲小令，再創慢詞，則在樂府徒歌之間。元曲則有雜劇套數院本小令之殊。雜劇套數，有演有奏，絃索極盛，院本既而不唱，文人自娛惟在小令，則亦未必無徒歌也。韻文之屬樂府者，偏識爲難，不敢妄作擠籥扣槃之談，僅就樂府詩聊爲管窺蠡測云爾。

二 樂府詩產生與成立

政俗由質樸而趨浮侈，文學由簡括而趨繁靡。美上皇而諂末代，僅爲士夫之空談，未有能變玉食錦衣爲采椽帶索，變麗句新聲爲擊壤康衢者。樂府詩之產生，正由政局變於上，民俗變於下，詩人樂人遇合造作而成者也。郊祀燕射，朝廷祭享侑食之樂章，以聲爲主，以辭爲輔，其變不甚劇。趙代秦楚之謳，地方之樂章。徒歌以辭爲主，以聲爲輔，其變極劇。至後世所謂新樂府，則由詩中之變風變雅，變於其所不得不變，初不限於聲辭，殆惟生於情事，雖曰徒歌，然得樂府之意，不可輒屏於樂府之外也。其故請以次詳論之。

漢書禮樂志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又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故哀帝時罷之。然百姓漸漬日久，湛沔自若。」又佞倖傳云：「李延年善歌，爲新變聲，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作詩頌，延年則承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女弟李夫人產昌邑，由是貴爲協律都尉。」合觀漢書所載樂府有關諸則，則知樂府之名，實立於武帝定郊祀禮之時，樂官則爲佞臣李延年。樂府既立，采詩夜誦。夜之一字，聲轉則爲繹爲譯爲懌。殆采得之詩，經潤色改定謂之繹，用雅言代方言謂之譯（如越人歌之類），和其聲理穩順聲勢謂之懌。又漢武帝好大喜功，溺於聲色，畜文臣如狗監馬監，立樂府比諸倡優北里。延年承意絃歌，求得帝悅懌而已。故當時之樂府，決非遠紹

虞舜之典樂宗周時之大司樂，不過欲縱心耳之娛。可以卑之毋甚高論者也。觀於河間獻王之獻雅樂，天子僅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則知漢之樂府者，周之鄭聲也，非雅樂也。此劉勰文心雕龍所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豔致譏於天馬」者，誠懈乎其言之矣。

考史記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河間獻王所獻雅樂，雖不明言篇名，是見三百五篇中大小二雅之樂譜，猶有存者。惜武帝專務新聲，不知常御，故不傳於後世耳。三百篇傳於後世而可歌詠者，惟鹿鳴伐檀等十二篇。章先生曰：「近人以鹿鳴伐檀等一譜一字無抑揚高下之音，疑爲唐人所作。然一字一聲，不但詩經爲然，宋詩亦然；姜夔張炎之譜可證也。」章先生推究雅鄭之殊異，又爲之言曰，「一字之譜多聲，始於元曲，古人未必如此，鄭聲之鄭，讀如鄭重之鄭，謂曰一字多聲爲鄭聲，而以一字一聲爲雅樂。」其言甚創而極確，三百篇中無鄭聲，孔子刪詩所放也。樂府詩宋詞元曲，則殆愈先愈雅，愈後愈鄭矣，今列舉以明之。

郭茂倩樂府詩集西門行本辭云：「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爲樂，逮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詩中無選字，且少疊句，結二語尤極質樸沈鬱。及晉時將此定爲樂章，卽有增損改定。故西門行樂府辭云：「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遊！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讀之覺聲調美茂，語句清麗，而迴環顧盼反覆詠歎之處，尤在三四五七各言之錯綜，至有兩句之疊用。此蓋詩人與樂人合作之產物，在文學極爲進步。至論雅鄭，本辭篇八十四字，樂府則多至百一六字，其音調縹緲超忽，當難免鄭實有鄭聲矣。至如宋詞，初發五代花間爲小令，工者歐晏；及柳永屯田氏出，始創爲慢詞。慢詞者，依小令之腔板，增益字句，演爲中調之謂。如柳氏鶴沖天一詞，共有兩闋，兩闋相較，上半闋句法字數悉同，下半闋一爲四十五字，一爲四十一字，是見下半闋一加襯字一不加襯字，眞可謂慢詞中之慢詞矣。更論元曲，尤可任意加襯字。如鄧玉賓正宮叨叨令二首，一爲六十字，一爲五十字，而元曲甘爲鄭聲。章先生之言信而有徵矣。

政俗由侈靡而致亂，史不絕書，因侈靡而生浮夸之心，因敗亂而啓愁鬱之情，此亦人事之常情。詩人於此，感觸尤爲銳敏，而樂府詩人，視其他諸詩人更甚。蓋如五言詩人，尚有山水田園之趣，琴書閒適之樂，不必有縱恣之描寫，指斥之諷諫也。如漢武帝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血汗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歌中「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虎脊兩，化若鬼，竦子身，逝崑崙，游閶闔，觀玉台」諸語，極力狀天馬之權奇神異，竦身可上崑崙，登閶闔觀玉台，誇大之辭也。更如辛延年羽林郎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則直書馮子都之驕橫猥蕩，與漢書霍光傳百官以下但下馮子都王子方等人之語相合。蓋二人皆霍光之家奴，家奴調笑酒家胡姬，霍氏一門之驕奢淫逸可想。異日霍氏之敗，卽伏於此。詩人感諷指斥，眞詩史矣。他如赤雁，靈芝，名都，美女，白馬，陌上桑，董嬌饒，雞鳴，相逢行，玉樹後庭花，泛龍舟，舞媚娘之屬，皆有縱恣之描寫，生於浮夸之意。故敘一女子之飾，而曰「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敘一家室之富，而曰「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敘一丈夫之裝，而曰「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敘一騎從之盛，而曰「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敘一宮室之美，而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敘一苑囿之大，而曰「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此皆務極其煊赫穠至，樂府備有之聲色藻

采者也。反是國家敗亂，人情愁鬱，則如古樂府之爲問答體者。如「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此從軍歸來者之問辭也。鄉里人則答云，「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從軍歸來者因返家而自敍其情事曰，「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讀此詩者，無不惆悵若有所失。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炊者將自驚疑，而雉兔滿屋，葵楮雜生，荒涼無歲之情，待向誰告耶！而政治之不脩，兵役之紊亂，家室之離析，人生之窮愁，可不言而喻矣。他如薤露，蒿里，苦寒行，卻東西門行，東門行，西門行，吁嗟篇，箜篌引，怨歌行，放歌行，飲馬長城窟行，駕出北郭門行，傷歌行，孤兒行，婦病行，悲歌，悲哉行，妾薄命，或憫死喪，或愴行旅，或困交讁，或悲割愛，則殺孤寡之無告，或述喪亂之稠疊，總由國家敗亂不知生人之樂而起。樂府詩此類最多，所謂愁苦之音易好也。更加杜甫丁天寶之亂，所作新樂府二悲二哀三吏三別兵車行洗兵馬諸名篇，直接變風變雅，哀烈若燕歌楚些。雖曰未嘗詔之伶人演奏而出，然實有樂府詩之精[illegible]神情，不目之樂府不能。況曹子建樂府詩可歌者惟五首，陸士衡樂府數十篇悉不被之管絃，而獨於杜子美新樂府輒可目之爲那調乎！

詩有國風雅頌三體，國風無楚風，離騷紹之，得國風小雅之意。史記屈原傳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得兼之者也。後世鍾嶸詩品，於詩立爲三系，三系者，風一系，雅一系，騷一系，而黜頌詩。此就文學中之成分析之，固當升騷而黜頌也。商周之頌，艱嘲樸重，殆難句讀，有其聲而辭不能動人，非離騷掩抑紆迴情深文麗之可比也。樂府之郊廟歌辭，多從頌詩來。郊祀歌十九首中，惟秦元似頌，練時日似騷體，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四首似豳風，其餘有全似雅詩者。足見樂府詩爲風雅頌騷四體而後鑄舊爲新之一種詩體。然得國風爲獨多，如醲芳烈之酒，其中雖有鬱金香醉醲，玫瑰木瓜之觴，而黍稷目是其主要原素也。文學之展拓，後者常擷取前者之長以爲己長。樂府詩在文學中可視爲展拓作品，以其在風雅頌騷之後，不得不有此體也。又如秦觀論杜甫不取曹劉阮陶顏謝庾鮑之長，亦不能集詩中之大成，其理一也。此樂府詩成立之又一因也。

禮記禮運篇兼言禮樂。如云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大夫家有判縣之樂，君賜之食則有樂，殆與漢時之郊廟樂燕射樂相當，而爲之歌辭者，自然與音樂有密切關係也。漢自武帝遣張騫通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乃武樂也。又當時有龜茲之樂。龜茲亦嘗來觀漢官儀。橫吹曲辭本北狄諸國馬上之樂。漢時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此胡樂流入中土之漸，與李延年新變之聲已有不少關涉，可徵知也。漢明帝事胡神，立白馬寺以藏馱來之佛經，然後天竺之梵唱佛樂，又來中華。增此胡樂，新變聲更多，亦未可知也。中國古樂亡於隋，而隋者原爲普六茹氏，本夷狄也。隋文帝奪周幷陳，入主中華，乃冒擬楊震爲其前十四世祖，姓楊名堅，以華族譜，以詐漢族。其所挾來之文物，當有胡樂。蓋國樂已蕩盡，不能與之抗也。隋煬帝善爲新變之聲，泛龍舟，喜春遊歌，白紵歌，春江花月夜等，當然有胡樂之聲調包孕其中矣。唐滅隋而一統，太宗欲復興禮樂，而羣臣無其人足言者，不但無其人，兼亦無禮器無樂器也。唐李頎胡笳行，胡琴琵琶與羌笛，何一而非胡中樂器乎。故開元間樂曲最夥，約有二百三十二曲，著者霓裳羽衣、又名婆羅門，大抵皆胡樂也。玄宗詔李白爲清平調，詩成而玄宗擫笛吹之。足見七言絕句樂章之嘹喨清華，與羌笛之聲最相稱也。帝又善擊羯鼓，羯鼓又胡樂也。凡此種種，足見聲樂變革與文學相關之大。此樂府詩成立之又一因也。

三　樂府詩體製之分析

樂府詩體上包風雅頌騷，下賅歌行律絕，於諸體無不備有。胡應麟曰，世以樂府爲詩之一體。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練時日雷震震等篇，三言也。箜篌行善哉行等篇，四言也。雞鳴隴西等篇，五言也。烏生雁

門等篇，雜言也。妾薄命等篇，六言也。燕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騮枯魚等篇，五言絕也。皆漢魏作也。挾瑟歌等篇，七言絕也。折楊柳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齊梁人作也。虞世南從軍行，耿緯出塞曲，五言排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長篇則孔雀東南飛，七言長篇則木蘭詩。是樂府於詩體，無不備有也。

郭茂倩輯樂府詩集百卷，上采堯舜時歌謠，下迄於唐，自著目錄，分樂府詩爲十二大類，即郊廟歌辭，燕射歌詞，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新樂府辭是也。以余觀之，燕射重樂不重辭，辭無文學價值，雖删之可也。山歌民歌，雖從清商曲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中來，然附庸蔚爲大國，實有獨列一類之必要，則黜燕射歌辭而升由歌民歌仍爲十二類可也。

郊廟歌辭者，始於漢之郊祀歌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其目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歷代沿用其樂，略改其樂章而已。宋齊以來，又加禋地，迎牲，飲福。唐則夕牲禋地不用樂。下逮五代，制作之事更所未暇，朝廷宗廟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爲程式云。燕射歌辭者，漢之曲辭已亡，今有晉之四廂樂歌，晉武帝使傅玄荀勗張華造有正旦行禮王公上壽酒食舉歌詩，蓋饗燕食舉之樂歌也。鼓吹曲辭者，一名短簫鐃歌，北狄諸國馬上之樂，所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蓋軍中樂也。橫吹曲辭者，原亦來自北狄之樂，有簫笳者名鼓吹，有鼓角者名橫吹，漢鐃歌十八曲，鼓吹曲辭也。漢橫吹曲十曲，橫吹曲辭也。相和歌辭者，因絲竹金石相和而歌而得名。唐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郭氏細分其目爲相和六引，相和曲，吟歎曲，四弦曲，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琴調曲，楚調曲九種，皆房中樂也。唐山夫人房中歌，本亦房中樂。房中樂者，婦人於房中祈禱之謂。漢世街陌歌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歌辭之多門，未有盛於此者。又相和之理，一同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蓋諸調曲有豔有趨有亂辭，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也。清商曲辭者，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播遷，其音分散入南。王僧虔曾論之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今其目有吳聲歌曲，西曲歌，江南弄三種。吳聲歌於江南，今江浙等地，西曲歌於楚，今湘鄂等地，江南弄由梁武帝改西曲而成，正今金陵等地。統觀清商諸曲，纏綿哀婉，豔麗清新，既含宮體，又屬民歌，子夜讀曲，男女悅慕之詞；玉樹後庭，人主荒淫之意。可謂情歌，亦可謂亡國之音矣。舞曲歌辭者，詩有萬舞，書有百獸率舞，禮有舞勺舞象八佾之舞，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發乎生民之情。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有文舞，有武舞，有軟舞，有健舞。唐自開元以來尤盛，如春鶯囀一曲，即宜用軟舞，張祜詩，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是也。惟詩戒屢舞，亂用是長，今雖不見其舞姿，讀其舞辭，亦可增人淒弔之感。琴曲歌辭者，鼓之用琴，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而鹿鳴伐檀之雅樂，亦在其中，視相和清商之徒爲鄭聲，亦有間矣。然今多不傳，傳者其辭。韓退之事事復古，所爲琴操極可誦，而胡應麟尚譏其文王操得其意不得其辭，下此更不足論矣。雜曲歌辭者，詩體中之行引歌謠吟詠怨嘆八流，皆合詩人六義之意，本有可協聲律播金石者。然歷代文人才士作者之所用心，豈必盡能弦歌。蓋以敍離別悲傷之懷，言征戰行役之苦，因意命題，學古敍事而已。今古辭可考者，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何纂纂之類是也。不見古辭而自我作古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之類是也。後世文人，發有述造，則幾與新樂府辭相近。近代曲辭者，亦雜曲歌辭也。以其於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辭。開元天寶間，其著錄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楊柳枝竹枝，顯爲此曲中之膾炙人口者，則與今世民歌相近云。雜歌謠辭者，里諺鄉謠，街談巷議，政治褒貶，人物臧否，咸見

於此。茂倩所輯，不分眞僞，厠居其中，則與沈德潛古詩源中之古逸相當者也。新樂府辭者，其辭實樂府，得樂府之意，具樂府之事，而未嘗被之金石弦管者。蓋有其辭而無其聲，則不得不以新樂府名之也。漢武帝初立樂府，以李延年以協律都尉，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又有司馬相如諸人所造之詩歌，延年則承意弦歌爲之新聲。所謂承意者，非必承武帝之意，當必先明作者之意，由徒歌而被之弦管，使無聲而爲有聲也。當時所采之詩甚多，豈盡被之弦管。漢詩中恐亦有名樂府而不能演奏者在也。曹子建爲樂府名詩人，而所作只有箜篌引等五詩，晉時被之絃管，其餘如白馬美女等篇，皆徒歌，亦可謂之新樂府矣。元稹亟取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依傍，轉得詩人諷刺之義，乃與白居易李公垂共師杜甫意，賦出門行新樂府如干首。今元氏白氏長慶集皆各有新樂府七八十首，並可傳之作也。後世詩人賦時事詩，譏朝廷得失，紀民生疾苦，處蓬蓽之間，備輶軒之采，其庶幾無愧乎。現代樂府詩產生，嘗於新樂府是賴。然山歌民歌，實其姻婭雲礽，必有展拓之趨勢。山歌者，宋楊誠齋王道父初爲之，而誠齋集中最多，陸放翁亟推之。元代楊維楨尤集竹枝山歌之大成。明代兒女情歌最多。宋濂之醇謹，而爲趣歌，于謙之忠烈，而喁喁作吳儂軟語。清之黃遵憲，直紹斯體，爲之尤工。晚近蒐集民歌者，北京大學有民歌叢刊，開明書店有白雪新音正續集。足見此體由附庸代興蔚爲大國。此予所認爲尤有展拓之趨勢者也。

樂府詩體分類具如上述。諸體之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鐃歌相和橫吹等曲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諸曲是也。有徒歌而不被之金石弦管者，若雜歌謠辭新樂府等是也。徒歌一曰徒詩，蓋徒爲詩而終不配之弦管樂器者，或謂之謠。謠者說文作䚻，謂肉言也，卽喉舌發聲[illegible]言有韻而已。郭茂倩宋人，當時輯樂府詩所錄之詩，不能被之弦管者，十中殆有八九，所可歌者，憶江南，小秦王，楊柳枝，浪淘沙等曲，亦爲詩，亦爲詞，當爲人所共喻耳。如是則樂府詩不幾同匏瓜之繫，虛車之飾，有其名無其實乎。然以文學史上觀之，樂府詩上接風雅頌騷，下開唐絕句宋詞元曲，如人之有脊呂，無之則無以行立而縮百骸，其地位之重要，可想知矣。

四　樂府作法之藝術觀

樂府詩胎息風騷，浹洽人情，藻思不厭其華豔，因其眞至，故不覺其繁縟，聲律務協于諧暢，以其自然故不見於拘牽，常用事而不爲事用，善謀篇而泯絕痕迹，眞韻文中之純文學也。茲以管窺所及，敍述樂府詩作法七目於次，七目者，一主情，二善比，三尙藻，四貴婉，五取材，六選聲，七定篇。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在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樂府詩人者，爲情顚倒，尤用情之甚者，或有過於情，而不至不及於情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亦云，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甚矣樂府詩之爲文，眞流連哀思往而不返者也。鐃歌有所思云，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此決絕之情憤也。鐃歌上邪云：「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此[illegible]婦之情切也。甄后塘上行云：「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此臨訣之惻慘也。古辭東門行云，「今時淸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此骨肉諈諉之情至也。傅玄飲馬長城窟行云：「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此生離之情，甚於死別也。古辭婦病行述將死之婦屬其夫以所生兒云，「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愼莫笪笞，行當折搖，」此天親之愛，雖禽之哀鳴也。古辭豔歌何嘗行敍雄鵠不能銜負病雌以遠去云：「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此伉儷之情眞，杜甫熟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所自出也。戚夫人舂歌云：「子爲王，母爲

房，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此母子之情，當其苦厄時可以告哀也。韓愈琴操別鶴操云：「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此語從李陵答蘇武詩「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語化來。雖可奈何，情深可溯，足知樂府詩自有其作法，而西漢五言詩人與樂府詩人同其機杼也。晉宋齊梁之間，用情幾欲傷性害理，如歡聞變歌云：「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前溪歌云：「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華山畿云，「上牀解腰繩，自經屏風裏，」讀曲歌云：「桃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則縱恣其情，忘生欲死，亦非文學所許，蓋情戕其性者也。惟樂府詩人亦有不善用其情與此徑庭相反者，戎昱古別離云：「知子去從軍，何處無良人，」則峭直刻薄，無情之極，殆不成語矣。王介甫自負其明妃曲，而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忍此等心術，直是有累其相業，亦太無情矣，何不為白樂天「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尚為纏綿無窮乎。蓋介甫歌行詩人，樂天樂府詩人，作風固有不同也。

樂府從國風來，未有不善比興而可為樂府詩人者。然朱子傳詩，本有不取義之興，而比則未有不取義者。蓋興如當今之兒歌，說東指西，羌無理致，胡天胡帝，莫知所衷。比則如當今之民歌情歌，愛戀之情，藉物浮而湧出，兩兩絜比，有始有卒者也。昔劉舍人文心雕龍著比興篇詮釋比義曰：「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今就其義例一說樂府之善比，聲比者，樂府詩中用之最廣。如子夜歌：「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以匹音喻匹配之匹；又「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以梧子喻吾子。又「處處種芙蓉，婉轉得蓮子，」以蓮子喻憐子。讀曲歌：「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以碑喻悲。于謙吳儂曲：「浮麥磨來難見麵，以麵喻面。」粵西民歌：「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晴中絲，」以晴喻情，絲喻思。此皆以雜音為譬況者也。貌比者，樂府詩中尤顯然可覩，如薛道衡昔昔鹽云：「瑕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以千金狀笑之矜貴，以雙玉狀玉筯之懸垂。范靜妻沈氏映水曲云：「輕鬢學浮雲，雙蛾擬初月，」其驗自見。古辭悲歌云：「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以入木言迴腸，狀淤鬱難通之情如畫。李白白頭吟云：「兔絲固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以司馬相如將別聘茂陵女為有異心，會不如兔絲女蘿抱縈之親固也。太白擬作如長相思之「昔日橫波目，今成流淚泉，」妾薄命之「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比擬均恰到好處。若杜子美新婚別，「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則比擬太激切，樂府神韻，不無減損矣。心比者，兩物相比，雖不相當，而一比附輒見意，人人首肯者也。如讀曲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此詩賦比興眾於四句之中，千古奇作也。首句直寫其行動，賦也；次句喻於楊柳之可藏烏，春令漸穠，興也；三四兩句博山爐焚海南沈，芳香暖融，如男女之愛戀濃摯，不可暫分，比也。比辭如此，可謂稱心矣。孟郊遊子吟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慈母恩深，如春陽之煦草，遊子飄轉，侍奉且缺，寸草之心，將永無以報春陽，是可悕也。比擬極創，而摯然有當於人心，故心比之辭，屑之精嚴，是省御千言萬語矣。事比者，用物態來烘托人事，用史實來反映現在。如魏武帝賦短歌行時，孫劉未翦，大戰將屆，不知功業何時成就，故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自比烏鵲，三繞而未能安也；又欲牢籠天下英俊，使其輔己成帝業，故以周公比自；而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渾浩之中，時露霸氣，兩比之中，帷燈匣劍，隱隱可見。後世如李泌七言詩云：「天地生吾有意否，安能不富又不貴，空作昂藏一丈夫，」則淺露不足道，以其不知用比辭故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離騷攄豔深華，莫不藻采高翔，垂輝千審。樂府詩多自風騷來，宜其富豔酣媚，棄樸陋而崇美贍也。昭明太子序文選，標沈思翰藻之說，劉舍人文心，立情采之篇。蓋沈思未有不深於

情，情深未有不酣於藻采者。雞鳴云：「黃金爲君門，碧玉爲軒窗，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又云：「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相逢行亦云，「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同爲漢之名樂府，何其數藻之相似耶？樂府詩所尚者藻，攜文者目謀耳謀，心與之會，決非相襲勦說者也。他作如羽林郎云：「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焦仲卿妻云：「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籠七十二，綠碧青絲繩。」又云：「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曹植美女篇云：「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鋪陳富麗，精豔動人，寫一美女之妝飾奢侈皆同，然後美女之情盼側倚，儀態萬方，呼之欲出矣。返觀曹植雜詩中之佳人，僅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杜甫五言詩中之佳人，僅曰「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並無奇藻豔采以相周旋。則知樂府詩之摛藻，與五言又自不同也。

西漢詩可分兩派：一派清勁，李陵創之，一派溫婉，蘇武創之。樂府詩似亦有此兩派，而溫婉更爲當行本色。魏武短歌行，雄健極矣，而結語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辭太沈著而調失流轉，實非樂府詩之絕作。樂府詩貴婉，婉字從女宛聲，聲發義者也。是以三百篇，首乎關雎，六義首乎風，義關君臣朋友，詞必託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漢樂府詩人知此者，如冉冉孤生竹云，「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人臣之欲得君而事，何其鬱陶於心乎。及其所遇猶不諧，仍不作怨望之詞，乃云：「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又何其溫婉於辭乎。東門行云：「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溫厚之意如掬。及知其夫不可留，又質爲之語言曰：「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諄諄之至，深愛內蘊，讀人不當如是耶。亦溫婉之上選矣。唐人杜審言妾薄命云：「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二語溫婉，庶可以怨。至李端妾薄命則云：「對鏡不梳頭，倚窗空落淚，新人莫恃新，秋至會無春，從來閉在長門者，必是宮中第一人。」則悻然現於面，比之街女自衒其色矣，此蓋不知婉之一義者也。

詩中不廢用事，惟用事太多，則不得清新相接。樂府詩不但善用事，且善馭事，馭事者，事隨我馭，可前可後，可左可右，截長補短，使孟範水，惟吾意之所聘而已。如古辭善哉行云：「自惜袖短，納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蓋自恨不如翳桑之餓人，以報君獒之狂噬，譬之袖短，輒不能納手其中也。此等馭事，何等活脫，比之唐人惟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減者，蘊藉多矣。魏武秋胡行，忽言三老公，忽言寬裕異人，曹植靈芝篇，忽言虞舜，忽言丁蘭董永，變化不測，而子建之意，尤在託古婉諷，細味方知。蓋靈芝於地爲瑞者不奇，而人之大孝不爲其君父長吏所容，乃事之可奇可哀者也。馭事如此，實於求詞試通觀二表矣。唐人元稹樂府善馭事，將進酒詠韓非子主母令婢子進主父藥酒事，出門行敘兄弟二人出門，一登山采璞，一入海盜龍頷下珠，兄獻璞遭再刖，弟倚龍女得充行酹，因致富饒，一朝龍怙弟行雨之納賄，怒而磔之，而兄之璞由楚望氣者言，得剖而爲連城之璧，封陵陽侯，名以不朽，用卞和獻璞事，參以神話，若合若離，頗類小說家言。然自是樂府本色。故知樂府詩貴馭事也。

聲律之學，至永明而大暢，前乎永明之詩，聲調未臻其美，惟樂府選辭，已見於漢時之董嬌饒，如「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自相重言，對當雙聲，又「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零落雙聲，芬芳又雙聲，末句「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歸來疊韻，挾瑟聲近。漢時聲律之說未起，然近得通轉也。此詩婀娜其姿，音節嘹曉，誠

運聲之助也。漢樂府又有助語，如妃呼豨，收中吾，亦聲音之理，收中吾雖不可知，妃呼豨三字，則全爲輕唇音也。隴西行中叠字叠韻最多。「歷歷種白楡，戲戲鳴啾啾，盈盈府中趨，」叠字也。「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坐客氈氍毹，酒上正華疏，」四句中四叠韻，好婦敷愉氍毹華疏八字中，好古音如朽，與婦同在今韻二十五有，華古音讀如敷，與疏同在今韻六虞，故均爲叠韻也。後世如吳邁遠飛來雙白鵠云，「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靑雲，」連翩靑雲叠韻。歡聞變歌云，「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前溪歌云：「寧斷嬌兒乳，不斷郞殷勤，」沒命不罷寧斷斷郞，皆各爲雙聲，宜其要眇動人矣。

樂府篇法極爲錯綜天嬌。鐃歌中起訖之法，更爲奇創，如「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語最矯健，筆筆皆逆挽而出。如謂烏啄野死者之腐肉，則平沓無餘味。結語云：「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反映前語，如常山之蛇，首尾照應。蓋良將出征，不旋踵而死於戰場，馬革不裹，烏啄何傷，寫歎之極，與前悲壯之辭，合成一種奇瑰之篇法也。樂府初立，李延年取司馬相如詩賦承意弦歌，創爲新變之聲，故樂府篇法貴鋪張，以其有賦體也。魏武帝步出東西門行云：「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此以表裏爲賦也。曹植吁嗟篇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木蘭辭云：「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繁欽定情詩中四段，每段各有東南西北，乃在東山隅，乃在南山陽，乃在西山側，乃在北山岑。鮑照行路難云：「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元稹決絕詞云：「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沈佺期獨不見云：「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李白上雲樂云：「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江南古辭云：「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此皆以東西南北爲賦也。東門行云：「上有倉浪之天，下有黃口小兒。」李白靜夜思云：「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此以上下爲賦也。蓋東南西北者，平面之賦法，上下表裏者，立體之賦法，吾人一誦李白「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語，即覺有無限低徊，背鄉去井之意味黯然，誠知其爲樂府之篇法，非五言絕句所可窒也。他如浮雲西北馳，孔雀東南飛，上有長相憶，下有加餐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漢水逢遊女，湘川値兩妃，我前鬼長嘯，我後獄又啼，皆樂府詩中或效樂府詩者所習見，可悟其句法如此者，非偶然也。胡應麟曰，「郊祀鐃歌諸作，凡結語率以延齡禱言，蓋主祝頌君上蔭庇神休，體故當爾，後人或以爲漢人套語非也。」愚按樂府詩，每章或結語，多有「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情，」「欲令皇帝陛下三千萬歲，延年壽千秋，」「今日樂相樂，丈人且安坐，調絲殊未央」等，皆舉食歡樂，歌以侑酒之意，因有此意，乃鑄成樂府獨有之體，乃至影響其篇法。樂家又皆割裂昔人詩章，雜糅五七言詩，以求合樂而歌。唐樂府有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配合而成者甚多。此亦其他詩體諸篇所斷斷未有者也。

隱傷

匈牙利 Karoly Kisfaludi 作
鮑屢平 譯

一天清早，那有名的外科醫生還沒起牀，就接待了一個緊急的，豈稱一刻也不能延遲的求診者；他要求立刻診視。外科醫生趕忙穿上衣裳，按鈴召喚他的侍者。

「讓病人進來罷！」他說。

進來的人是屬於上等社會的。他蒼白的面孔和慌亂的神氣表露出肉體的苦痛。他的右手用吊帶綁起來了，雖然他能控制他的容顏，悽楚的呻吟仍不時從他的唇邊溜出。

「請坐。我能為你効什麼勞呢？」

「整整的一星期我都不能睡眠。我的右手有點毛病。我不曉得究竟是怎麼回事。可能是癰腫，或別的什麼嚴重的症候。起先並沒有痛苦，最近却疼起來了。我一刻也不安寧。它磨得我好苦啊。痛苦越來越厲害，越來越不可忍。所以我特別進城來請你診治。如果我勉強再忍耐一點鐘，我就要發狂了，我要你烙它一下或者挖開它，或者加以別的處理。」

醫生安慰他說，也許並不需要動手術哩。「不行，不行，」那個人堅持地說。「它必得用手術，我特別趕來要把這病痛的部份挖去。別的辦法都沒有用。」

他相當用力的從吊帶裏抬起手，繼續說道：「如果你看我的手上沒有明顯的傷痕，我得請你不要驚奇。這病症是不尋常的。」

醫生雖告病人說，他對非常的事是不大會驚奇的。看過了手，他却極其驚愕地把它放下，因為，他好像絲毫沒有毛病。它跟任何別的手都一樣；而且它一點也未變色。不過那人顯然是遭受着劇烈的疼痛，因為醫生放下他的右手時他趕緊用左手去接的樣子，表示得明明白白。

「你的傷在那裏。」

他指指兩條大靜脈之間的一小塊圓圓的地方，但當醫生輕輕地用指尖去碰觸時，他急急縮回了手。

「傷就在那兒嗎？」

「是的，厲害得緊。」

「我把手指放上去時你覺到壓力嗎？」

那個人未能回答，但湧上眼中的淚水說明了一切。

「這真奇怪。我什麼也看不出。」

「我也不，但痛處仍在那兒，我情愿死也不要再受這個罪了。」

醫生又用放大鏡檢查了一遍，量過他的溫度，最後搖搖頭。

「皮膚完全是好的。動脈正常；一點也沒有發炎或變腫的現象。它跟任何別的手一般正常。」

「我以為這一塊稍微紅些。」

「那兒？」

客人在他的手背上畫了一個小錢一般大的圓圈：「這兒。」醫生看看那個人，他想到他得應付一個瘋子了。

「你該住在城裏，在最近幾天以內我就設法替你治療。」他說。

「我一分鐘也等不得。大夫，不要以為我是顛狂或迷了心竅的。這片看不見的創傷痛得我受不了，我請你把這圓圓的部份挖去，一直挖到看見骨頭。」

「我不會這樣做的，先生。」

「為什麼不？」

「因為你的手根本沒有毛病。它和我的一般健全。」

「你似乎以為我是瘋子，或者以為我在誑騙你，」病人說，其時他從皮夾子裏抽出一張千元的鈔票，放在桌上。「你見我是誠懇的。這事實在重要，所以我才肯化一千塊錢。請你施行手術罷。」

「你就是把全世界的錢都給我，我也不願用手術刀來碰一碰一隻正常的手。」

「為什麼不？」

「因為那就不合職業的道德。全世界的人就要說你是傻瓜而罵我利用你的弱點，或者說我不能診斷一個虛無的創傷。」

「對，對，先生。那末我要請求你的另一種恩惠了。我自己來施手術，雖然我的左手不大靈便。我所要求你的就是請你在我施行手術以後弄好我的創口。」

醫生很知那人是十分認真的，看他脫却外衣捲起襯衫的袖子。他

竟然掏出了小刀，因為沒有旁的器械。在醫生能夠阻攔以前，那個人已在手上劃了一個深口了。

「停住，」他叫起來，惟恐病人割斷了靜脈。「既然你堅信它必須割治，好罷，還是讓我來罷。」

他準備給手術。等到就要動刀子了，醫生勸病人掉過頭去，因為一般人看到自己的血液時都要驚惶的。

「大可不必，」那人說。「我必須指揮你的手，那末才曉得割多深。」

那人泰然受割，而且指點着手術的進行。他的手毫未顫動，當那一小塊剜去時，他歎了一口輕鬆的氣，好像肩頭的重負釋去了。

「現在你不覺得什麼痛苦了吧？」醫生問。

「絲毫不，」他微笑着說。「好像痛苦被挖去了，挖割時輕微的刺激就如一陣大熱後的涼風。聽血液流罷。這倒使我暢快。」

包紮了傷口以後，那人顯出高興滿足的樣子。他前後判若兩人。他用左手緊握着醫生的手。

「真的，我深深地感激你。」

施手術後，醫生到病人的旅館中去看了幾次，漸漸尊敬他了，他是縣裏有地位的人，他有學問，有修養，出身世家。

傷口完全平服以後，那人回到鄉間家裏去了。

三星期後，那病人又出現醫生的診療室中。他的手又吊在繃帶裏，說他還受那塊老地方在上次施手術以前的一樣的痛楚。

他的面孔蒼白如蠟，冷汗閃在額角上。他攤在圈手椅中，一句話也不說就把手伸出來讓醫生察看。

「天啊！有什麼變化了？」

「上次你割的不夠深。」他呻吟着。「痛苦又回來了，比以前還要厲害。我差不多完了。我本不想再來麻煩你的，所以我極力忍耐，不過我現在再也不能忍了。你還得替我動手術。」

醫生檢視那一塊他上次開刀的地方完全癒合了，長了新皮，靜脈毫無損傷，脈息正常。他不發燒，可是四肢都在顫抖。

「我從沒有遇見過或聽說過這樣的事。」

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再開刀。手續像第一次一樣完成。痛苦是止住了，雖然病人感到大大的安慰，這次却未微笑，當他申謝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憂悒的。

「如果一月後我又來了，你不用驚奇，」他辭別時說道。

「你不可這樣想。」

「這是一定的，正如天上一定有上帝，」他說，帶有絕決的神色。「再會。」

醫生和幾位同事討論這個症候，各人發表一種不同的意見。然而沒有一個能夠提出滿意的解釋。一個月過去了，病人並未再來。又過了幾星期，却來了一封從那病人住處寄出的信。醫生歡天喜地的拆看信，以為病疼是消除了。信上這樣寫着：

「親愛的大夫：我不要把我病痛的起原瞞住你，也不願把這宗秘密帶進墳墓或其他地方去。我想告訴你我這惡症的歷史。它已經發了三次，我再不打算掙扎了。我放了一塊燒灼的煤在那塊地方作為對付兩發燒的魔火的一種解毒藥，這樣我才能寫這一封信。

「六個月前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我有錢而且滿足；我發覺什麼事對於一個三十五歲的人都有興味。一年以前我結了婚，這是一個愛情的結合。我的妻是一位極美麗，溫和而有教養的少女。她是我們附近的一個伯爵夫人的女伴。她愛我，她的心充滿了感激之忱。六個月的光陰在幸福中過去，一天比一天快樂。當我有事進城再從城裏回來時，她往往沿着大路走好幾哩去迎我，而不願在她從前的保護人的家裏就幾小時以上，雖然她常去那兒訪問。她這樣熱戀我，使得她的一般同伴都不舒服。她從不願和另外一個男子跳舞，如果她偶爾在夢中夢見別的什麼人了，她就自認那是一樁大罪過。她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

「我不曉得我怎麼會覺得這是虛情。男人真正愚蠢，竟在他最大的幸福之中尋取苦惱。

「她有一架縫級台，它的抽屜她總是鎖着。這很使我痛苦。我注意她從不把鑰匙丟在抽屜裏，也從不會不鎖。她能有什麼東西要這樣小心的收藏着？我嫉妒得發狂。我不信任她無邪的眼眼，她的吻，和情愛的擁抱。也許這些都只是狡猾的欺騙吧？

「有一天伯爵夫人來接她去，極力勸她到她的堡中住一天。我約好我下午也去。

「馬車剛駛出院子，我就動手要開縫級台的抽屜。我試了許多鑰匙，有一個終於把它開了。在絲包下許多婦女用的物件中搜索，我找到一束信札。只須一瞥，任誰都能認識它們的。那當然是情書了，用紫色的絲織束住。

「我並沒停下來想一想這種輕舉妄動是不光明的；搜查我妻子少女時代的秘密！我受衝動繼續前進；或許它們是屬於後一期的吧——從她姓了我的姓以後？我解開絲織，一封一封地讀。

「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刻。

「它們洩露了對於一個男人的最不可恕的陰謀。它們是我一個最親近的朋友寫的。而它們的語調……它們表現出最親密的友誼和最深厚的愛情。看他多麼叮囑他保守秘密喲！他說些什麼樣關於拙夫們的話喲！看他怎麼指點她把她的丈夫蒙在鼓裏啊！每一封都是在我們婚後寫的。我一向以為我是幸福的哩！我不想描述我的情感。我把毒藥喝得涓滴不留。隨後我摺好信件，放回原處，又鎖起抽屜。

「我知道如果我不到堡中去，她就要在晚上回來。事實正是如此，她快活地跳下車，奔到走廊上來見我，用最大的溫情吻抱我。我假裝什麼差錯都沒有。

「我們一塊閒談，吃晚飯，照常在各人的房中就寢。那時我已決定了一種行動，我願用一個瘋子的堅決來實現它。我午夜進她的房間去看看她那睡中美麗無邪的面孔時，我跟自己說，自然中以這種面孔所表現的卑鄙的欺騙啊。毒藥在我的靈魂中發生作用了，而且侵蝕着我體中的每一條血管。我把右手輕輕地放在她的頸子上，然後用盡氣力壓下。她一時睜開眼，驚駭地看着我，然後又閉上眼睛，就這樣死了。她靜靜地毫不自衛，只是默默地死去，如在睡夢中一樣。連我把她縊死了她還不怨恨我。一滴血從她的嘴唇裏滴出來，落在我的手上——你知道那塊地方。直到第二天早晨它已經凝乾了，我才看到。我們沒有張皇就把她葬了。我遠居鄉間私有的莊宅裏；那兒沒有主管的官廳來檢驗。況且，根本沒人會猜疑這件事，因為死了的女人是我的妻子。她沒有親戚朋友，所以沒有質詢需要答覆。我故意在她的殯儀之後發出訃聞，免得別人找麻煩。

「我感覺不到良心的刺痛。我是殘忍的，但她咎有應得。我不恨她。我可以很快的忘記她。沒有那個殺人犯行兇時有我那麼不在意的！

「我回到家裏，伯爵夫人正好乘車來了。如我的企望，她來晚了，沒趕上殯儀。她極緊張。那消息的可怕與突兀，簡直把她嚇昏了。她說話很特別，當她要安慰我時我弄不懂她的語意。我的確也沒用心聽，因為我不需要安慰。那時她親切地抓住我的手，說她願意告訴我一件秘密，而且聲稱希望我不要利用它。

「隨後說她曾交託我的亡妻一束信件；她因為信件的性質特殊而不能放在自己的屋子裏，問我可不可以把它們還給她。聽了她的話我覺得有一股冷氣順着我的脊骨溜下。裝着鎮靜，我問她那些信件中說的是什麼。聽到這個問題她震顫了，說：「你的夫人是我所結識中的最忠誠的婦女。她不曾問它們講些什麼事；她竟許諾我決不看它們。

「『你的信她放在什麼地方的？』」

「她說她把它鎖在縫級台的抽屜中。它們是用一根絲帶捆住的。你不費事就可以找出來了。一共有三十封。」

「我領她到放縫級台的房中，開開抽屜。我拿出那一束信遞給她。

「『是這信嗎？』」

「她急切的伸手接過去。我不敢抬眼，唯恐她瞧出什麼苗頭。她隨卽離去了。

「恰在葬禮之後一星期，一陣扎痛侵入我手上那天夜裏滴了一滴血的部份。其餘的你都曉得了。我明白它不過是心理作用，但是我無法排除它。它是懲罰我殺害無辜可愛女子的冒昧和殘酷。我不再想抵抗它了。我將和她在一起，並請求她的饒恕。她一定會饒恕我的，她將跟生前一樣的愛我。我謝謝你，大夫，謝謝你給我的幫助。」

商務印書館每週初版新書

三十五年五月份

第一週新書六種

中國國民道德原論

姜琦著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本書以今日之社會情形及世界潮流為背景，就國民道德之狀態，確立其理論體系及實行程序。內容分十章，對於國民道德之意義，中國國民道德之本質、現象、法則、綱領、教育、實踐、目的等，均有詳盡闡述。援引古證，取舍新知，佳義紛陳，風格獨創，允為國民人人所必讀。

英國戰時財政論

張白衣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英國戰時財政之健全，賴政府人民互相合作，始克致之。著者有感於英人上下一致努力之愛國精神，因有本書之作，介紹英國在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之歷次財政預算，英國純粹戰時財政之分析，及國民所得與國民支出之狀況，凡所論列，咸足為國人之借鏡。

史前的地球

世界文化史叢書

E. Perrier: The Earth Before History

伍況甫譯　一冊　定價六元

世界文化史叢書由世界著名學者多人，各就專長，分任撰述，此為第一集之一種，解釋地球與生物界之關係和演化。內容分四編，第一編地球的構成，從世界的誕生，說到陸海轉變，太陽與氣候的變遷，第二編原始生物，論生物底出現及其變化與繁殖，第三編向人體發展，說明古生代、中生代、及新生代裏的生物，及人類形態之造成，第四編結論，推論生物今後的自然發展。

工業化與中國農業建設

國民經濟研究所丙種叢書第二種

韓稼夫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我國落後之農業生產方式，不足以應付今後國民經濟發展之需要。本書論列我國農業資源及農業現狀，工業化的農業建設，農村工業化之意義與範疇，說明現代工業對於農業發展之影響，並具體的提供工業化的農業改進方針，使農業脫離原始的型態，而躋於現代企業經營之列。

復國（又名吳越春秋　四幕劇）

孫家琇著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作者以勾踐復國的故事為題材，而適當地把對艱苦的熱誠同對世界和平的願望，表達出來。全劇描寫西施范蠡如何通力合作，在完成了輔佐越王恢復祖國的偉大任務後，終於相偕遁隱。熱情中不失理智，嚴肅中參有諧趣，故事與古調一樣的美麗動人。

西北區域地理

陳正祥著　一冊　定價三元三角

本書範圍包括河西走廊、柴達木盆地、天山山區、準噶爾盆地、大戈壁、羅布泊盆地、唐努烏梁海、色楞格河流域八區，內容偏重自然方面，尤以地形及天氣為主，人文方面亦有扼要說明。西北為我國國防要地，此書可供建設新西北及研究西北問題者參考之助。

東方雜誌第四十一卷 第二十二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上海再版

每册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主編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六〇號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〇七五號